

# 海淀史志

HAIDIAN

SHIZHI

2023 2

(总第93期)

北京市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办

# 纵观知行百家 采撷史苑奇葩



2023年3月30日，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崔述强带队赴北京阳台山参观海淀区史志办与阳台山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联合推出的“红色血脉：平西地下交通线主题展”，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牟晓春出席（马坤供图）



3月23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一行在党组书记、院长江涌带领下赴海淀调研。图为区史志办主任李强、副主任赵习杰陪同江涌院长一行参观双清别墅（田颖摄）



4月13日，海淀区史志办《海淀地名志》考察组赴昌平区巩华城开展地名考察（林琳摄）

# 探寻资政之道 弘扬海淀文化



4月12日，海淀革命历史舞台剧《西山红色交通线》在区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区委党校区直机关分校2023年第11期党员培训班开展现场情景教学（马坤供图）



4月19日，海淀区史志办主任、二级巡视员李强带队赴革命老区调研，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国勇等领导陪同考察（徐佳伟供图）



4月26日，海淀区志编辑部全体同志召开《区志拾零》出版讨论会，区志主编周来升出席会议（林琳摄）

# 海淀史志

2023年第2期  
总第93期 2023年6月1日

## 三山五园研究

- 再论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 何瑜 02  
乾隆帝：三山五园的总设计师 赵连稳 10

## 工作探讨

- 按照《水经注》的指向寻找戾陵堰 张文大 15

## 人物春秋

- 播火——李大钊与海淀 徐佳伟 24  
冯仲云在北京清华的求学生涯与早期革命活动 王钦双 33  
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  
——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与香山 唐润 40

## 学府忆旧

- 老校史话——青塔院小学（北交大附小北校） 孙凤池 44  
忆北京市海淀区红门小学 吴春华 48

## 寺庙观堂

- 弘教禅林题刻与弑庵 张嘉鼎 铁木伦 54  
明代宦官与大慧寺 张鹏飞 56

## 海淀述往

- 圆明园、颐和园演剧场所与演剧剧目考略 勾超 60  
发生在双清别墅里的故事 户力平 64  
海淀公安元年记事（六） 钱军熙 69  
小学生活的片段记忆（下） 沈正华 77  
回忆60年前的海淀银行 张秀慈 84

国家级非遗——六郎庄五虎棍

郎玉明 92

## 史志动态

海淀区史志办赴北京市方志馆

参观三大方志主题展

本刊编辑部 99

海淀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召开

本刊编辑部 100

区史志办开展地名文化考察调研

本刊编辑部 101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江涌一行到

海淀区史志办考察交流

本刊编辑部 103

## 语言文字问答

“不只”和“不止”有什么不同？

本刊编辑部 91

顾 问：张宝章 张志田 胡桂枝 周来升 王珍明  
彭兴业 蔡景惠 张源洪 王宋文 胥天寿

主 编：李 强

常务副主编：赵习杰

副 主 编：王少谱

执行主编：宁葆新 田 颖

编 辑：马 坤 王杰琳 刘江英 周 勇 钟 冷

徐佳伟 徐支燕 曹沛函 董 震 戴金胜

刊名题字：张书范

封面摄影：宁葆新

版式设计：林 琳

# 再论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

何瑜

世人瞩目的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经多年拆迁腾退，历经千辛万苦之后，近期又被某些单位私搭乱建，变成所谓的游乐场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的违建问题，除了利益的驱动之外，还是有许多人对春熙院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不甚了解。

春熙院是圆明五园，即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统称圆明园的五园之一，且是最后一个进入圆明园这个大家庭的。大家知道，盛时的圆明园被称为“万园之园”，它不仅象征着我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乾隆盛世时的一个重要标志。法国文学家雨果曾写道：“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萃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

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sup>①</sup>

虽然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及其数不尽的文物典藏，在1860年时被英法联军野蛮地抢夺和焚毁。但作为今天中国最大的文化保护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的历史和艺术的完整性，就如同金五星的一角，决不能缺失。

## 春熙院到底在哪里？

最早提出春熙院位置的是史学家洪业，他在《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一文中，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1194卷载：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提出：此淑春园即后来乾隆帝赏给和珅的淑春园，该园位于燕京大学校园之北部。<sup>②</sup>

接着，洪业的学生著名史地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其《燕园史话》中，根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同卷中，乾隆三十一年补充奏报：“圆明园所交北楼门外水田一亩七分九厘”。则认为：淑春

① 张恩荫等编：《雨果致巴特雷上尉的一封信》，《西方人眼中的圆明园》，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洪业：《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页。

园的“北楼门外水田只一亩七分九厘，可见淑春园的主体在北楼门内。北楼门外面临万泉河东流之水，地段狭窄，而北楼门内以南地域开阔，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开辟为稻田。实际上这就是（明珠）自怡园遗址所在。”<sup>①</sup>“最初的自怡园，就是日后的淑春园，两者同是一地，只是前后的名称不同而已。”<sup>②</sup>“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从淑春园中的北部、也就是靠近万泉河的南岸，划分出一个新的园林，名为春熙院。其位置正好和万泉河北岸绮春园中的正觉寺，隔河相望。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候，与淑春园有重要关系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乾隆的宠臣和珅得以赐住淑春园，从而开始了在自怡园的旧址上重建新园的事。”<sup>③</sup>再次认定，圆明园春熙院在今北大校园北部。

其后，圆明园史专家张恩荫先生进一步指出：乾隆朝早期的淑春园，也就是后来的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位居今北京大学校园北部，其范围大体上是今未名湖以北的镜春、朗润、鸣鹤三园一带。<sup>④</sup>园林专家焦雄在《北京西郊宅园记》中也提出：“鸣鹤园位于镜春园西部，最初叫春熙院，是圆明园附属园林之一。”<sup>⑤</sup>海淀史地专家张宝章先生除了不同意侯仁之关于大学士明珠的自怡园在今北大校园以外，其余的观点，如上述的“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的水

田”，大部分在淑春园内，“淑春园园域广阔，园内水田就有一百二十多亩。”淑春园与绮春园只有一路之隔，位于万泉河南岸，原是大学士傅恒的宅园，后被内务府收回。乾隆四十五年将淑春园南部赐予和珅，更名“十笏园”；园北部即原春和园，改为“春熙院”，成为圆明园五园之一。<sup>⑥</sup>上述诸位，均为大家。于是，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就在今北京大学校园的北部，似乎已成为定论。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能苟同。《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曾刊发拙作《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辩及其它》。其后，我又发现新的档案资料，故不揣浅陋，再论及之。

首先，上述《清会典》中提到的“北楼门”到底在哪儿？从《燕园史话》附录三可知，今北大北部历史上的鸣鹤园、朗润园一带，既没有相关的楼，也没有朝北开的“北楼门”。（按，清时，面广五间的楼门本身就是御园的标志，王公大臣的赐园或私园，是绝不敢逾制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圆明园鱼跃鸢飞景区却有五间门楼的北楼门，亦称大北门。乾隆四十八年（1782）四月，公尚书福隆安奉旨：“铸炉处现造铜狮子一对，得时在万寿山东宫门外安设，换下石狮子一对，在圆明园北楼门外安设。”<sup>⑦</sup>而嘉庆六年（1801）

① 侯仁之：《燕园史话》附录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44页。

② 《燕园史话》附录一，第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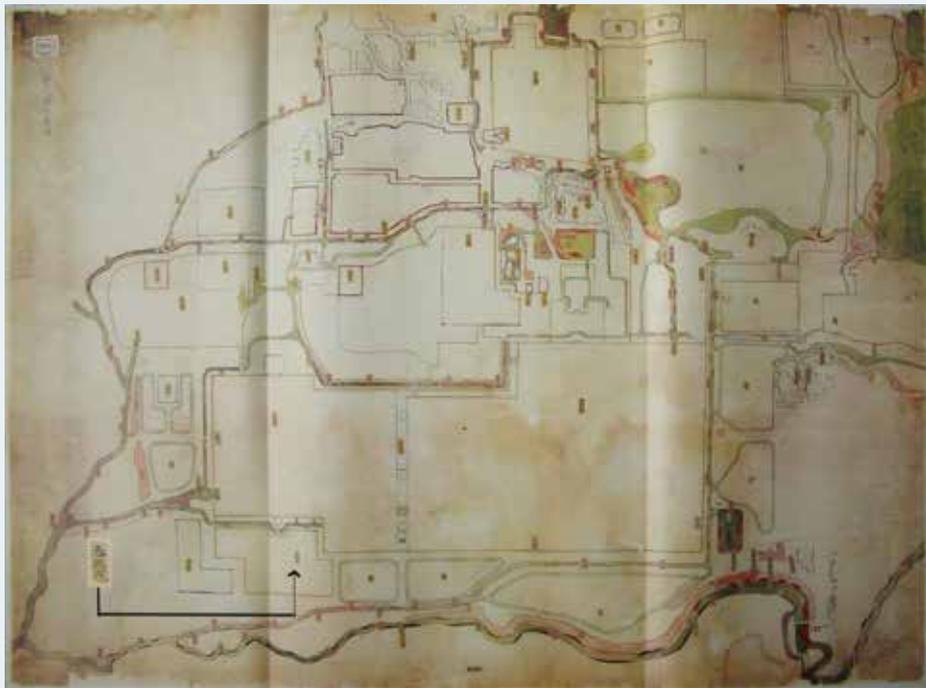
③ 《燕园史话》附录一，第148页。

④ 张恩荫：《三山五园史略》，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

⑤ 焦雄：《北京西郊宅园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⑥ 张宝章：《京西名园寻踪》，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1页。海淀区党史办：《海淀史志》2018年，第1期。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6页，



清同治年间的《圆明园河道图》（作者供图）

三月，奏准的“圆明园内外出入规条”中载：园内举办宫市活动时，“各行买卖及厨役人等”，以及“园内养蚕蚕户、种水田农夫，俱点名后由北楼门出入。”<sup>①</sup>

其次，清廷档案记录，乾隆三十五年（1770）四月，福隆安等奏：圆明园天宇空明（按，位于圆明园东北隅）“大墙外，开挖稻地六十四池，旧稻地开宽二十六池，新堆土山等项，共用银一千四百九十七两六钱七分五厘。”<sup>②</sup>

其三，乾隆皇帝二十六年（1761）的御制诗“稻凉楼”（按，位于圆明园北部北远山村景区）云：

绿塍浑是水云乡，触目知耕复课桑。

此处不须称避暑，北窗常引稻风凉。<sup>③</sup>

三十五年六月的御制诗“耕云堂”（按，位于圆明园北部若帆之阁景区）云：

山堂近北墙，俯视见墙外。

墙外复何有，水田横一带。<sup>④</sup>

这种种田园景象与上述《清会典》所载，内容完全吻合。故《清会典事例》中所言的“乾隆二十八年，奏准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的岁征租银事，所言及的北楼门无疑是在圆明园，而绝非在今北大校园北部。与之相关的淑春园亦不在后来的北京大学校园内，而是在长春园北墙

① 《圆明园》（下），第1046页。

② 《圆明园》（上），第139—1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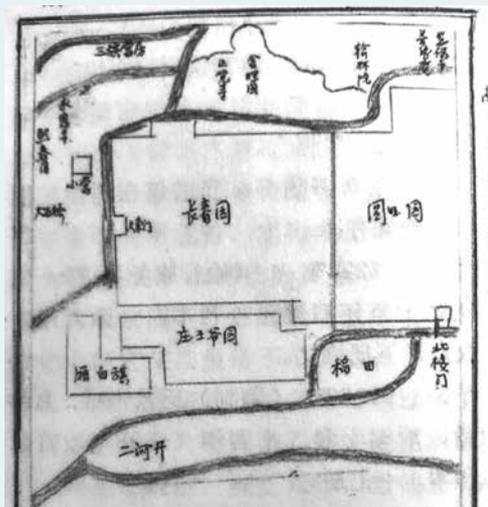
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14，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④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9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外，其时为康熙廿四子允祕的赐园。<sup>①</sup> 誠亲王允祕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后淑春园收归内务府。四十七年（1782）正月，上谕“淑春园改为春熙院”<sup>②</sup>。嘉庆七年（1802），遵旨：“春熙院著赏给庄静固伦公主居住”<sup>③</sup>（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第990页载：庄静为庄敬，误。今更正）。庄静公主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嘉庆七年十一月下嫁博尔济吉特氏固山贝子玛尼巴达拉，十六年（1811）五月卒。十九年（1814）正月，该园又赏给了庄亲王绵课。<sup>④</sup> 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档案中，有着明确的记载。绵课是康熙十六子允禄的孙子，历任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天理教林清起事，部分教徒闯入紫禁城，绵课与绵宁（按，即后来道光帝）持枪射伤数人，得旨议叙。<sup>⑤</sup> 很可能三个月后的赏赐春熙院，就是嘉庆皇帝对绵课的最大酬劳。

其四，国家图书馆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档·圆明园卷初编》收录有清同治年间的《圆明园河道图》，图中长春园北墙外，今二河开地方明确注有“春熙院”字样。<sup>⑥</sup>

另外，张有信先生著有《寻找庄亲王园》一文，其中亦载有其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临摹下来的清代《京城内外河道图》，图中也明确标注，长春园北墙外二河开以南地方为庄王爷园。<sup>⑦</sup>



摹京城内外河道图（作者供图）<sup>⑧</sup>

此时的庄亲王就是绵课。联系前述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未刊档案，绵课赐园春熙院的时间是嘉庆十九年正月，如果按“春熙院在北大说”，嘉庆十九年时，今日北大校园里的鸣鹤园、镜春园和朗润园，分别被乾隆十七子怡亲王永璇<sup>⑨</sup>、乾隆

① 参见拙作《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遗址考辨及其他》，《清史研究》2017年1期。

② 《圆明园》（下），第1052页。

③ 《圆明园》（下），第990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上谕档，档号：05-13-002-000470-0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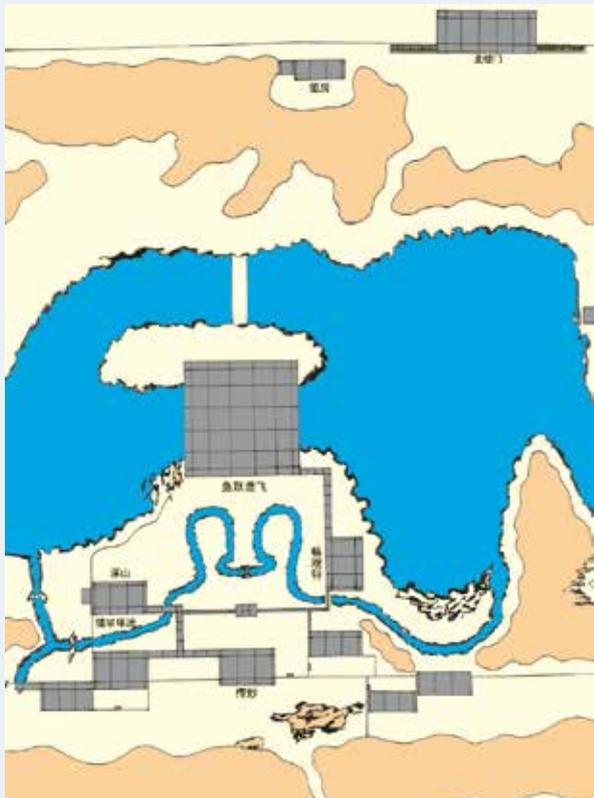
⑤ 《清史稿》卷219，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档·圆明园卷初编》，《圆明园河道图》，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⑦ 《海淀史志》2018年，第3期。

⑧ 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第16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9月。

⑨ 嘉庆四年二月，帝命怡亲王永璇迁出含晖园，住进原福长安园的中西部，即后来的鸣鹤园。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嘉庆诛灭和坤案》，《史料旬刊》第7期。永璇卒于道光十二年八月。



鱼跃鸢飞盛时平面图（作者供图）

帝曾长孙贝子奕纯<sup>①</sup>、乾隆八子庆郡王永璘<sup>②</sup>所占据。怎么可能会一园赏赐二主呢？

其五，《钦定日下旧闻考》明确记载：“圆明园内为门十八，南曰大宫门，……正北曰北楼门。”<sup>③</sup>

综上所述，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毫无疑问

就位于今长春园以北的二河开地方，它从来没有在北大校园内出现过。这一结论在嘉庆朝的《京城内外河道图》和同治朝样式雷的《圆明园河道图》中，均得到明确的印证。

### 春熙院的历史沿革

春熙院的前身，据作者考证是康熙廿四子允祕的赐园，名曰“淑春园”，<sup>④</sup>允祕是康熙帝最小的儿子，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比乾隆帝还小五岁。史载：雍正十一年（1733）正月，上谕曰：“朕幼弟允祕，秉心忠厚，赋性和平，素为皇考所钟爱。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学识亦见增长，朕心嘉悦，封为诚亲王。”<sup>⑤</sup>允祕首次封爵就封为亲王，他的赐园应在其封爵之后不久，也就是雍正十二年（1734）前后。乾隆继位后，与这个小叔叔关系极好，不仅授其正白旗满洲都统、管理宗人府、玉牒馆总裁等军政要职，命其于祭祀太庙时，“恭代行礼”。<sup>⑥</sup>而且经常携手同游，举杯共饮。如乾隆八年（1743）三月，乾隆有《春日同诚亲王和亲王游宴御园作》，其中有：

偶乘芳候遣几闲，乐事天伦礼法删。

春半园葩开笑靥，雨余山翠濯烟鬟。<sup>⑦</sup>

允祕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病故。其后园子被内务府收回，由赐园变为了御园，乾隆

① 嘉庆四年二月，原福长安园的东部，即后来的镜春园，赐予贝子奕纯。见《嘉庆诛灭和坤案》。奕纯卒于嘉庆二十一年。

② 嘉庆十四年正月，福康安子贝勒德麟将春和园，即后来的朗润园呈交。旋该园赏予庆郡王永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上谕档，档号：05-13-002-001912-0003。

③ 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80《国朝苑囿·圆明园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④ 见拙作《圆明五园之一春熙院考证及其他》，《清史研究》2017年1期。

⑤ 《清史稿》卷220，诸王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 《清高宗实录》卷55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6月。

⑦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13，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四十五年，并奉旨设置春熙院八品苑副一人，专司该园管理。翌年，再添设七品苑丞、八品苑副及笔帖式各一人。<sup>①</sup>四十七年（1782）正月，上谕“淑春园改为春熙院”。<sup>②</sup>春熙院命名后，乾隆帝首先命人修建春润堂宫门一座三间，两边朝房二座十间，<sup>③</sup>加固及油饰宫门内的三孔板桥。其次，修理园内各处殿宇、楼亭、游廊、房间、桥闸、牌楼等项工程，并增添园户头目等。<sup>④</sup>然后，不断的有粘修殿宇、补砌大墙、山石点景，以及捞堆坍塌的山石泊岸等岁修工程。<sup>⑤</sup>在修建整个春熙院的过程中，乾隆帝除题写园额外，还为各殿宇书写自对、横批、字条等，并命如意馆画家挥毫作画，为春熙院增光添彩。

嘉庆亲政后，其御园建设的重心在绮春园，但为驻蹕游览，他也曾命人对春熙院进行过小范围的修缮。<sup>⑥</sup>后分别赏给庄静固伦公主、庄亲王绵课居住。但绵课在春熙院没住几年，道光二年三月，因承修裕陵隆恩殿工程草率，被降为郡王、赐园缴出。旋又奉旨：“圆明园水湖住房赏庄郡王绵课。”<sup>⑦</sup>绵课迁出后，春熙院具体主人不详。

由上可知，作为御园的春熙院虽然仅仅存在了廿三年，但作为皇家园林的春熙院，其存世最少也将近百年。

### 御笔园额“春熙院”

乾隆非常崇拜他的祖父康熙皇帝，所以无论治国理政还是生活琐事，处处都仿效行之。如康熙帝先命名御园“畅春园”，后为胤祉赐园题额“熙春园”。乾隆也将大学士傅恒等缴出的春和园改称“绮春园”，后复将允祕的淑春园改名“春熙院”，其中都有“春”字，或“熙春”二字。像康熙帝命名畅春园的寓意一样，“非必其特宜于春日也”，系“先王体之以对时育物，使圆顶方趾之众，各得其所，歧行喙息之属，咸若其生。光天之下，熙熙焉，皞皞焉，八风罔或弗宣，六气罔或弗达，此其所以为畅春者也。”<sup>⑧</sup>意即命名“畅春”，是为了胸怀天下，让世间万物都能享受到帝王的雨露春风。

所以我们看乾隆在两首《题春熙院》诗中，均对“春熙”二字，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如：

第一首：

万物到春熙，何当院擅奇。  
由来一以贯，诂是此为私。  
自舞花如笑，能言鸟亦怡。  
登台吾夙愿，可尽被民斯。<sup>⑨</sup>

第二首：

万物到春来，无不具熙意。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72，内务府，官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 《圆明园》（下），第1052页。

③ 《圆明园》（上），第314页。

④ 《圆明园》（上），第268、277、282、287、314页。

⑤ 《圆明园》（上），第324、326、361、363、365、370、380、381、403、404、409、410、417等。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未刊上谕档，档号：05-08-006-000395-0039。

⑦ 参见拙作《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道光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⑧ 康熙《畅春园记》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33。

⑨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8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此院独擅名，享帚因名字。  
然吾此偶临，弗喜以愁对。  
向隅古有言，况向隅奚啻。  
湖北及安徽，淮扬遭早匮。  
清口倒灌黄，以致淤去岁。  
虽亟力赈蠲，诂普蒙实惠。  
吾民岂尽熙，顾名厖弗置。<sup>①</sup>

这里的“登台”即登春台。《老子》中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熙熙，为温和欢乐的样子。已过古稀之年的乾隆帝在这里表达了愿天下百姓都能够登春台，免灾难，“普蒙实惠”。

春熙院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以北，即今清河南岸名为二河开的地方。院以西正对着圆明园北墙外，有大片大片的稻田；院东是镶白旗护军营；院北为河滩湿地，水草丰美，为众多禽鸟栖息觅食之所。从圆明园流出来的水从院门前流过，与长春园七孔闸出水相会，流入万泉河，然后东北与清河相汇。宫门为一座三间朝南，两边朝房二座，各五间。主殿为春润堂，园内东西各有一片湖泊，东湖岛上有楼三间，可俯瞰全园。另有跨溪楼台静香阁，面向西山的披霞榭，竹林掩映的静娟斋，绿树丛中的融绿堂，依山傍水的书房雅涵堂，以及凝芳轩、月宜室、真赏室等十余处景观，各随山形水态，巧为安排，秋冬春夏，景色万千。乾隆帝非常喜欢这座山水园林，每到春天常来此地游赏，并留下了很多美丽的诗篇。从四十七年（1782）正月，到五十三年（1788）

春，七年之间乾隆帝咏春熙院及其各处景观的诗共二十首。<sup>②</sup>同时，在游玩中他也注意自省和告诫人们，“雅者文之宗，文者道之旨。优游得真詮，玩愒失正理。”<sup>③</sup>即适当的游览观赏，可以增加知识，但纵情玩乐，贪欲无度，则会适得其反。

### 乾隆帝与“白衣学士”

清代的圆明园里曾饲养很多珍禽异兽，其中乾隆最喜爱和关心的莫过于仙鹤了，他称其为“白衣学士”。春熙院内有一处景观名“鹤来轩”，乾隆吟咏该园的第一首诗，即《戏题鹤来轩》：

名曰胎仙岂实胎，误因禹锡笑渊材。  
不笼无事放之去，傍砌有时招亦来。  
刷羽悠然栖古柏，鸣阴夏尔覩春梅。  
孤山处士前年约，许汝翩投御苑陪。<sup>④</sup>

诗中的首联，给我们讲了一个典故，是说北宋末年有个名彭几，字渊材的儒生，其行为酸腐，好说大话。他家中养鹤，并相信鹤是胎产的，有一次他对客人夸口说：“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话没说完，一园丁即来通报说“鹤夜生一卵”，彭渊材呵斥道：“敢谤鹤耶？”不久，鹤展颈伏地，复诞以卵。渊材叹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按：唐中晚期著名诗人和政治家）《嘉话》所误”。诗中“名曰胎仙岂实胎，误因禹锡笑渊材。”就是讲述了这个故事。

颌联与颈联描述的是原来笼养在春熙院的仙鹤，被放归大自然后，仍游憩在周围而不愿离去，有人招呼便又回到园中，悠然的栖息在古柏

①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2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② 参见拙著《圆明园五朝御制诗文集》第四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0月。

③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8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④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8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上，一边梳理着羽毛，一边欢叫着欣赏春日的梅花。

尾联再言孤山处士也称梅妻鹤子的典故。北宋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后人以林逋德才兼备，隐居孤山，故称他为孤山处士。乾隆帝在这里以穿越时空的浪漫主义写法，写出了诗人与仙鹤之间的交流，给人以情景再现之感。

古代梅妻鹤子的故事，也是后来文人隐士们所向往的超凡脱俗的生活意境。但作为太平天子的乾隆皇帝并不像旧时隐士或不得志的诗人墨客那样，以咏鹤来抒发自己的孤寂和郁闷，或渴望得到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乾隆的咏鹤诗更多的则是表达帝王的治世观和他对鹤的一种情感。如当时园中养鹤是有鹤粮的，一些园吏便借机贪污鹤粮，同时为取悦帝后观赏，还往往用剪毁鹤翅的办法，以防止它们远飞不归。对此，乾隆皇帝非常气愤，曾多次明言禁止。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乾隆帝仿照历史上“支公放鹤”的故事。先是于承德避暑山庄，将御园笼养的仙鹤全部放飞，任其自由翱翔。并仿古人将放生之处改建为

“放鹤亭”。其后，乾隆帝又命人将香山静宜园和圆明园的笼中之鹤，也全部放飞。

在另一首《戏题鹤来轩》诗中，乾隆帝咏道：

养鹤虽高致，恐去翦双羽。  
是乃拂其性，未惬鹤心所。  
弗翦任自然，非图省梁黍。  
翼长旋能飞，碧空听盘翥。<sup>①</sup>

在乾隆帝看来，御园里饲养仙鹤无非是宜人耳目，增加景观，他的开笼放鹤，并不是为节约那点粮食，而是为适应鹤的天性，让其能自由自在的翱翔天际。

乾隆帝在圆明园的咏鹤诗，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许没有更多的称道之处。但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从他的“快哉得其安，漫议庭禽少”“非关稻粱省，欲使翥翔欢”<sup>②</sup>“斋安鹤未安，鹤安斋亦安”<sup>③</sup>（按，与春熙院一墙之隔的长春园里有一处景点名“鹤安斋”）等质朴无华的诗文中，反复提倡的保护鸟类动物，提倡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今天，无疑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收回春熙院遗址，还给圆明园。如果说盛时的圆明园已不可能重建，但保护好圆明五园的遗址，以教育华夏的子孙后代，则是我们这一代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①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8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② 《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8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③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8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 乾隆帝：三山五园的总设计师

赵连稳

三山五园是对清代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的统称，这里山清水秀，可谓“西山秀色甲天下”。美妙绝伦的景色吸引着辽、金、元、明、清几朝帝王的目光，他们在这里陆续建造了许多行宫别苑。至清朝，统治者更是在此建造了大片皇家园林。康熙、雍正时期，陆续兴建了畅春园、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并在香山修建行宫（乾隆朝时改名为静宜园）。乾隆时期，国力强盛，财力充足，这为乾隆帝大兴园林工程创造了条件，通过扩建、新建和修缮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和畅春园等御园，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乾隆帝将京西的皇家园林打造成为一个绵延二十余里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至此，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正式形成，并且达到鼎盛。在这个过程中，乾隆帝亲自规划设计、指导施工，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是三山五园的总设计师。

## 一、把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建设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乾隆初期，圆明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

园和畅春园都得到了扩建或修缮，但在圆明园、畅春园和玉泉山静明园之间尚有一片空白，怎样填补这个空白呢？因为在圆明园建成以后，乾隆帝曾在《圆明园后记》中说：“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斯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sup>①</sup>当时，随着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扩建和京师经济社会的发展，京西皇家园林、京西稻田和京城以及漕运用水量大增，原来的京西水利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用水需要，而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瓮山泊泥沙淤塞，渐有山洪泛滥之忧。乾隆帝决定借大规模疏浚瓮山泊、为皇太后祝寿之机，在这里兴建一个皇家园林。乾隆十四年（1749）六月，在对玉泉山水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乾隆帝决定首先对瓮山泊进行深挖，并使其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疏浚以后的湖水面积和深度都扩大两倍，所谓“两倍于旧”，使之上引玉泉、下接长河。挖出的泥土则堆积到瓮山东麓，使瓮山更加雄伟。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三日，乾隆帝下诏将瓮山改称为万寿山、瓮山泊命名为昆明湖。乾隆帝对疏浚后的昆明湖

<sup>①</sup> [清]于敏忠等.《日下旧闻考》：卷80[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23—1324页。

非常满意，吟诵道：“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为了给修建新的御园寻找理由，乾隆帝又说：“盖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sup>①</sup>意思是说如此山水之美景，如果不在其间建造亭台楼阁作为点缀，简直是太遗憾了！

于是，乾隆帝在昆明湖的北侧新建了大报恩延寿寺、佛香阁等建筑。乾隆十六年四月，乾隆帝颁下谕旨，“以万寿山行宫为清漪园”。乾隆二十九年（1764），万寿山清漪园基本建成。同时，圆明园周边还新建、修缮了许多附属园林，如淑春园、熙春园和泉宗庙等。至此，方圆几十里的京西皇家园林连成一片，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正式形成。

建成后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布局是很有讲究的。著名的三山五园史专家张宝章先生说，万寿山清漪园的知春亭岛和玉泉山主峰定光塔、香山静宜园宫廷区形成一条东西轴线，这条轴线和圆明园、畅春园南北轴线的中心点交会。从玉泉山上俯瞰，东边的畅春园、圆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鼎足而成，而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成为畅春园、圆明园和清漪园的借景。<sup>②</sup>

乾隆帝在完成了对瓮山泊的疏浚以后，又继续疏浚玉泉山水系上游和万泉河上游的河湖水道，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形成了两个水系，即从西部山区东来的玉泉山水系和从南边巴沟低地北流的万泉河水系。

玉泉山水系源于卧佛寺西北的樱桃沟泉水，这里是整个西山泉水的源头。金、元时期，玉泉山一带泉水涌流、泓澄百顷，统治者有计划地



乾隆像（宁葆新提供）

疏浚了玉泉山泉水流往瓮山泊的天然渠道。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修建了从樱桃沟、香山静宜园和由香山碧云寺水泉院东流的引水石渠，把西山诸泉水导入玉泉山静明园的涵漪湖，然后再注入万寿山清漪园的昆明湖，不仅解决了上游园林用水问题，而且满足了因为昆明湖体量扩大后对水量的需求，而从昆明湖流入圆明园的水则使万寿山清漪园和圆明园一脉相连。乾隆二十九年，又对万泉河发源地万泉庄、巴沟一带诸泉与万泉河河道进行疏浚，使巴沟和万泉庄的泉水向北流入畅春园南面的丹棱汛，由丹棱汛流经畅春园和圆明园后，注入清河。

至此，乾隆帝通过兴修水利，在京西建成了

① [清]于敏忠等.《日下旧闻考》：卷84[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393页。

② 张宝章.《三山五园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一个河湖水利网，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畅春园、圆明园，还有周边其他一些附属皇家园林连成一片，打造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西至现在的海淀区界、东到今清华大学校园、北起寿安山南麓、南达今中国人民大学西边的圣化寺、泉宗庙，方圆几十里的区域内遍布着几十座皇家园林，标志着京西皇家园林进入了鼎盛时期。

## 二、为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的代表园林设计各自的功能定位

为了更好地发挥京西皇家园林的作用，乾隆帝对京西皇家园林的代表——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各自的主要功能进行了划分。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写道：“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sup>①</sup>意思就是：畅春园用于奉养皇太后，圆明园用于皇帝日常居住和理政，万寿山清漪园和玉泉山静明园作为皇帝理政之余消闲养心之处，至于香山静宜园则是皇帝游憩兼理政的地方。这是乾隆帝对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的五个代表性园林主要功能的定位，构成他对京西皇家园林区规划的重要内容。

畅春园奉养皇太后的功能始于康熙年间，但作为专门奉养皇太后的地方则始于乾隆初期，后又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帝移住畅春园后，就把祖母孝庄皇太后与嫡母孝惠章太后接到畅春园内的澹泊为德行宫居住下来，两位皇太后“喜居郊园”，对

畅春园的环境十分满意。乾隆二年(1737)，乾隆帝对畅春园进行修缮，并将澹泊为德行宫改名为“春晖堂”，取“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中“春晖”的母爱之意，其后的寝殿改称为“寿萱春永”，作为皇太后常年居所。次年正月，乾隆帝将生母崇庆皇太后接到畅春园居住，皇太后除节庆日移住圆明园的长春仙馆外，其余的日子均住在畅春园里，乾隆帝时常前来请安，极尽赡养义务。

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皇太后去世，乾隆帝诏谕把畅春园作为今后奉养皇太后的永久场所，“若畅春园，则距圆明园甚近，事奉东朝，问安视膳，莫便于此，我子孙亦当世守勿改。著将此旨录写、封贮尚书房、军机处各一分，传示子孙，以志毋忘。”<sup>②</sup>但自乾隆四十二年到嘉庆时期，清朝却一直没有皇太后，畅春园开始衰落。道光时期，清朝重新有了皇太后，但此时的畅春园已经相当破败，道光帝以畅春园年久失修、不堪使用，而修缮又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完成为由，遂把皇太后安置到圆明园内的绮春园奉养，他在诏令中说：“朕再四酌度，绮春园在圆明园之左，相距咫尺，视膳问安，较之畅春园更为密迩。且系皇太后夙昔临莅之区，居处游览，罄无不宜，于此尊养承欢，当于近奉东朝之旨尤相契合也。”<sup>③</sup>此后，畅春园丧失了奉养皇太后的功能，迅速衰败下去。

在清代，紫禁城主要是朝廷举行“大祀”“大朝”“大典”和“大宴”的地方，从雍正帝开始，一直到咸丰皇帝，清朝5位皇帝在圆明园理政

① [清]于敏忠等.《日下旧闻考》：卷84[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393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26[M].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丙申。

③ 《清宣宗实录》：卷18[M].道光元年五月戊辰。

138年，圆明园可谓是园林中的紫禁城。雍正帝说：“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也，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误。”<sup>①</sup>嘉庆帝也说：“朕今驻蹕圆明园，则相近地界，即与（紫）禁城无异。”<sup>②</sup>圆明园前朝后寝，从大宫门开始，两侧建有转角朝房和东西朝房，进二宫门后，建有面宽七间的正大光明殿，功能同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东边则为五开间的勤政殿，是清帝御门听政之所，功能同宫内养心殿，再往北就是九洲清晏，此为帝后寝宫区。为方便奏事和传谕，在皇帝理政场所旁边建有各衙门办公机构，如军机处、内阁房、六部朝房、都察院、翰林院、理藩院、南书房、银库等。

乾隆帝在《圆明园后记》中说：“夫帝王临朝视政之暇，必有游观旷览之地。”<sup>③</sup>圆明园和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之间有水道连接，舟楫相通，皇帝在理政疲劳之时，便可以坐船前往游览散心。由于建造万寿山清漪园违背了不再修建园林的承诺，故万寿山清漪园建成后，乾隆帝给自己定了规矩，就是去万寿山清漪园“散志澄怀”，必须是上午去，中午返回，所谓“逮午而返”，不在园中居住，直到他去世前的35年间，乾隆帝从未食言。乾隆帝非常喜爱玉泉山静明园的泉水、宝塔和山洞，经常前往观赏，并且留下大量诗篇。乾隆帝以后的嘉庆、咸丰皇帝也常常到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游览。

由于香山静宜园距离圆明园稍远，清帝在这里游览之余，还要理政，为此香山静宜园建有勤

政殿。另外，我们根据乾隆帝在香山静宜园建造宗镜大昭之庙、健锐营、碉楼和团城阅武楼这些建筑来看，香山静宜园还有笼络蒙藏、训练八旗健锐营士兵的功能。

畅春园和圆明园周围的附属园林，有的是赐园，有的是私家园林，作为大臣的居所，方便他们辅弼帝王，所谓“翼赞机政”。

### 三、使三山五园体现“大一统”天下观和“重农务本”等基本国策

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时刻想着治国理政的大事，在他设计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区就体现了“大一统”天下观和“重农务本”“兴黄教以安蒙古”“以孝治天下”等基本国策。

“莫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乾隆帝在扩建、新建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等园林过程中，把南北各地的特色园林景观巧妙地移植进御园内，体现了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天下观。从乾隆七年（1742）开始，乾隆帝对圆明园整体布局进行重新设计，开建新的景区，除去完成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建筑以外，又仿照无锡的寄畅园改建了廓然大公，仿照海宁陈氏的隅园改建了四宜书屋，并重新命名为“安澜园”，又把杭州西湖的“断桥残雪”等十景移植到圆明园。而乾隆十年（1745）全面开建的长春园则完全按照乾隆帝的设计施工，内有仿照杭州汪氏园建造的小有天国、仿照江宁瞻园建造的汝园和鉴园、仿照苏州园林建造的狮子林，还有仿照法国凡尔赛宫建造的西洋楼景区。在修建万寿山

① 《清世宗实录》：卷36[M].雍正三年八月壬辰。

② 《清仁宗实录》：卷243[M].嘉庆十六年五月癸未。

③ [清]于敏忠等.《日下旧闻考》：卷80[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323页。



三山五园地图（作者供图）

清漪园时，乾隆帝充分展示了自己在园林设计中的才能，首先通过叠山理水，使万寿山清漪园的山水格局更加壮观，然后，在山水之间建造最美的景观，乾隆帝每次南巡江浙，每每看到心仪的美景，便让随行画师描绘下来，如杭州西湖的亭榭楼阁、山湖桥堤等，以便回到北京后在万寿山清漪园仿建。万寿山清漪园的望蟾阁、邵窝、惠山园、十七孔桥等分别是仿照武昌的黄鹤楼、河南的安乐窝、无锡的寄畅园和宛平的卢沟桥等建成的。

乾隆帝设计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还充分反映了清朝的基本国策。首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如圆明园北部建造的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多稼如云等景区和万寿山清漪园内昆明湖西北岸边的耕织图、西南角的畅观堂和南湖岛的广润祠，以及玉泉山静明园内的溪田课耕等景区，都彰显了乾隆帝“重农兴穡”，以农立国的基本国策；其次是“重视黄教”的基本国策，如三山五园内建造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无论是圆明园内有“佛国”之称的舍卫城、唯一保留至今的正觉寺，还是万寿山清漪园内以西藏著名古刹

桑耶寺为设计蓝本的四大部洲和香山静宜园内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祝寿而建的宗镜大昭之庙等，无不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国策；再次是“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如从把畅春园修缮一新作为专门奉养皇太后的场所，到为了给母亲祝寿在万寿山清漪园兴建大报恩延寿寺，都体现了乾隆帝“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

由上述可见，在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形成的过程中，乾隆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下令兴修京西水利的同时，修建了万寿山清漪园，并且对京西皇家园林区的其他园林进行了扩建和新建。三山五园皇家园林是清朝留给北京城的重要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利用。目前，要加强对三山五园的保护利用，使其承担不同的功能，如建立圆明园遗址博物院，把圆明园建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打造颐和园世界文化遗产金名片，把颐和园建成国内外闻名的游览胜地，让游客领略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之美；恢复香山静宜园二十八景，使其成为人们游览健身的好去处，同时发挥好以双清别墅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作用。

# 按照《水经注》的指向寻找戾陵堰

 张文大

《水经注》介绍三国时期，征北将军刘靖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梁山下开车厢渠，造戾陵堰，引灋水（今永定河）入高粱河，经过昌平到通州，灌溉农田万余顷，实现“三更种稻”，军民粮食问题得到解决。戾陵堰筑在梁山南的灋水河道上，梁山上有一座西汉时期燕刺王刘旦的戾陵，堰故名戾陵堰。

戾陵堰在哪里？专家、学者、文物爱好者苦苦寻找了几十年，还是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对《水经注》所记理解的是否正确，寻找的方向是不是存在问题，值得反思。接下来，需要按照《水经注》指引的方向继续寻找。

**一、《水经注》里的梁山、高粱之水、高粱水、车厢渠在蓟城西北。车厢渠、高粱河是一条河。**

《水经注》卷十三灋水篇云：高粱之水注入灋水，高粱之水是灋水的支流。原文：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其水又东南入

灋水。<sup>①</sup>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既然是蓟城西北平地泉，平地泉和蓟城是西北、东南关系。平地泉‘东注、又东迳’是流不到蓟城北的。所以，《水经注》的这段话应该作适当修改：“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南注，迳燕王陵北，又东南迳蓟城北。”高粱之水即是发源于蓟城西北高梁山的河流，梁山位于蓟城西北，梁山上的戾陵无疑也在蓟城西北。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篇谓高粱水：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粱水注焉。首受灋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sup>②</sup>高粱水之首是戾陵堰，高粱水从梁山南往东流，再改向东北流。在向东北流时，南岸有一通刘靖碑。高粱水从东北流又改向东南流，到蓟城北。再往东流到通州，汇入鲍丘水，即潞河、北运河、笕沟。从戾陵堰到通州称高粱水。高粱水只要向东南流的河段大于向东北

<sup>①</sup>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6页。

<sup>②</sup>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22页。

的河段，梁山、戾陵堰、高粱水首就都在蓟城西北方。

《水经注》卷十四抄录了高粱水南岸刘靖碑碑文中一句话：水流乘车厢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sup>①</sup>这里描述的车厢渠是广义的，包括了天然的高粱水和人工的车厢渠。车厢渠和高粱水流动的方向完全一致，是一条河。车厢渠（高粱水）从戾陵堰分得部分灋水水，经过车厢渠进入高粱水，流经昌平、蓟县北，最终流到潞县（今通州）汇入潞河。

## 二、清末关于戾陵堰的两种不同观点

《光绪顺天府志》曰：刘靖碑所谓车厢渠者，金元之金口河也，在今京城之西。<sup>②</sup>

金口在石景山区石景山、龙首山、黑头山之间，石景山高 183.77 米，龙首山 109.9 米、黑头山 219.33 米。石景山与龙首山之间称南金口，海拔 90.6 米。龙首山与黑头山之间称北金口，海拔 92.4 米。永定河从北而来，迳石景山西侧南流。现在石景山西北的永定河河底海拔约 80 米。金代开金口河从金口上游海拔 95 米的麻峪引水，沿四平山、黑头山山麓开凿一条引水渠，引水到金口。平水期水可以过海拔约 90 米的南金口或北金口东流。由于金口高于金中都城约 45 米，悬殊的落差加上超量的洪水，给平原村落和金中都城造成了危害。金代引卢沟（永定河）水失败了。

元代郭守敬仍然从麻峪引水，吸取了金代金口河的教训，在接近金口的位置开挖一道减河，使超量洪水通过减河回到永定河主河道，避免洪水给金中都城、元大都城造成严重灾害。但金口

洪水对都城安全仍是威胁。在使用金口 25 年的时候，郭守敬在昌平寻找到代替金口河的新水源白浮泉，开辟了通惠河。在金口河 30 岁的时候断然堵闭废弃了金口，只用通惠河。

元代末期曾从地势更高海拔约 100 米的三家店取水过金口，当开闸放水之时，“水势建筑，漫不可遏，居民遑遑，岸皆崩陷”，立即关闭闸门。工程主谋者被杀。

金元三开三闭金口，说明金口因地势过高，洪水威胁城市安全，是不可久用的。

金元三次开金口河，皆从上游取水，以过海拔约 90 米的金口。戾陵堰的取水方式与金元金口河的取水方式截然不同。酈道元在《水经注》鲍丘水篇抄录了高粱水南岸刘靖碑的全文，文中称戾陵堰为戾陵遏：“长岸峻固，以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开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两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sup>③</sup>戾陵遏主遏是横截在河道中间，以提高水位，使水流入水门、进车厢渠。主遏高一丈，约合 2.42 米。东西长约 72 米，南北宽约 100 米。用竹笼（荆笼）装上石块码放在河道中成为主遏。主遏之上以石块叠筑成 24 米长的遏，遏的高度可视需要或高或矮。平时主遏加遏的高度，使水面提高到 3 米有余，水从水门流进车厢渠。洪水暴发，“乘遏东下”，石块堆积的遏被冲毁，水面降低，进入水门的水量减少，保障了车厢渠的安全。主遏因体积大而无损。洪水过后，再重修遏。从“依

①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24页。

② [清]周佳楮、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98页。

③ [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十四、鲍丘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24页。



图1: 清嘉庆《永定河全图》(作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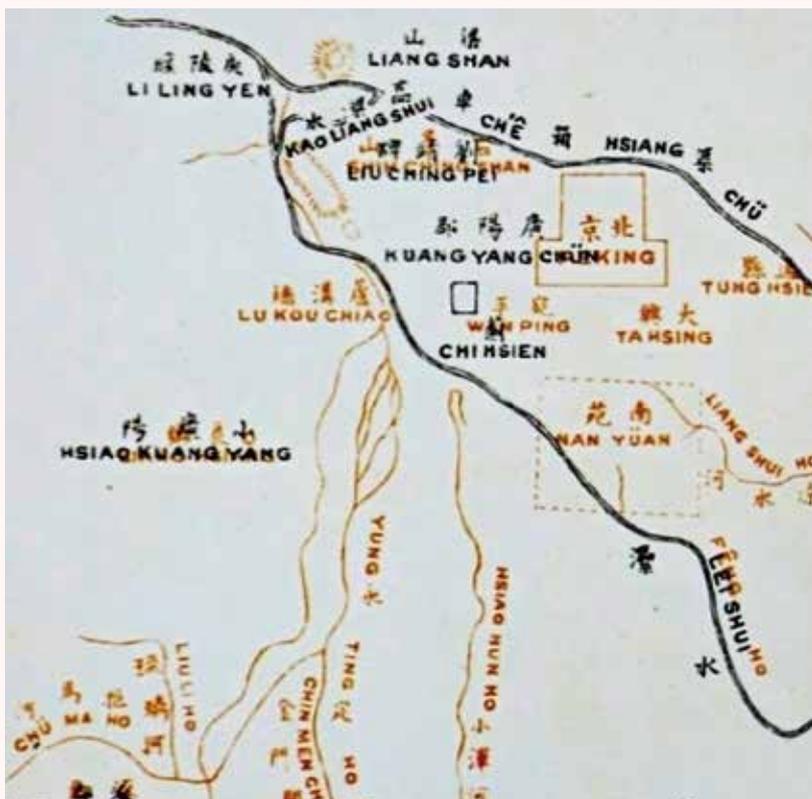


图2: 魏代之浑河(摘自《北京西山地质志》(作者供图))

北岸开水门”可知戾陵遏建在东西向的河道中,河道宽约百米。

戾陵遏主遏只有 2.42 米高,遏估计 1.2 米左右,总高约

3.6 米。河底海拔约 80 米,如果在金口以西筑遏,河面高只有 84 米,河水越不过 90 米的金口。由于金元金口河与三国时期戾陵堰建筑构造不同,金口河过金口是历史事实,在石景山金口以西建戾陵堰,水不能过金口。所以,依金口河推断戾陵堰也在金口行不通。

这是清末主张车厢渠在京城西石景山的一种观点,对之后戾陵堰研究影响很大。

清末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戾陵堰在京城西北。《畿辅通志》云:戾陵遏,在宛平县西北,安各庄南,两梁山间,古高粱河旧渎上。<sup>①</sup>清代宛平县域呈“冂”形,在北京城西部,西北端为幽州、安家滩;西南端为百花山;东北端是清河,正南端至大兴榆垓。宛平县西北大致含门头沟区大部,海淀区百望山以西。《清嘉庆永定河全图》(图1)画大梁、二梁山在永定河左岸,三家店、黑崖根以北。黑崖根在香峪大梁西端,香峪大梁即二梁山。大梁山是今天的阳台山,因形似桥梁得名。现在阳台山东麓村民称阳台山为西大梁。大梁、二梁之间的灰口村铁

① [清]李鸿章、张树声、黄彭年修《畿辅通志·三》卷八十六,河渠十二,堤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92页。



图3: 永定河变迁图(摘自《侯仁之与北京地图》)

(作者供图)

路洞口前 50 米有个季节泉,俗称大白水。每当夏秋雨季,喷涌而出,水量极大,(可冲翻马车),形成大河,涌流数月,出寨口沟到高里掌。大白水应是高粱河旧渎。高里掌是高梁庄谐音。高里掌地下埋藏 298 万立方米草炭,可以证明古代高里掌一带水源充沛有流成高粱河的条件。

### 三、民国时期专家主张戾陵堰在宛平县西北

地质专家叶良辅的《北京西山地质志》<sup>①</sup>附录了“石景山附近永定河迁流辩”一文,并引用直隶水利委员会的四幅插图,其中第 2 幅为北魏之浑河。(图中石景山北侧不应该有高粱水)。灋水、车厢渠位置不一定准确,石景山位置应该在北京城正西。车厢渠画在梁山之南,切合《水经注》说的“东迳梁山南”。此梁山距石景山较远,肯定不是四平山或黑头山。车厢渠不经过石景山北的金口。所以图中的戾陵堰在京城西北方,而不

在石景山。

民国时期的《永定河变迁图》<sup>②</sup>与《北京西山地质志》图大同小异。戾陵堰在京城西北方,并标出梁山在北纬 40° 线上。石景山北纬 39° 55', 图中的梁山不是石景山。实测军庄西永定河北岸是北纬 40°, 证实戾陵堰在北京西北方的军庄附近。

### 四、“戾陵堰在石景山”成为定论

1984 年出版的《北京历史纪年》记:二五〇年,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魏驻蓟城的镇北将军刘靖为巩固边防,屯田种稻,组织军士千人,在梁山(今北京石景山)修戾陵堰,开车厢渠。<sup>③</sup>

1991 年出版的《今日北京》“刘靖”条:曹魏嘉平时(约 250 年)人,官至镇北将军。驻蓟城屯田种稻。组织军士千人,在梁山(今石景山)修戾陵堰,开车厢渠,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sup>④</sup>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采用历史学家研究成果,肯定戾陵堰在石景山,并写进了辞书,成为毋庸置疑的定论。这一定论与清末的第一种观点相合,与民国时期水利专家意见相悖。

### 五、定论的来龙去脉

1961 年 11 月 2 日,《北京日报》刊登侯仁之先生《戾陵堰与车厢渠》一文说:戾陵堰是一座拦水坝,建造在今日永定河(古灋水)东岸、石景山(古梁山)的山下。车厢渠是一个引水渠,它的开凿则是把由遏分出的永定河水,平地导流,

① 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宣传部主编《北京西山地质志》,团结出版社,2016年,第214页。

② 岳升阳主编《侯仁之与北京地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3页。

③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编《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1页。

④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今日北京》历史卷、名胜卷,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

经过现在八宝山以北向东偏北，直注于高粱河的上源。如前所述，这就是现在紫竹院公园湖泊的前身。<sup>①</sup>

文章确定戾陵堰在石景山，石景山是古梁山。依据何在？《北京城市历史地理》<sup>②</sup>作如下回答：

《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条载：“高粱水注之，首受灏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陵，故以戾陵名堰。”按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冢墓·宛平县条载：“汉燕刺王旦陵在县境西。”据考，梁山即今之石景山。<sup>③</sup>

《光绪顺天府志》载宛平县图呈“冂”形，县境西可理解为横笔画。图注：“宛平西，除城属十五里外，至宣化保安界一百七十五里，至治二百七十里……西北，除城属十五里外，至怀来界，二百十五里。”<sup>④</sup>宛平县东西长二百里，北京小西山、大西山的百十座山峰均在“县境西”范围内，怎能证明县境西的石景山就是《水经注》记载有戾陵的梁山？有没有可能《光绪顺天府志》的“县境西”后面漏掉了一个“北”字？在石景山考古发现戾陵前，不能确定“梁山就是石景山”。宛平“县境西”与《水经注》记载的“蓟城西北”方向矛盾，石景山自然不是《水经注》

的梁山。

史学家发现，高粱水（车厢渠）从梁山南向东流，车厢渠如果在金口，是在石景山（梁山）北，所以石景山不是梁山，金口北侧的黑头山、四平山才是梁山。2011年5月《北京水务》登载的《戾陵堰、车箱渠位置的新释读和寻迹》果断肯定“历史上的梁山应为今日的黑头山”<sup>⑤</sup>。《车箱渠所在位置及相关地物考辨》<sup>⑥</sup>的文章则认为，黑头山西面的四平山才是梁山。《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认为金顶山是梁山：

郦道元所说的灏水就是今天的永定河，永定河自今天的三家店出山后南流，再经过石景山以南。北魏时灏水又称清泉河，梁山则是现在石景山东北的金顶山（旧称狼山）。曹魏时曾从梁山附近引灏水入高粱水，所以《水经注》中说“高粱水出焉”。北魏时灏水的河道与今天的永定河有比较大的差别，大体上是从现在的卢沟桥附近折向东北方向流。由蓟城以南七里的地方经过，又继续东流，最后与洗马沟水汇合。<sup>⑦</sup>

《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城》称老山是梁山：戾陵堰故址当在今老山附近，而车厢渠当自今老山附近向东北至今紫竹院处。<sup>⑧</sup>《高粱河新证》一文写道：梁山，顾名思义就是鱼梁之山……

① 侯仁之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49页。

②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第55页。

③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第55页。

④ 清周佳楮、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插图，宛平县图。

⑤ 李善征、刘延恺、方伟、龚秀英《戾陵堰、车箱渠位置的新释读和寻迹》，载《北京水务》，2011年，第5期。

⑥ 吴文涛《车箱渠所在位置及相关地物考辨》，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⑦ 侯仁之、邓辉著《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⑧ 尹钧科、吴文涛著《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01页。

高粱水的高粱就是老山的鱼梁……老山是名副其实的梁山。<sup>①</sup>

“石景山是梁山”遭到众多专家的否定。然而专家各执一词，提出多个梁山，孰是孰非让人捉摸不定。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石景山寻找戾陵遗迹，至今没有结果。有人宣称戾陵找到了，却久久不见新闻报道和考古发掘报告。2000年发掘老山汉墓，有人以为是刘旦的戾陵，结果不是。戾陵究竟在哪？究竟哪里是梁山？在没有考古发现之前只能去问《水经注》。

另外，高粱之水源头是不是紫竹院前身？《水经注》说：高粱之水，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东南）注，迳燕王陵北。又东（东南）迳蓟城北。<sup>②</sup>《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写道：“\*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又东迳蓟城东，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水。’”（\*原文漏字，本文补。当为灋水。）

这里叙述的高粱水和在梁山以南由灋水分出的高粱水有别。梁山以南分出的高粱水，实际上是经由人工渠道（车箱渠）把所分水导入了天然高粱水的上源。这一段所写的，正是天然的高粱水。水出蓟城西北平地，即是现在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湖泊的前身。这里现有人工渠道西北直通昆明湖，名为长河。不过这是金以后才开凿的，原所未有。原来的高粱水从此发源，东南流经蓟城

北，又转而东南，经蓟城之东十里，又东南流入灋水，这就是现在从紫竹院东流的小河，曾经白石桥入北护城河，至今仍保留着高粱河的名称。只是在入今护城河后，又自何处起转而东南，难以确指，不过到了外城东南隅左安门之外，才见其故道遗址，下游经十里河村东南入凉水河。应该注意的是当时的高粱水所经，自蓟城之北，转而城东，西去蓟城，约有10里。<sup>③</sup>

《水经注》原文高粱水东迳梁山南，又东北经过刘靖碑北。再东南流才到蓟城北。本文的高粱水从梁山（石景山）北东流，没有经过刘靖碑北就到了蓟城北的紫竹院。本文认为天然高粱河（高粱之水）源自紫竹院，紫竹院如果是蓟城西北平地泉，水东流，经过有燕王陵的梁山北，紫竹院以东没有梁山，更没有燕王陵。这段文字开头所引的《水经注》原文省略了“迳燕王陵北”，就不是《水经注》原意。所以，紫竹院不是《水经注》高粱之水的源头。

### 六、梁山、高粱水、高粱之水、戾陵堰、车箱渠首在北京城（蓟城）西北。

元代诗人马祖常有诗云：天下名山护此邦，水经曾见驻高粱。一觞清浅出昌邑，几折萦回朝帝乡。<sup>④</sup>短短几句诗告诉我们，发源昌平的高粱河就是《水经注》里的高粱河。《析津志》记载：高粱河，原出昌平县山涧，东南流至高粱店，经宛平县境，由和义门北水门入抄纸坊泓渟，逶迤自东坝流出；高粱入海子内，下万宁闸，与通惠

① 武家璧《2018年第五届北京三山五园研究院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46页。

② [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十三灋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6页。

③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63页。

④ [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北京燕山出版社，1983年，第96页。

河河流，出大兴县潞河。<sup>①</sup>

昌平区山涧即今昌平区阳坊镇的前、后白虎涧和海淀区苏家坨镇的前、后沙涧。高粱店即今海淀区温泉镇的高里掌村。高里掌是民国时期依高立庄（高丽庄、高李庄）谐音写成。高里掌地下埋藏有距今 10100—7500 年形成的草炭矿，证实古代水资源丰富，能够流成大河。白虎涧、沙涧、高粱店都在阳台山东麓。阳台山东麓的村民至今称阳台山西大梁。阳台山形似桥梁，主峰高 1278 米，故得名大梁、高粱，山下聚水成河故称高粱河。高粱河源自昌平，穿过元大都城，东至通州，统称高粱河。高粱河历尽沧桑，改变了面貌，致使今天的老北京人只知道西直门外高粱桥下是高粱河。

高粱河上游临近温榆河。金代韩玉曾引温榆河一亩泉水入高粱河济漕。《光绪顺天府志》记：金运河导源一亩泉。金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通漕。世宗时，开卢沟金口通漕无功。泰和中，韩玉建言，开潞水漕渠，盖用一亩泉为源也。<sup>②</sup>一亩泉在温榆河上游，属温榆河水系，是温榆河的干流。高粱河的一条支流坝河汇入温榆河下游，高粱河另一支流曾汇入灏水（永定河）。高粱河既是温榆河的支流，又曾是永定河支流。韩玉将一亩泉水调入高粱河，必须开一段人工河道，明代天顺《昌平州志》记载为官河。官河北起双塔，南至高粱河上游。元代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泉水西折汇入一亩泉（今辛店河），南转至双塔，仍经

官河至高粱河上游，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进大都城积水潭，东至通州，元世祖赐名通惠河。白浮泉至瓮山泊段又称白浮瓮山河。自从皇帝赐名通惠河，高粱河的名字渐渐失传了。后人不谈高粱河的存在，把通惠河错看成完全的人工河，夸大了人的作用。

高粱店（高里掌）在北京城（蓟城）西北，从高粱店流出的高粱河就是《水经注》的“蓟城西北平地泉”。东南流迳昆明湖，再蓟城北的紫竹院，至西直门北，分流：一路东流为坝河。一路转而东南流即今三海，至正阳门外三里河，正是《魏土地记》所记的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北魏时灏水（清泉河）经过蓟县故城南七里，东流，先有洗马沟水（莲花河）并入，之后，大约在左安门附近有高粱之水汇入。正如《水经注》所说：“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东南）注，迳燕王陵北，又东（东南）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灏水。”<sup>③</sup>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确定蓟城西北的高粱之水源头是高里掌（高粱店）、阳台山是梁山。

高粱水、高粱之水意思相同，是高粱河的两条支流。高粱水原是一条天然河流，三国魏刘靖建戾陵堰、开车厢渠引灏水进高粱河。《水经注》云高粱“水首受灏水于戾陵堰”，所以《水经注》的高粱水包括了人工的车厢渠，是广义的高粱水。高粱水与高粱之水同在蓟城西北、梁山之下。《畿

① [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北京燕山出版社，1983年，第96页。

② [清]周佳楮、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46页。

③ [清]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十三、灏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6页。



图4: 妙峰山(局部)(法)普意雅1923年(作者供图)

《畿辅通志》所云：戾陵遏，在宛平县西北，安各庄南，两梁山间，古高粱河旧渎上。<sup>①</sup>此处戾陵遏也是广义的，即包括狭义戾陵遏，也包括狭义的车厢渠和高粱水。阳台山是大梁山，香峪大梁是二梁山，两梁山之间就是军庄沟、寨口沟。高粱河旧渎在灰口村东的大白水。

金章宗曾越过阳台山到仰山栖隐寺会见高僧万松行秀，为褒扬行秀功德，改将军坨为独秀峰，此事记在万松行秀塔铭之上。<sup>②</sup>独秀峰即仰山栖隐寺东的仰山东岭、阳台山的南段，千年以前

曾称将军坨。“坨”，《汉语大字典》读音 wō，(一)坨坨。(二)古地名用字。是燔柴告天的祭坛。<sup>③</sup>刘靖开山取石、破土掘渠、造戾陵堰之前，必先祭祀山神、土地神，在高高的高粱山上燃起篝火，稟告苍天，将军坨因此得名。法国铁路工程师普意雅(G·Bouillard)1923年地图(图4)<sup>④</sup>标军庄以西的山峰为小将军坡，其北还有大将军坡。将军坡又称将军峰、将军坨。小将军峰上还有上、下两座将军洞。围绕军庄多个以将军命名的地名，说明此将军为国为民做过好事，北京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非刘靖、刘弘父子莫属。

清光绪年间，昌平阳坊贯市村人麻兆庆的《昌平外志》载：“车厢渠(今有车头崖)在丹陵东北，再东北有寨口，是乃“寨口讹音也；寨口东北有高粱庄，土人讹作高粱掌；东迤黑楼辛庄，东入州界矣。<sup>⑤</sup>麻兆庆居住在贯市村，距高里掌十五六里，距寨口二十余里，可算是当地人写当地事。麻兆庆以门头沟区担礼为丹陵(旦陵谐音)。车头崖在担礼东北。车厢渠自担礼东北流迤车头崖，再东北过寨口，又东北到高粱庄。但是，担礼仍在西山峡谷之中，没有开挖车厢渠的地方，所以车厢渠首不会在担礼。文章提供了车头崖地名的线索，车头崖即车厢渠首所在山崖。车头崖在哪？笔者曾在门头沟

① [清]李鸿章、张树声、黄彭年修《畿辅通志·三》卷八十六，河渠十二，堤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92页。

② 《万松行秀舍利塔铭》，见载于嘉庆《邢台县志》卷七《仙释》节录如下：“泰和六年，复受中都仰山栖隐禅寺请。是岁，道陵秋称山下，驻蹕东庄。师以诗进，上喜。翌日，临幸方丈，改将军坨为独秀峰，盖取师名，留题而去。”

③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④ 岳升阳主编《侯仁之与北京地图》北京周边的地图——妙峰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⑤ 转载自昌平县县志办公室《昌平外志校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图 5: 小将军峰断裂(车头崖)(作者供图)

区郝家坊村访问过时年 78 岁的张福增先生，老人在煤矿当过技术员，在村里当过干部，见多识广。他告诉我车头崖在军庄村西，又叫车子崖。意大利铁路工程师普意雅的地图里的小将军坡阳坡就是车头崖。这里是永定河最后一个大河曲，水东西流，南北建戾陵堰，可北岸开水门。经验证明，河弯的凹岸河面高于凸岸，泥沙淤积凸岸，凹岸含泥沙少。在北岸开水门，从凹岸取水，符合水利工程的科学条件。

可是，现在车头崖下的永定河紧贴山根，没有可建水门挖车厢渠的地方。多次现场观察才悟出其原因：车头崖非常陡峭，阳坡的一条山沟，是山体断裂沉坠形成的（见图 5），两座将军洞就在断壁之上。山体断裂崩塌，山脚下应该积存着坡积物。现在为什么没有坡积物存在？原因是汹涌的永定河由南向北不断下切和侧蚀，把将军坡的坡积物冲走了。现在河南岸是一片南高北低的坡地，坡地上积存着大大小小的卵石，可证曾是古永定河河道。坡地南是老虎山，老虎山顶堆积着厚厚的黄土。军庄村北也有特厚的黄土。车头崖坡下的坡积物上也应该有黄土堆积，在车头崖南麓的坡积物台地上可以有开水门和车厢渠的地方。随着永定河不断冲蚀，坡积物消失了，车厢



图 6: 推测戾陵堰位置(作者供图)

渠和水门的遗迹也消失了，原来建在河道中的戾陵堰也在永定河不断下切过程中消失了。实地调查判断，戾陵堰就在中粮书院附近。

车头崖是梁山（阳台山）最南端，车厢渠从梁山南麓台地东流至军庄，沿军庄沟转向东北，经杨坨矿口，即刘靖碑位置，有碑碣子地名流传至今。越过老庙分水岭（老庙供奉龙王），进入寨口沟，至灰口村，与大白水（高粱水源头）汇合，继续东北流，出寨口至平原。军庄沟、寨口沟是大小西山的分界线，西北是大梁山（阳台山），东南是二梁山（香峪大梁）。车厢渠出寨口沟迳周家巷村至高里掌（高粱庄、高粱店）。折向东南迳瓮山泊至高梁桥东流入元大都城，分成两汉：一汉偏东北再东流，为明清北护城河、坝河，汇入温榆河，至通州汇入潞河。另一汉入明清北京城，入积水潭、什刹海，从什刹海东岸万宁桥（地安桥、后门桥）流出，出东便门，东到通州张家湾，入潞河（北运河）。从车头崖至通州潞河的高粱河流向与《水经注》记载高粱水“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又东南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的流向完全一致。从车头崖至高里掌约 10.5 千米，北魏裴延儒修复戾陵陂长 30 里（合 10.3 千米）正相合。

# 播火——李大钊与海淀

徐佳伟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与海淀有着不解之缘。不仅仅是他安眠在万安公墓，李大钊在海淀还播下了革命种子，留下了求学、工作、革命的一些片段。虽只是片段，却折射出李大钊一生的光辉伟大、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展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

## 一、“大哀”之叹

1913年7月，李大钊从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受同学邀请到北京办《法言报》，这是李大钊办报的开端。然而这时恰是北洋政府对报业采取高压政策的时期，军警特务干预、收买和迫害办报人、以法律法规约束、强行禁止或捣毁、投资创办御用报纸，无所不用其极。《法言报》于1913年8月6日被迫停刊。这一时期也正是袁世凯不断加强个人权力的时期，“二次革命”失败，北洋政府气焰高涨。出于种种原因，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出世思想”。在李大钊随后赴日留学初期

撰写的英文《我的自传》中提到，“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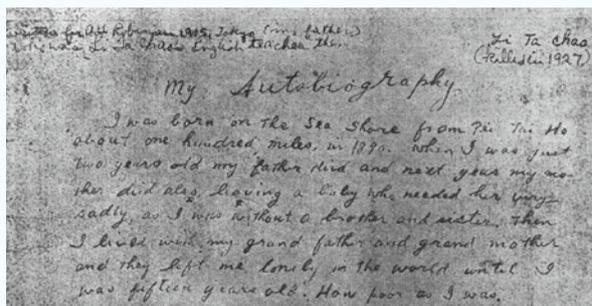


图1 李大钊的《我的自传》（作者供图）

很显然，李大钊这时产生的“出世思想”，是面对腐败政治作出的一种消极反应。这种消极反应，在李大钊留学日本前游碣石山时也有所展示。《游碣石山杂记》中写道：“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

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出世思想”的消极情绪也只是对当时世局的短暂反应。在同一

<sup>①</sup> 《我的自传》，转引自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时期，李大钊游览圆明园、玉泉山，目睹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感慨祖国山河破碎、百姓民不聊生，写下了三首诗。

### 吊圆明园故址

#### (二首)

夕阳影里，笳鼓声中，同友人陟高冈，望圆明园故址，只余破壁颓垣，残峙于荒烟蔓草间，款款凭吊，感慨系之。

#### 一

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  
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 二

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  
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拔劫灰。

### 咏玉泉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  
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校就读时，曾在《言治》月刊上发表过为广民众痛苦的生活和悲惨的命运而悲哀的《大哀篇》和为国家民族面临的种种困境而担忧的《隐忧篇》。这三首游览名胜古迹的诗篇所表达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这两篇文章一脉相承。正是怀着这种忧国忧民的悲愤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李大钊踏上了赴日留学的人生旅程。

## 二、发展图书馆事业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北大图书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图书数量不足；二是管理不严，一些书借出后长期不归还；三是管理手段落

后；四是管理人员缺乏训练。针对以上问题，李大钊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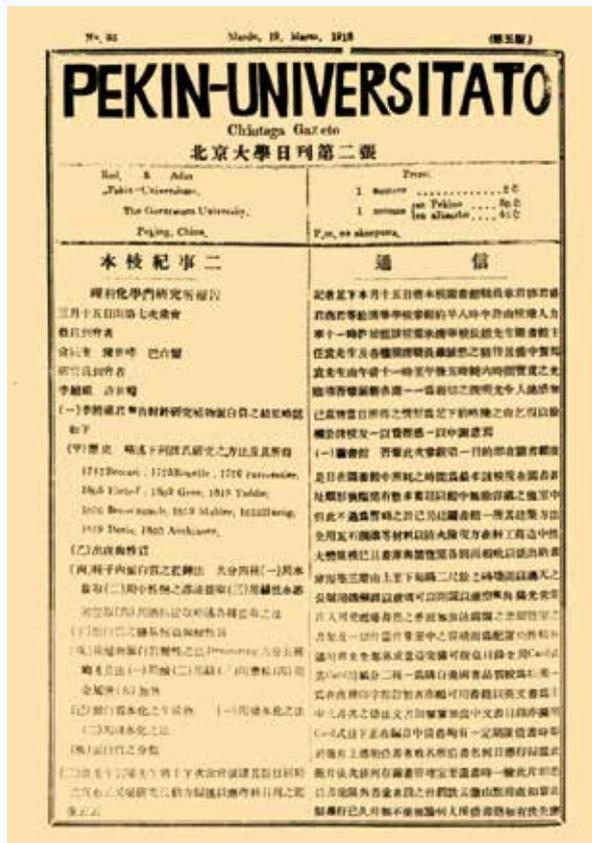


图2：1918年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李大钊一行参观清华学校杂记（作者供图）

李大钊非常注意吸收各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带领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到清华图书馆、北京高师图书馆参观学习。1918年3月15日，李大钊等5人赴较早近代图书馆方式运作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观，“吾辈此次参观第一目的即在图书馆，故是日在图书馆中所耗之时间为最多。”在这次参观中，李大钊重点了解了清华学校图书馆的目录设置情况、书刊借阅制度、过期罚款及杂志管理的办法。受清华图书馆新颖的卡片式目录的启发，北京大学从1918年10月起，着手编制新式卡片目录，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结



图3：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捐赠的部分中外文期刊  
(作者供图)

合实际藏书情况又做了若干变通。至1921年分别编出书名、著者和分类三套简片目录，从而使我国高校图书馆有了达到世界通行水平的比较完善的编目体系。<sup>①</sup>

参观结束后，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图书交换等事宜致函袁同礼。（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

守和先生：

承赐各件及手示均悉。拙译《国际法论》呈上一册，捐赠贵馆，并乞指正。交换书籍已按单检齐，俟法科将书送到，即汇呈尊处。敝馆所欲借阅之书，容后函告。诸蒙垂爱，感何可言！以后请教之处正多，惟进而益之。勿上。

即请

公安！

弟大钊顿首

各校图书馆之间的频繁往来带动了协作组织

的建立。同年12月3日，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图书馆主任十余人在汇文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成立“图书馆协会”事宜。会上推举清华学校袁同礼、北京大学李大钊、协和医学校葛飞伦、汇文大学高德、税务学校李崇文、中学代表德韦思韦为筹备委员，起草章程。因3日参会人员不齐整，7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全体会议决会章及一切重要事项，三点召开起草委员会确定会章及附则。

1918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图书馆协会在北大文科事务所举行成立大会。袁同礼当选为会长，李大钊与高罗题（汇文大学图书馆代表）得票相同，李大钊谦让，当即提出高罗题为副会长，请大家认可。李大钊当选为中文书记，吉非兰（协和医学校图书馆代表）当选为英文书记。北京图书馆协会开创了我国图书馆之间业务上合作、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先例，其章程及附则等文件还为1925年成立中国图书馆协会提供了重要参照。<sup>②</sup>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即报请教育部立案，但五四运动后，北京政府对教育文化界加强了控制，“所以图书馆联合会在教育部立案，也被批驳了。”<sup>③</sup>

### 三、“点种”海淀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度暑假。亲戚问他：“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笑着说：“点种。”亲戚感到奇怪，又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要点什么种？”李大钊说：“我点的是不一样的种。”这样一番意味深长而又不失幽默的对白，直到多年以后，大家才明白：原

① 李菊花著：《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的图书馆建设思想与实践》，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5页。

② 刘维薇主编：《李大钊北京十年：学会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298页。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来李大钊点的是革命的种，是共产主义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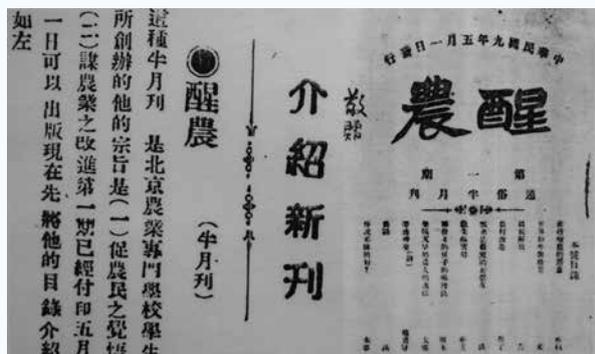


图4 1920年5月1日，农专学生创办《醒农》杂志，开办农民夜校，唤醒农民觉悟。（作者供图）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1919年3月23日，邓中夏、廖书仓、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创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标。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等既是讲演团成员又是研究会成员，所以马克思主义成为讲演团重要的讲演内容。

1920年3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平民教育讲演团启事》之乡村讲演办法，其中提到讲演地点定为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关于乡村讲演，讲演团骨干朱务善曾说：“至于‘乡村讲演’尤为有力，盖此种讲演，能于最短时间内使大多数乡民得受少许常识，并能助长其兴趣。”不仅如此，清华学校的刘孝恕、刘恕，1923年来到海淀的陈毅也都加入马

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就此播撒在海淀大地。

海淀在李大钊的带动下，成立最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夏，在邓中夏指导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立，杨开智任组长，成员有乐天宇、蒋文孝。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同学、附近农村中进步农民和小学教员中发展组织，扩大宣传面。按照这个要求，组员每天都和附近的农民谈话，向他们散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大瓦窑的张永祥、公主坟的马芝堂等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向往，主动、反复与组员们交流。后来，大瓦窑、公主坟成为北京最早一批建立农村党支部的地方，张永祥、马芝堂分别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在学校，研究小组以宿舍第二排九号、十号为进步分子集会的中心地点，以洋槐林内为讨论问题的场所；积极参与领导“改大运动”，出版刊物，组织罢课，在斗争中发现发展进步同学。



图5 碧云寺能仁寂照殿（作者供图）

#### 四、香山慈幼院党支部的成立

1920年香山慈幼院成立，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民国慈善家、教育家熊希龄任院长。虽然慈幼院地处郊区，距市中心较远，但由于其校董和教师的社会地位特殊、影响力大，该校进步师生的活动十分活跃。李大钊担任香山慈幼院评议会评议员。他经常到慈幼院向保教人员和学生宣传革命真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慈幼院教师和学生坚持进步，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是海淀地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1925年8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郭隆真奉调回国，在京津一带活动，时常到香山慈幼院开展工作。郭隆真，原名淑善，化名石珊、林一、林逸，回族，河北大名。早年随父亲创办元城县（今大名）第一女子小学堂。1913年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1919年参加并领导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评议委员、讲演队长。9月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觉悟社。1920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留法期间，积极参加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的“二八”运动，反对中法庚子借款和收回里昂中国大学。1924年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郭隆真奉调回国的同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秀岩到香山慈幼院女校当语文教师，思想上倾向革命。1926年冬，郭隆真介绍张秀岩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郭隆真带张秀岩去见李大钊。李大钊对张秀岩说：我早听隆真谈到你的情况，你是女高师的学生，你的为人和献身等革命品质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对你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后，现在决定吸收你入党。隆真同志介绍你入党，我很高兴。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革命者。党组织决定由你任香山慈

幼院教师党支部书记。张秀岩入党后，很快打开工作局面。1926年，香山慈幼院教师党支部成立，张秀岩任党支部书记。她积极发展党、团员，在香山慈幼院播下革命火种。郭隆真除发展张秀岩入党外，还发展陈璧如、车毅、程贵珍、李芙蓉、李乐、刘志一、李益韬等人入党；发展张百川、张德昌加入青年团，与李玉枢组成第一个团小组。香山慈幼院党组织的另一个系统是在男校展开的，当时党、团支部在一起过组织生活，共有党、团员30多人。



图6 张秀岩（左一）（作者供图）

香山慈幼院党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马列著作，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员梁一鸣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组织学生运动，为改善慈幼院的伙食状况而斗争。学生会还成立读书会，宣传反帝反军阀、拥护北伐、拥护三民主义的思想，到校外张贴标语、散

发传单。党、团组织利用运动会、文艺会、讲演会等形式，传唱《国际歌》，扩大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党的革命运动教育了一批批的慈幼院学子，从慈幼院创立到被接管，共有 6000 多名孤贫儿童被培养成材，其中有五位新中国部长级人物。

### 五、孙中山灵柩移厝碧云寺

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北京直系军阀政府，并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力邀孙中山北上。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17 日，抵达上海。12 月 4 日，抵达天津，受到热烈欢迎，当晚肝病发作。12 月 31 日，孙中山扶病抵达北京。3 月 12 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19 日，孙中山遗体在协和医院做完尸检和防腐手术后，灵柩由国民党要人以及李大钊、林祖涵、吴玉章和于树德等共产党员抬着，移往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社稷坛。为纪念孙中山一生功绩，李大钊写下长达 214 字的挽联总结孙中山的生平，堪称冠绝天下的“中华第一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急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4 月 2 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灵堂移厝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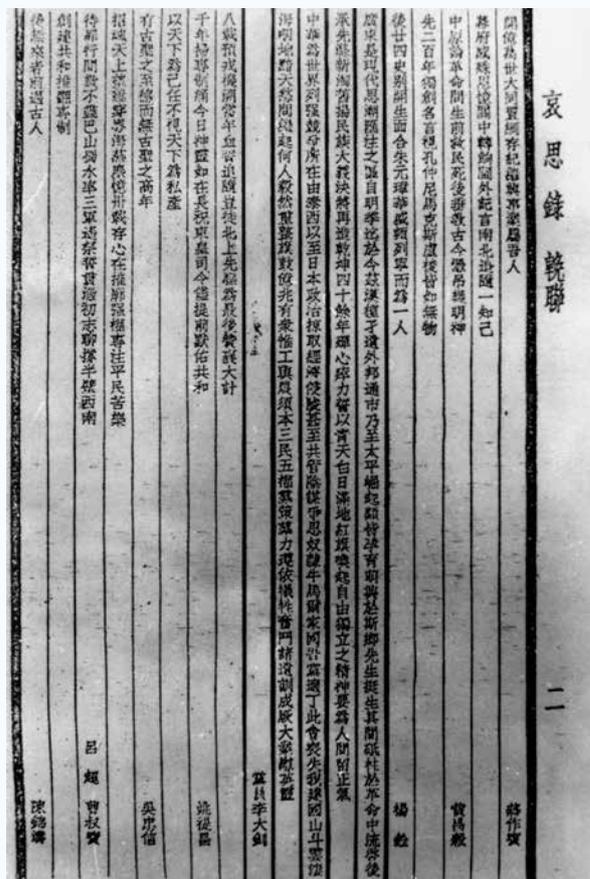


图 7 李大钊是孙中山治丧处成员并敬献 214 字长挽联  
(作者供图)

山碧云寺，在国共两党的发动下，护送灵柩的军政人员、学生及市民达 30 余万人，一直步行送至西直门。由西直门送至西山的群众 2 万余人。按照李大钊指示，陈毅率领中法大学挽灵队，列队等候在西山脚下，参加孙中山灵柩安放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的活动。陈毅以“曲秋”为笔名，写了一篇题为《西山埋葬》的散文。他热烈赞颂孙中山：“万幸，西山的道路近数日重光了。民族空前的英雄的遗骸，决定到西山来寄殡。”1926 年 3 月 13 日下午，清华举行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李大钊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负责人的身份到会演讲，高度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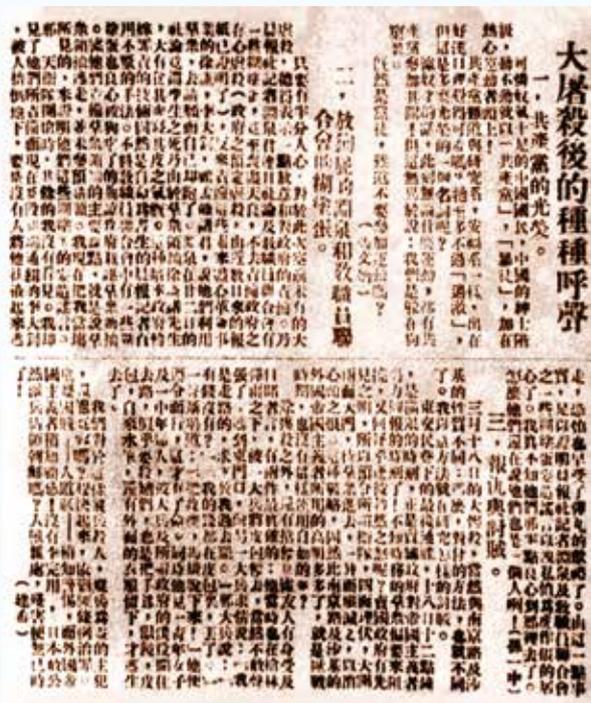


图8 《京报》登载的李大钊参加三一八运动情况  
(作者供图)

“今日追悼孙先生，吾人即想到他在国民革命史上之地位。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被外国力量所侵略，为外人经济（掠夺）的时代。孙中山先生相信三民主义，以抵抗一切帝国主义者，则是一方面结束以前的历史，一方面开辟新的道路，其为功实甚伟大。”

### 六、积极鼓动“反日讨张”

1926年3月初，奉系军阀用5艘军舰、8艘商船运送直鲁联军在天津北塘登陆，被国民军击败。为防止奉军的偷袭，国民军加强了港口的防守，封锁了大沽口，并通知外国船只在战争期间，只许白天行驶。国民军的这一正当自卫防御措施，竟遭到外国使团的无理抗议。

12日，两艘日舰驶入大沽口，国民军发现异常后以旗语令其停止。但日舰置之不理加速前进，国民军遂发空炮警告。蓄意挑起事端的日舰

开炮轰击大沽口。迫不得已，国民军开炮还击，日舰被驱逐出大沽口。此为大沽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日方竟向中国政府抗议，诬称国民军首先开枪；同时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公使，于16日上午，一致决定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

3月14日，在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方地委和北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领导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强烈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并提出七项要求。

八国最后通牒消息传出后，人民群众的愤激情绪更加高涨。16日，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紧急会议。陈乔年、陈为人、陈毅等出席了会议，李大钊作了报告。会上提出18日前举行一次群众大示威，督促段祺瑞执政府驳回帝国主义列强的无理通牒。会议决定于17日召开各团体联席会议。

17日，150多个团体及大学代表200多人在北大三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会议决定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10时，北大、清华、燕大、师大等80多所大、中学校 and 北京市总工会等140多个团体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下午1时左右，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在公推代表面见要求被拒绝后，游行队伍转向吉祥胡同段祺瑞宅邸进发之时，卫队突然动手，开始了一场血腥大屠杀。在这次惨案中，死难47人，伤者200余人。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燕京大学的魏士毅、清华大学的韦杰三、农业大学的林孔唐等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1929年4月，在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的支持和主持下，隆重举行三一八烈士公葬仪式并在圆明园建成墓园。

### 七、公葬李大钊

1927年李大钊遇难后，由于当时北平白色恐怖严重，灵柩未能安葬，先后停厝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长椿寺、浙寺。1933年4月初，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子女专程来到北平，找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同事，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商讨处理李大钊的后事。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研究决定为李大钊烈士举行隆重的公葬，并通过盛大的殡葬仪式来揭露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为了使公葬活动顺利进行，中共河北省和北平市党组织决定按民间风俗办事，以麻痹敌人。公葬活动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北平文化总联盟牵头，具体工作由河北省革命互济会负责。

这是一场隆重而特殊的葬礼。《晨报》报道：“沿路观者塞途，车辆拥挤，不能通行。”4月23日早晨5时左右，2000多名送殡群众和进步人士汇集浙寺，有教授、教员、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和市民，其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随后，由700余人组成的送殡队伍缓缓离开浙寺。大家举着挽联，抬着花圈，沿途抛撒纸钱，演说李大钊生前事迹，高呼“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因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也喊出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当队伍行至西四准备路祭时，大部分人被军警阻拦冲散，少数人继续前进，出西直门前往香山万安公墓。灵车行至西郊燕园（今北京大学）西门时，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也参与进来，进行了郊祭。



图9 1933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及各界进步人士将李大钊灵柩从宣武门外浙寺移葬万安公墓（作者供图）

傍晚，当送殡队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时，一辆骡车已在等候。车上放着一块石碑，碑头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的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锤头。碑的正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几个红色大字，背面是红字碑文，其中写道：“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碑文下方落款“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迫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墓碑没有立在李大钊墓前，而是因循六朝墓志的方法，将它同棺槨一起埋入地下。

在北京市万安公墓的土区仁字组，保留着1933年公葬李大钊的原始墓址。墓碑上的文字，由语言学家刘半农撰写。李大钊是被军阀杀害，



图13 “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展陈序厅（作者供图）

赵纫兰是病故，所以刘半农在碑文上做了区别。为了体现李大钊死于非命，在“生卒年月”上，特意用了“死于而非卒于”。此外为了保护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将其易名为荣华。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1983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灵柩移葬。198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

2020年3月以来，北京市统筹规划北大红楼和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按照区委部署，海淀区史志办配合区委宣传部负责李大钊烈士陵园展陈提升工作，其中史志办承担展陈大纲编写、图片资料搜集、史实考证工作。展陈大纲在规定时限内按时完成，

水平和质量在全市“1+9”工程重点提升类项目中处于第一梯队，第一批获市领导圈阅通过。2021年6月1日，“不朽的功勋——李大钊生平事迹展”正式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宣部领导先后参观展览并给予充分肯定。9月30日，区委书记于军率区四套班子领导在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仪式。

今天，李大钊为之奋斗的理想早已变成现实，海淀从偏僻落后的北京西郊发展为全面进入区域创新和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首都城区。这是海淀作为李大钊安眠之地对李大钊的独有纪念。

# 冯仲云在北京清华的求学生涯与 早期革命活动

王钦双

1926年10月，冯仲云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和探寻救国救民的理想走进北京，踏进美丽的清华园，开启了他“新的人生道路”。清华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是青年冯仲云世界观的转变与形成的关键期，亦是他人生的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期间，冯仲云受到的良好专业训练，确立的坚定理想信念，经受的各种严峻考验，使他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为他走出北平<sup>①</sup>后参加革命活动及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一、潜心向学，勤奋苦读， 奠定从事革命和建设的扎实知识基础

1926年初夏，冯仲云以全校第三名、数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杭州蕙兰中学。关于毕业后的去向，他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考取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sup>②</sup>。

这年夏天，冯仲云躲在上海他小舅妈开设的小煤炭作坊闷热的阁楼上加紧复习备考。经过清华设在上海交通大学考场上



青年时代的冯仲云（宁葆新供图）

的激烈角逐和出色发挥，冯仲云脱颖而出，顺利通过招生考试。

① 1928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令改北京为北平，为特别市，归南京政府政务院直辖。尹均科主编：《北京建置沿革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8—209页。

②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成立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在国内出现的中学改办大学的潮流中，清华学校正式设立大学部，开始由留美预备学校向完全的综合大学过渡。1928年8月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

8月16日至19日,《申报》(上海版)连续四天刊登《北京清华学校录取新生揭晓》,冯仲云榜上有名<sup>①</sup>,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大学部数学系,当年只录取他1人。其时,清华由于学校收费少,名声大,报考的人很多,几千人中才取几十人<sup>②</sup>,因而成为最难考的学校之一。冯仲云能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充分说明他用功之勤和不凡的实力。

冯仲云入学时,正是清华学校向大学过渡的阶段。他属于清华学校大学部公开招考录取的第二期新生。因为正处于向大学过渡,数学系还不能单独开课,因此,他被安排和物理系学生一起听课。数学系的学生极少,到1928年,三个年级加一起,才只有7个人。<sup>③</sup>

进入清华园,实现了冯仲云孜孜以求的深造求学梦,亦为他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里,精英荟萃、名师大家众多,冯仲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和专业技能,其用功之勤,堪称模范。对此,他在自传中说:“头半年,1926年下半年,我确是很勤学的。”<sup>④</sup>

数学系学生人数虽少,但教师水平很高。系主任开始是郑之蕃教授,他有在我国最早的海军军官学校——福建船政学堂教学的资历。还有由法国留学归国的熊庆来教授。熊教授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在分析函数方面是我国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在亚纯函数论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曾

先后培养华罗庚、严济慈、钱三强、赵九章等众多名震海内外的优秀学生。1928年他任系主任,又增加了孙光远、杨武之教授等人。数学系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资禀特近,显有研究能力”的数学家。为此在教学上进行十分严格的挑选和淘汰。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数学不及格者,须经甄别试验及格后才准许选修微积分;学生升入二年级时,又规定数学成绩在70分以下的不得进入数学系;学生入系以后,如果二年级基础课程“三高(高等分析、高等代数、高等几何)”中有一门或两门不及格,也认为不宜读数学系、做数学家,而允许把成绩提高到及格以后“劝其转系”。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与思并重”,比较注意对学生的演题训练,把这看成是使学生掌握与运用数学理论和扩大数学科学视野的主要手段。习题分量多,也比较繁难。一年级时,全年习题约在1000道以上;高年级课程的习题则多属大题、难题,甚至有的选自法国国家学位考试题。<sup>⑤</sup>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冯仲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数学基础打得非常牢固。因此,在他离开清华后,能够充分胜任在哈尔滨东北船政学校数学教授的职位,并获得学生的高度认可,在该校站稳脚跟,同时还受聘到中东路特区一中兼课<sup>⑥</sup>。

在清华,冯仲云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不仅主修数学专业,而且还兼修大量物理系的课程和其他学科的课程。他“以数学系的学生学物理的

①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

③④⑤ 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页,12页,23-24页。

⑥ 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课，所以物理课程学的特多”<sup>①</sup>，这些课程有：高等物理、理论力学、几何光学、电磁力学、热力学、电振动、原子物理学。化学方面，高等化学、近性分析；外语方面，英语、法语，以及一些社会科学书籍<sup>②</sup>。这些兼修的课程，冯仲云都认真对待，刻苦钻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对自己那一段学业，颇为满意，曾回忆道：“我在学校中课程基本上是不坏的，可以说是高才生。只是后来由于革命工作忙，没有能够用一定的时间，所以没有学好。我的同学如王淦昌、赵忠尧、周同庆……等，到现在都是名学者，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比他们弱。”<sup>③</sup>党的工作和社会活动都没有使他放弃在学业上的努力。在四年的学业中，他的成绩亦受到熊、郑二位教授的肯定。

像他这样高材生，如果不是选择走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以他的资质禀赋和勤奋刻苦，加之清华有赴美留学深造之便利，冯仲云肯定能在数学、物理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成为著名学者或科学家，甚至会成为世界级科学泰斗。不过，在职业革命家道路上，他在清华大学汲取的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受到的专业训练，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再突出地表现出来。在担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期间，冯仲云主持的中国水利电力科学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最好的见证和诠释。此外，清华有重视体育的传统，非常注

重体育运动和训练，冯仲云因而在这里得到很好地锻炼，强健了他的体魄，这是他以后长期坚持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而没有垮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此，朱理治曾指出：“学点体育运动，对革命还是有好处的。”<sup>④</sup>

## 二、追求进步，加入共产党，开启革命新征程

1926年9月冯仲云进入清华时，南方大革命号角正在吹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正狂飙突进。这场大革命使清华学校的学生受到深刻影响，尤其对有着强烈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冯仲云触动更大。回顾当时的情形时，他写到：“这场伟大中国大革命的风暴，使得我气都喘不过来，我每天都钻到阅报室去阅报，遥视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企望着他们进军北京。”“我在这时候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及一些杂志。这样我渐渐认识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共产党，而决心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决心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sup>⑤</sup>

当冯仲云思想急遽转变的关键时期，清华学校党组织也在酝酿组建，这为他找到并加入党组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6年11月，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共产党员王达成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当时清华学校已有雷从敏、朱莽两名党员。王达成和他们两

①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1页。

②③⑤ 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④ 朱理治：《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长夜星火》，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页。



冯仲云像（宁葆新供图）

人联系上后，三人即在清华三院开会，正式成立中共清华大学第一个党支部，王达成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清华党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余冠英、魏明华、李景清、朱理治等人入党。到1927年4月，支部已有党员7名。清

华党支部积极投入国民革命运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学生中公开活动，宣传国民革命，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做准备。该党支部对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组织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主义ABC》和社会发展史等，还发些其他学习材料，有时北京市委领导来讲广州革命斗争的情况。<sup>①</sup>

随着国民革命深入开展，革命内部潜藏着的危机愈益严重。不久，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蒋介石在南方的反革命行动相呼应，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不期这一幕正被冯仲云撞见，燃烧起他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这件事使他终生难忘，对他参加革命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sup>②</sup>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烈士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清华是中国大社会的一个缩影。学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国民党员中又有左派和右派之分。还有众多的自由主义者。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冯仲云先是加入国民党。随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校内各派政治力量也加紧对青

<sup>①</sup>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长夜星火》，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2页；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海淀区历史（1922—20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sup>②</sup>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与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军警、便衣侦探200多人，把东交民巷东、西、北三方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界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西院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等共80余人，同时搜去国共两党的大批文件。这一天，冯仲云由学校进城。他知道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是洋人威风凛凛的地方。他打算挺着胸膛东交民巷走一走，冲一冲。意外地看到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正在搜捕。他装着若无其事走过去了。回到学校，才知道那是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正在搜捕李大钊等同志。冯仲云：《我的自传》，手稿。

年的争夺变得界限分明，斗争尖锐。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都派人了解冯仲云的政治立场。对此，他在自传里写道：当时学校里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曾经和我谈话，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当时正读过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我的回答是大骂蒋介石，说他要反革命……我的观点当然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所仇视。<sup>①</sup>由此，他的同情完全寄于共产党，不断向党组织靠拢。

同月，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朱理治（朱铭勋），对他作了最后一次考察。对此，冯仲云回忆道：大概是在4月24日，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我记得是清华大学古月堂的西南小径上，朱铭勋和我在闲散走着。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我是这样坚定地毫无犹豫地答复他：“我愿意成为共产党员，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大概是“五一”由朱铭勋及崔宗培的介绍，党的小组会举行了入党仪式，而我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sup>②</sup>

1927年5月1日，冯仲云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朱理治、崔宗培。他入党的那一天，正是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绞杀后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的气氛弥漫。许多人以于己是否有利为标准或消沉下去或改弦易辙。而冯仲云属于以真理为标准的人，他在共产党人遭杀戮的革命低潮中，毅然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

入党后，冯仲云积极参加党组织分配工作，并在学校放暑假期间到工农大众中工作，足迹遍布北京西郊。1927年6月，他在中共北京西郊区委担任干事；9月担任西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sup>③</sup>。暑假期间，他换上农民服装和党员魏明华一起，深入到农民和洋车夫中间，找人谈话，启发觉悟，发展党员。对此，他在《我的自传》写道：“我入党以后，正是学校放暑假，我愿做工农工作，不愿做学生工作，因此我和当时愿做农民工作的魏明华（党员），一起在农村中跑，在洋车夫中做工作，有时也到燕京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开会（那儿当时是中共西郊区委党委所在地）。这样过去了一个暑假。”<sup>④</sup>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北方的白色恐怖也日渐加深，清华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革命低潮时期，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跑的跑、退的退，有的甚至变节投降，但冯仲云意志坚定，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坚持了下来。对此，朱理治后来回忆道：“这时很多人消极了，跑的跑、退的退，比较坚定的只剩六七个人，即冯仲云、李乐光、我，还有图书馆的两位工友。”<sup>⑤</sup>

在白色恐怖下，北京党组织屡遭破坏，但清华党组织始终坚持斗争不断线。1928年1月，朱理治调西郊区委工作，冯仲云接任支部书记。在异常

①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② 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③④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⑤ 朱理治：《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见《北京革命史回忆》第一辑，1991年，第320页。

艰难、险恶的环境中<sup>①</sup>（敌人不断的破坏、和上级失去联系等），冯仲云带领清华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开展工作。掩护被敌人追捕的党员多次脱险，朱理治即是由冯仲云掩护并护送离开清华转移到上海的<sup>②</sup>；与恢复重建的中共北平市委（团市委）接上关系，参加清华青年团和西郊青年团的工作；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员队伍。到1929年冬至1930年春，党支部发展到二三十人。在清华党组织的帮助下，农业学校也建立起党支部。<sup>③</sup>1930年2月，冯仲云被调任中共北平市委干事，仍在西郊进行工作。同时也未脱离清华党支部。<sup>④</sup>

自1927年5月加入党组织到1930年初工作变动，冯仲云在风云变幻、异常险恶的环境中，意志坚定，初心如磐，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为大革命失败后清华党组织的恢复、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亦显示出他出色的组织才能，这为他在东北开展党的工作和组织领导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三、狱中磨炼，坚守初心使命，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30年上半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错误逐渐占统治的中央，不顾主客观条件，错

误地要求各地在纪念节日组织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北平市委按照中共中央和顺直省委的指示，着手筹备五一示威游行。在4月20日举行的纪念五一运动筹备委员会后的上街示威中，冯仲云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持斗争，经受住了考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4月20日，北平各界群众团体代表在东城区米市大街中华基督教会大礼堂举行会议，到会代表370余人，除各革命团体代表外，还有各厂矿、各大学代表和士兵代表。清华大学有冯仲云、陈志安等15人参加。大会通过争取8小时工作制、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国民党等10余件提案，并正式选举产生纪念五一运动筹备委员会。与会代表于会后上街示威，突遭国民党当局便衣警察袭击，当场逮捕58人，清华冯仲云、陈志安等3人被捕。事件发生后，中共北平市委决定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动学生总罢课，反对国民党捕人，反对白色恐怖，要求释放被捕代表。<sup>⑤</sup>

冯仲云被捕后，被押送至北平市警察局拘留所。在这里，他曾被提审过一次。初次上阵，冯仲云开始真有些胆怯恐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供词”，从容不迫地陈述出来：

<sup>①</sup> 冯仲云回顾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我领导着六七个同志的小支部，经常在夜间到清华园草从中去举行党的支部会议。北京传来紧张情况时，我们不敢在宿舍睡觉。夜凉露深，甚至严寒的冬夜，到荒草野蔓的丛莽中度过漫漫的长夜。”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sup>②</sup> 朱理治：《回忆清华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活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长夜星火》，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第20页；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sup>③④</sup>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编撰、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5—26页。

<sup>⑤</sup>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著：《长夜星火》，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我姓冯，名仲云，清华大学数学系四年级的学生。因事由清华进城。在校中贴有在青年会举行会议之通告，因此顺便看看，因而被捕。”<sup>⑤</sup>问其他，概不答复。大约审讯者以为他说的可信，他没有挨打，被送到军阀阎锡山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继续关押，过了半年囚徒生活。其时，正是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中原大战时期，北平被阎锡山的部队占领。

在狱中，冯仲云和刘澜波、郑眼石、高明甫、张静之、赵文琨、严士坚团结互助，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还借机向同囚室的人宣传为什么被捕，揭露社会的黑暗。

1930年9月下旬，冯仲云和难友们利用张学良的军队攻入北平与阎锡山的军队撤出北平造成的混乱和空隙，互相帮助打开镣铐，成功逃出监狱。

半年狱中的磨难，并没有消磨冯仲云的意志，反而锤炼了他坚强不屈、顽强斗争的品质，使他更快地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对于这段牢狱生活，冯仲云自己不光看苦难的那一面。他曾这样写道：“自己当然是苦学生，但是深觉在监狱的囚徒生活，培养锻炼了自己的品质，自己的党性。虽然事过数十年，现在检讨起来，当时还不愧为共产党员。”<sup>①</sup>

回到清华后，冯仲云由于被捕坐牢，误了考试，没有获得毕业。痛切于当时“宇宙充满饥寒声”的国家，他不想再学下去，也不再想做数学家的向往，而是义无反顾选择了成为革命者的道路。1930年10月，经郑之蕃教授推荐、党组织的批准，冯仲云到哈尔滨商船学校当教员，从此开始了在东北的革命生涯。

走出北平的冯仲云，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冯仲云先是以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相继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长，为东北党组织开展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后亲赴抗击日军第一线，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组织和领导，相继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苏联红军八十八旅（中国教导旅）情报科长等职务，并坚持到抗日的最后胜利，成为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松江省政府主席，领导全省人民在战友血染的土地上恢复发展经济。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的富强贡献了自己的一切。1955年9月27日，冯仲云获得一生最高的荣誉，在庄严的向解放军高级将领授勋仪式上，他光荣接受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冯仲云一生，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备尝艰辛而斗志不衰，屡建功勋而永葆本色，升迁多变而不计得失，这一切都与他北京求学期间受到的教育、世界观的转变、信仰的确立、参与革命斗争的历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其子冯松光所言：“父亲是从清华大学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在他的血脉中永远流淌着清华学人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精神。”

（作者系东城区委党史办副主任）

<sup>①</sup> 赵亮、纪松：《从清华学子到抗联名将的传奇人生：冯仲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 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

## ——汤用彤、汤一介父子与香山

唐润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县，生于甘肃渭源县，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和《隋唐佛教史学稿》等。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汤用彤全集》（七卷），给后辈留下宝贵的财富。

汤一介（1927—2014），汤用彤之子，出生于天津，祖籍湖北黄梅县。1947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毕业后到北京市委党校工作。1956年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评为副教



汤用彤像（林琳供图）

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汤一介教授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麦考马斯特大学、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获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汤一介教授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主要论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非有非无之间》《非实非虚集》《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瞩望新轴心时代》和《儒学十论及外五篇》等，上述著作皆收入十卷本《汤一介集》中。2011年，他主编的九卷本、500万字的《中国哲学史》问世。汤一介教授是我国哲学界的巨擘，传统文化研究的泰斗，在哲学、佛学、历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其父汤用彤一起可谓中国哲学界的皎皎者，两颗熠熠生辉的明星。

汤用彤与儿子汤一介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有着共同之处，并且在生活情趣上也有相似之点，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们既是仁者又是智者，所以在他们生前，于闲暇之时，或在写完一部著作以及构思一部书稿时，常到香山和颐和园小住或游览。其中，他们去香山的次数最多。

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每年初夏



汤一介（林琳供图）

都到香山住一两周，有时住在钱穆先生（著名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租的房子里，有时住在香山红叶山庄（即现在香山饭店处）因钱穆先生离开北京，就只能去住红叶山庄。汤用彤先生在香山小住时曾完成他的旷世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享誉国内外，因而他从心里感谢香山幽境的环境给予他的灵感。后来，他还多次光顾此山。20世纪50年代中期，汤先生突然患了中风，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但有一年初夏，汤用彤先生忽然想去香山休息一下。他所以想去香山小住，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来之前写完《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松了口气，觉得对研究中国佛教隋唐宗派问题有了点底，可以休息一下，静静地思考如何继续写下去；二是他对香山旧情难忘，因为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就是在香山定稿的。

这次来香山红叶山庄小住，不只是汤用彤一

人，而是全家六口人都来了。有汤夫人，儿子汤一介、儿媳乐黛云，孙女汤丹、孙儿汤双。热热闹闹，其乐无穷。作为“三山五园”的香山静宜园是西山中最秀美的园林。它不仅有1500年的人文历史，800多年的皇家御苑史，其园林史与北京建都史几乎同步，见证着北京城市发展的更替迭兴，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并且它还有美丽丰富的自然景观，峰峦叠嶂、古木参天、林幽泉清、繁花似锦、四季飘香，吸引着成千上万宾客来此游览。这一切汤用彤先生在此之前都知晓和饱览过，尤其是对香山二十八景的景点更记忆犹新，心仪不止，他是多么想再多看一看！但现在因身体之故却不能了。此次来红叶山庄小住只能坐着轮椅，由儿子、儿媳推着走一走、转一转，而常去的地方就是玉华山庄。每次去时都是汤一介、乐黛云夫妻俩推着汤老先生，汤老夫人和孙儿们紧跟其后簇拥而上。此处，不但汤老先生喜欢，其他人也喜欢。到了之后，找一处有桌椅并能看香山远景的地方。汤老先生一家人缘何都喜欢此处呢？因为这里是香山二十八景之一，视野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北京城，每当深秋之际，枫叶飘丹，层林尽染，美景尽收眼底，令人叫绝。另外，在此还可以喝茶、吃零食，如瓜子、花生、小糖块，有时还能吃到包子等。玉华山庄地方很大，建筑很别致，有半圆形斜式长廊，有平地，还有各种花树草木，任由孩子们跑来跑去。

汤用彤先生除常到“玉华山庄”外，有时还和孙女汤丹（9岁）、孙子汤双（5岁）去红叶山庄的“九曲回肠”（将山泉引入弯弯曲曲象征九曲黄河小水槽）玩。他坐在轮椅上看着两个孩子把手帕放在“九曲回肠”的上端漂流，然后孩子们跟着手帕顺水往下跑着、叫着、笑着，汤老先生很开心，常常发出笑声，孩子们更开心。夜晚两

个孩子在汤一介夫妇陪伴下到山坡的草地上去捉萤火虫，他们把萤火虫放在南瓜叶的空茎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很好看，两个孩子就争着去拿给爷爷看。汤双对爷爷说：“爷爷，你看它像不像灯笼？”汤丹抢着说：“我看它更像霓虹灯”。汤老先生乐着说：“都像！都像！”这是他十几天来，最高兴的、最快活的事。

在红叶山庄时，汤用彤更多的时间是每天吃过早餐，在夫人的陪伴下坐在朝南的走廊上晒太阳，汤一介夫妇和孩子们去游览香山的景点，如双清、眼镜湖、枫树林……小孩们对这些地方似乎兴趣不大，反而喜欢爬没有路的小径。他们说这才叫探险，新奇。有时摔倒了，起来继续往上爬；他们的父母毕竟不放心，紧跟孩子后面。有一次他们爬着爬着，汤丹看见一条蛇，立刻大叫着：“妈妈，不好了，有条蛇！”赶紧往回跑，母亲说：“别怕，它不会咬人。”她往前一看，原来是条死蛇。汤双却说：“我没怕，我看见它没动呢！”汤丹说：“你别冒充英雄了，那你躲在我后边干嘛！”汤双不说话了。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前爬，汤一介夫妇也跟着孩子们向上爬，直到山顶。孩子们欢欣雀跃，虽然满头是汗，但他们显得一点不累。父母看着孩子们那么高兴快乐，不禁也都觉得很快活，连连夸孩子们：“真棒！真棒！”

汤一介夫妇和孩子们在山上休息了十几分钟，因不放心父母，就招呼孩子下山了。回到红叶山庄前，看见父亲和母亲还坐在廊子上晒太阳，好像说着什么，他们没有过去，怕打扰老人。据汤一介后来推测，他们可能在谈着往事，回忆自己多半生的“幸”与“不幸”。他母亲生了六个儿女，早逝了四个，这是她一生的“隐痛”，这可能是她的“不幸”，但嫁给一个“言听计从”

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大幸”。父亲的“不幸”也许是各种“运动”耽误了一些时间，使他没有能完成写整部“中国佛教史”的愿望。他的罹患中风反倒成了“幸福”，使之免去各种“运动”的苦恼和免于回答“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到底汤用彤与老夫人说的是什么，汤一介不好问父母。汤一介还回忆道：在红叶山庄住时，其父与自己有几次谈话，但能记起来的不多。对他父亲跟他谈起读书的问题还有印象。其父这样告诉他：做学问主要是认真读书，勤于思考。读书要真读懂，要会利用各种工具书。遇到问题不要轻意放过，可以找相关的书相互比较，以求得解决。汤老先生的话虽然不多，但很中肯，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谛，对后人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汤用彤先生及其家人在红叶山庄住了约有十几天，一日，汤老先生对儿子说：“该回家了吧！”于是，他们全家人就下了山，回到家。第二天，汤用彤先生把他的秘书叫来，就开始了工作。首先撰写《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一文，没一日就完成了，同时，还应《新建设》杂志之约，又很快完成《康复札记》。他在札记前写了这样一段话：“现应



汤用彤与学生在一起（林琳供图）

《新建设》杂志之约，将近年来读书所想写成札记，以供参考，这也是我对人民所尽涓埃之力。”看来，汤老先生在香山红叶山庄小住时，他的脑子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思考着一些他关注的学术问题。难怪这么快写完了上述两篇文章。因为，在晚年他一直想着的是为国家和人民多做点贡献，诚如他所言：“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这是汤用彤先生化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的一句诗，衷心地表达了一位学者爱民爱国的心声！

在汤用彤这位国学大师仙逝之后，他的儿子汤一介先生继承了他的学业，为国为民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哲学界巨擘，传统文化研究的泰斗。尔

后，他多次到香山，或开学术讨论会，或来游玩。而每次来他都要到红叶山庄看一看，且还往往循着父亲当年的足迹浏览一番。想必当时眼前总浮现出父亲和蔼可亲的面容，耳畔还萦绕着父亲晚年一句心声“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汤一介先生未辜负父亲的教育，牢记父亲的嘱托，去世前三年还带病完成了九卷本的巨著《中国哲学史》。

#### 参考书目：

1. 麻天详著：《汤用彤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2. 李娟娟著：《汤一介传》，新华出版社，2011年9月版。
3. 汤一介《汤一介与父亲在香山小住》，《文汇报》2014年5月16日。

# 老校史话

## ——青塔院小学（北交大附小北校）

孙凤池

青塔院小学的前身是红果园短期小学。成立于民国廿五年（1936）四月，初建时有两个班，学生 77 人。其中男生 55 人、女生 22 人，校长杨崇。校址位于青塔院一号，即青塔禅寺。该寺坐东朝西，三进院落，有佛殿及南北厢房，中间大殿后面有和尚墓塔三座，另在南墙外和尚墓塔四座。当时坐落在青塔禅寺以东的红果园是个近百户人家的村庄，村里没有建校的地方。当时建立短期小学，是政府硬性推行的义务教育，由政府出面和青塔禅寺的

主持协商：租用该寺的四间北厢房，这样才办起红果园短期小学。

短期小学为一年制的学校，学生学习一年，成绩及格，即可毕业。是扫盲性质的义务教育。

民国卅二年（1943），该校改为红果园简易小学，两个班，学生 40 人，校长李逸民。

简易小学是四年半日制的字校，比音通初小减少了一点课程，如三四年级不设作文课和珠算课，一二年级不设劳作课和美术课等。

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都不收学费，并供给课本书籍。学生上学是带有强迫性的。

民国卅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红果园简易小学改为北平市市立红果园初等小学，成为全日制的普通初小。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校改名为青塔院小学。有四个年级、两个班，即一三复式，二四复式。

1951 年调于化成为青塔院小学的主任教员（解放后，没有高年级的学校负责人，称主任教员，有了高年级的学校负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北校区（林琳供图）

责人才叫校长)，青塔院小学是北下关中心学区范围内的一所小学。1952年，北方交通大学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相继成立，两个单位的教职工子弟大部分都到青塔院小学上学（少数去北下关中心小学上学），因此青塔院小学发展很快，一下子就成了有1—6年级的完全小学，一二年级还改成双轨制。在这个过程中，除海淀区文教科的积极协助外，还得到北方交大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

于化成是河北省第三师范

毕业（校址在滦县），上学时是个优等生，并擅长于社会活动，在小学教育方面是个行家。在他主持下青塔院小学教学质量提高很快，不久就成了优质校。

1954年，北京市教育局实行小学统考，门头沟区取得全市第一名，海淀区为第三名。1955年，北京市第二次小学统考时，海淀区取得第一名。一直到1965年，这个名次，保持了十一年之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统考停止。

1955年统考成绩，海淀

区内的排名是：三所重点小学中，第二中心小学（北下关中心小学）排名第十八，第四中心小学（蓝靛厂中心小学）排名第十九，第一中心小学（海淀中心小学）排名第二。排名前三的都是机关、部队、大学的附属小学。这些学校的领导力量强、师资强，而且都是住宿小学，每天有两节晚自习、一节早自习课，自习课都有教师看护。做到了学而时习之，把所学的知识得到巩固。学生住校，一天都在学习环境中度过，没有一点负面影响，这些

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好是理所当然的。排名第14—17的四所小学都是该校教六年级的老师业务过硬，是优秀教师，其中有香山小学陆梦蕉，一级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洩水湖小学刘佩莲、一级教师，北京市的教育先进工作者。青塔院小学的王瑞珍，1949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一级教师，后来提升为西颐小学的教导主任。剩下的一个学校和教师名字失记。这次青塔院小学在区内排第17名。

另外青塔院小学的体育方面也很好。当时的体育老师詹某某（名字失记，只记得他是詹天佑的孙子），大高个子，身体魁伟，上学时就是个体育运动员，他自己又钻研体育的理论和技巧，是个体育的行家、名师。青塔院小学在海淀区运动会上，有好几项成绩名列前茅。后来詹老师被调到体育专业机构去工作了。

北下关地区的上苑村有座破庙，大殿和三间厢房均已坍塌。1952年11月，孙凤池和于化成二人到北下关街道政府请示，把破庙拆了，砖木做青塔院小学盖房之用，北下关街道同意了。于是于化成和孙凤池找了几位临时工一块去拆。先

拆木架，把木料扛进学校，最好一天内拆光扛完。如果一天扛不完，唯恐夜里有人把木料偷走。这天于化成穿了一件新买的棉外罩，扛木头时被木头划破了，把他心疼得没法，但还得接着扛呀。工地离学校有200多米远，孙、于二人那时虽然年轻力壮，但体力毕竟比不上那些临时工，200多米的行程，中间要歇一两歇。到晚饭时间，临时工收工了，但还有点木头没有扛完，二人接着扛，一直扛到天擦黑。孙于二人累得实在扛不动了，没辙了，夜里丢不丢木头只好由它去吧。其实他们低估了附近居民住户的觉悟，大家知道这些砖木是用去建学校的，不但没人拿，还暗中加以保护。过了三四天，工地收工了，还剩下一点点破烂木头和砖瓦，学校不要了，这时附近几户居民才把破烂木头拿回家去烧火做饭。有两户农民把碎砖拿去垒了猪圈。房渣土垫了低洼地。等于替学校清理了工地现场，学校省下了一笔雇工清理现场的钱。这时附近居民中有位老大爷（青塔院小学的学生家长）向于化成说：“我们知道这些砖和木头是去建校用的，并且亲眼看见两位校长扛了一天木头。要说

偷木头，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家，如果外人来偷，必有动静，夜里我们能听得见，我们听见有动静，就会大声吆喝，把偷木头的人吓走。”多么好的居民呀！

破庙的原址，成了一片空地，一部分被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占用，一部分修成了道路，方便了附近居民。关于木头划破于棉外罩的事，几年后谈起来，于化成仍惋惜不已。

所拆下来的砖木，除了一部分用于盖房外，一部分木头请北方交大的木工给加工成了教师的办公桌椅和其他用具。于化成给自己加工了一个两头沉的办公桌，给孙凤池加工了一个一头沉的办公桌。这在当时的校长中是绝无仅有的。那时候小学校长能有一个小二屉桌办公，就算是不错的，三屉桌就算是高级的了。有的校长是用学生的双人课桌，装上两个抽屉。有的干脆是把两个或三个学生的单人课桌拼在一起就是办公桌了。孙凤池在青龙桥中心小学当了三年教导主任（1949—1952），始终没有自己的办公桌，是和老师一起在一个长条桌子上办公（这个长条桌是庙里佛前的供桌改成的）。这时竟然用上了一头沉的

办公桌，美的不得了，于化成更是。说起来也算是一点劳动的补偿吧！于、孙二人扛木头的事，青塔院小学和北下关中心小学的教职工大家都知道，两个办公桌又没花学校一分钱，所以没人认为他俩搞特殊化。后来区文教科刘麟科长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刘科长对校长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假如说当时某校长用学校经费买了两头沉或一头沉的办公桌自己用的话，这种奢侈、铺张浪费、校长搞特殊化的情况，肯定是要受到处分的。

青塔院小学随着班级的增多，在编制上要增加工友一人。1953年的时候，正是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处于大发展时期，各单位都在增加用人。所以不论是长期工或临时工都很紧张，学校要找一个年轻力壮的工友，特别是常年住校的，很不容易。青塔院小学工友赵守田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他提出申请，让他老伴来当工友。于化成向区文教科请示此事，区文教科同意了。赵的老伴姓王，没有上过学，没有名字，要出来工作，没个名字怎么行呢！于是赵请于化成给他老伴起个名字。于考虑了一会儿，说：叫王稼吧，意思

是好好守住田里的庄稼。赵守田非常高兴。学校拨给他俩一间房子，这样“以校为家”不仅是奋斗的口号，而且变成现实了。他们夫妻二人，凡是能自己动手做的绝不去买；凡是自己能修理的绝不雇工；凡是能凑合着用的绝不丢弃。在节约灯、水、电、煤四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据知在1953年冬季取暖用煤一个冬天节约了两吨多。当时煤比较紧张，冬煤的供给指标不高，区文教科号召各校节约用煤，结果这年冬天，各校都有节约，根据学校规模大小，用煤量多少的不同，节约冬煤数量也各不相同，像青塔院八个班规模的学校节煤两吨多，算是最多的。他们夫妻二人还把学校收拾得处处干净利落。

两年后赵守田被提升为事务老师，赵更加高兴，每天都超负荷的工作着。不久成了海淀区小学事务员中四大好管家之一。这四个好管家是：海淀中心小学的董包（董的前额上长着一个小包，人们都叫他董包（并无恶意），他也痛快地答应着。时间长了，他的真名叫什么大家就都忘了。笔者叫他老董，不叫他董包，但董的真名字也忘了）。董年纪较大，退

休较早，他是海淀区小学事务老师中第一个好管家。第二位是前八家小学的李万选，他也是由工友提升起来的。再有就是甘家口小学的事务老师（这位事务老师的名字失记）。他们之中，以甘家口小学的事务老师业务最强。每次区文教科办各种培训班时，都调他来主持后勤工作，李、赵等在他指挥下工作，他们配合得也很好，每次任务完成得都很出色，得到受培训学员的好评。

于化成在青塔院小学还培养了一个青年优秀教师丁海鹏。他是海淀区小学中唯一的全国劳模，后来调到甘家口小学。可悲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自杀），时年33岁。

粉碎“四人帮”后，区文教科为他召开追悼会，会上原教育局局长、时任海淀区第三书记的李书龄也出席了。（第一书记张还吾、第二书记兼区长李培山）。追悼会庄严肃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淀区小学教师追悼会中规格最高的。

于化成于1956年调区文教科工作，后升为小教科科长、副局长。孙凤池也于1956年调海淀中心小学工作。

## 忆北京市海淀区红门小学

吴春华

海淀区红门小学原坐落在著名的三山五园内的玉泉山西北侧，香山路红门村26号，是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全日制完全小学，划片归属四季青中心学区。1994年7月海淀区教委对全区中小学调整布局时，将红门小学合并到北坞小学，校舍改作他用。2019年随着红门村的整体拆迁，原校舍改造成了绿化带和拓宽的道路，其位置在香山路玉峰路北口，玉峰桥南边的马路东侧，原校园中的一棵老杨树依然耸立在那里。

红门小学的历史沿革比较简单。据20世纪60年代向当地何福元老先生等人请教，以及在2008年在海淀区档案馆查



1990年教师在校园排练运动会队伍（作者供图）

找到的资料显示：学校在1949年北京解放前是所私塾，解放初期为“北京市第十六区红门村国民小学”，1952年海淀区成立后为“北京市海淀区红门小学”，至1994年7月合并到

北坞小学，红门小学共存在了45年。

红门小学师生员工在海淀区教育发展史上曾倾心奋斗过45个年头。感恩党和政府给予我们身为人民教师，忠实

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这个平台。在这里，我们承载过为祖国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肩负过一方百姓对教育子女寄予的厚望；曾为了孩子们的进步和健康成长，用心用情、呕心沥血、不甘寂寞、无怨无悔；曾付出过建设、呵护校园的艰辛与汗水；亲身体会过师生员工和谐共处、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幸福与愉悦；享受过学校和师生们取得点滴进步和荣誉时的骄傲与欣慰。作为曾任学校最后两届负责人的金秀萍（1970年—1981年就任）和吴春华（1968年到校，1981年—1994年就任）两人曾在校工作多年，虽现已年近耄耋，仍深感有责任有担当，竭尽全力与师生们一起，将亲历、目睹并参与学校45年里发展变化、日益完善至完成历史使命的始末整理并保留下来，不仅是为了怀恋，更是为四季青乡，为香山地区及海淀区教育发展史提供一份真实的历史信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海淀区政府文教科领导下，红门小学1952年曾划片归青龙桥中心小学；1956年与四王府小学、门头村小学、北辛庄小学划片归香山中心小学；1967年

北京卫戍区军宣队进校；1968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派农宣队进校，成立三结合领导班子；1969年四季青公社文教组管理学校；1977年恢复海淀区教育局行政管理；1984年与香山小学、四王府小学、门头村小学、北辛庄小学划片归红旗村中心小学；1986年与四季青乡范围内的18所小学同划片归四季青中心学区。

原红门小学校规模较小，负责人皆为主任教员，至1987年才为校长负责。解放初期主任教员是贵瑞轩；60年代初期曾为李荫亭、苗雨时、郑乐君；1967年香山大队贫下中农管学代表进驻，代表先后有关素卿、赵河、白文海、佟林英、李凤章等；三结合领导班子曾有军代表小孙、佟林英、郑乐君、刘宝山、曲秀菊等；1970年至1981年金秀萍主管领导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曾有郑乐君、曲秀菊、陈蕴爽。此前学校的上级直接领导和财务均在香山中心小学；1981年至1994年吴春华先后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肖迎敏曾任教导主任，桂书英曾任教学主任，苗雨时、关继元、丁志金曾先后任会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教师曾有：窦增源、殷学衡、李荫亭、周兰伯、那老师、陈继德等；60年代中后期至1994年正式教师先后曾有：苗雨时、李道鹏、郑乐君、曲秀菊、唐红焱、刘宝山、张凡、吴春华、乔燕生、金秀萍、王惠芳、陈蕴爽、付淑英、汤泽华、刘凤兰、林红、朱连英、宋银华、桂书英、张卫东、张秀茹、肖迎敏、李秀英、关继元、丁志金、李玉琴、金万伶、严昌媛、闫春利、肖永茹等。80年代末至90年代教委分配来的中师毕业生有：孙宏斌、周军浩、狄春生、朱景毅、丁文娟。

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代课教师流动性比较大，曾有：霍玉珍、王爽、姜玉珍、杨玉珍、张玉兰、庞美玲、常桂英、孔翠兰、张淑英、张彦光、朱宝利、刘维栋、韩瑞林、李慧敏、赵永林、郭艳红、王福林、万军、闻彦平、韩宝贤、马毅民、岳忠祥等。

学校在1965年前是一所公办农村初级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四个班，据资料显示只有90余名学生，学生读到四年级初小毕业后，需到四王府小学或董四墓小学就读五六年级。

1965年学校增设了五六年级后开始成为完全小学。

根据就近入学原则，学校生源主要来自红门村和周边的单水门、向阳新村（原丰户营村、道公府村、娘娘府村）、普安店村、正蓝旗村部分和中央警卫团玉泉山驻军、部队农场、北京卫戍区普安店驻军、象鼻子沟国务院管理处等地。其中农民子弟约占八、九成以上。70年代初期有200多名学生，1981年有学生171名，1991年有学生141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毕业生大部分考入六十七中。1988年后毕业生除按比例升入海淀区重点中学外，基本升入香山中学。学校每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六年级学生升学率均为百分之百，没有流失、辍学现象，45年里，红门小学培养出近千名毕业生。

回顾上世纪60年代后期，学校的校园环境和办学条件仍然十分简陋、艰苦。当年，学校的正门是两扇朝北约两米多宽的红色木板门，前院约400平方米，后院约200平方米，后院的门常年敞开着，村里人可以从校园里随便穿行。学校一共只有六间教室：两间是以前看坟地的人用过的房子，两间是黄土地面的小民房，还有

两间是生产队盖起的大教室。校园没有专用教室，没有正式操场，也没有体育器材，体育课要到生产队空闲地去上。学校连个正式的厕所都没有，只是在墙外挖几个坑，用秸秆之类围起来使用。校园场地是土地，师生们雨天、雪后便是两脚泥。70年代初期因小学增设戴帽初中班，全校共有八个班，200多名学生，教室不够用，一段时间曾拆下学校的大红门板当课桌，孩子们自带板凳围坐在院子里上课，后又借用过丰户营村赵斌家的几间房做教室。那时，村里和学校都没有自来水，只能用轱辘打井水。自从香山大队红门粉坊建起后，每天老师带着高年级学生到那里去抬自来水用。直到80年代中期红门村接通了自来水，在香山大队帮助下，师生们也动手在地面挖沟、埋水管，这时学校终于引进了自来水。

在教育局领导下，在共建单位、生产队和友邻单位支持下，以及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下，学校各方面得到逐步改善，旧貌换新颜。70年代中期生产队批给学校西边一块空地做操场，张彦光和张卫东等老师带领高年级同学搬来许多大石头，抬来黄土，自己动

手砌围墙，修操场，还立起了篮球架，种上树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中期，海淀区教育局基建科分别两次拨款用以改建校舍。负责后勤的苗雨时和关继元老师分别担当重任，他们到处奔波备料、采买、寻求援助，在资金和人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尽力少花钱多办事，全校师生也总动员，一齐动手从香山大队砖场往学校搬砖。经多方努力终于完成了翻建和新建教室、办公室、院墙、校门、食堂、库房、厕所、车棚等任务。老师们还自己动手铺设了通往教室的砖甬路，并利用假日义务给教室、办公室粉刷墙壁。共建单位和友邻单位更是坚强后盾，为学校建设和美化校园有求必应，使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教委又为学校配置了钢琴和各科教学用品及体育器械，各项教学设施、教具齐备，供师生阅读的图书册数超出小学校标准。经改建后学校占地面积2775平方米，建筑面积427平方米。8个普通教室和2个专用教室分别安排在三排北房的教学区，孩子们终于能如愿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

90年代初红门小学的全貌是：朝西的四米多宽的铁艺大

门,大理石的校牌;进入学校首先看见前院北侧银色旗杆上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两棵桧柏树守护两旁,玻璃橱窗的宣传栏排列在西侧;前院南侧是平展的操场和篮球场;正对校门的校园东面是立着假山石的花坛,里面的牡丹花春天盛开;花坛后面墙上挂着海淀区教育局颁发的“文明单位”金属奖牌;沿着水泥方砖铺设的道路从大门一直通往三个教学区和办公室,教学区排间分别建有花砖墙、月亮门和扇形门;前后院各设有乒乓球台,每天校园里充满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和欢笑声。学校前后院种植着核桃树、杨树、流苏树、猬实树、栎树等。农村孩子淳朴可爱、尊敬老师、听从教导,教学秩序良好,树上挂满的核桃触手可及,孩子们却一个也不碰,待到成熟了一起敲下来,分到每个孩子手中,大家高高兴兴带回家与家人共享。

当年,为提高教学质量,老师们付出的艰辛超出一般学校。农村小学家长每天很劳累,顾不上孩子们的学习,而且大多数家长文化程度有限,因此,孩子们的学习任务基本是依靠老师了。很多孩子们学习起点很低,有的孩子连怎么

握笔都需要老师从头手把手教起,从数数和笔画教起,老师们因材施教,每天除课上耐心教授讲解外,课后辅导补习工作量很大。就这样大家依然充满爱心,不辞劳苦,早出晚归,不计任何报酬,对每一个有困难的学生不离不弃,最终圆满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每一个孩子顺利升级、毕业,一个都不能少。

学校虽然规模小,教师编制少,但老师们仍坚持开足所有课程,严格执行各科教学标准,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体育成绩均达标,学校还定期对各年级学生进行汉语拼音和数学口算、简算等基本功测试,孩子们都能达到成绩优良。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全体老师分工,为全校孩子们组织起课余兴趣小组。每名教师身兼数职,班主任也是中队辅导员包教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写字等课,校长、大队辅导员也要兼上科任课,就连负责传达室的一个人还要负责烧锅炉、打铃、搞卫生、帮厨等。

1988年在教委领导下学校进行内部管理体制改,实行校长负责制,成立独立党支部,设立教职工大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实施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教师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和《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结业证》,每年度对教师进行全面考核,包括职业道德、业务素质、教育教学质量,全校教师每年均能达到优良标准。学校编制14人,均为正式教师。教师职称评定中,小学高级教师8人,小学一级教师5人(其中中师实习和转正4人)总务1人。教师中有大专学历1人,中师、高中学学历11人,初中学历2人。学校的各项管理和教育教学步入正轨,各项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

老师们对学生事事处处充满爱心,在学习、健康和生活中的关心无微不至,做到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师生之间亲密无间。学校干群关系融洽,家校关系密切,大家以校为家,学校的一切事情都视为己任,就连每位教工的家属及亲友也都有为学校做好事的故事。全校女老师自己动手利用业余时间采买、设计和缝制运动员的服装。很多孩子早晨吃不上早饭,老师们就每天轮流早起提前到校帮厨,为孩子们做加餐,应家长的要求学校举办了学前班。

学校的文明建设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共建单位的支持和资助。1983年起至1994年中央警卫团四大队二中队与学校坚持了11年的军民共建关系，学校多次被评为“海淀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四大队二中队1992年被评为部队的“全国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和“海淀区拥政爱民先进单位”，部队领导关心学校师生和学校工作，多次到校座谈、慰问。二中队配合学校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组织学生军训、参观军营、赠送学校图书。中队长张久灵亲自带兵帮助训练学校运动员队伍。二中队官兵义务为学校校园建设付出太多的人力和物力：精心制作、安装升国旗的旗杆；从颐和园停车场搬运来大块水泥方砖铺设校园道路；在校园教学区建起了花砖墙、月亮门和扇形门；为孩子们修建乒乓球台；为绿化美化校园种植牡丹花等等。每年的教师节部队都来慰问教师。学校师生也积极参加部队的重大活动：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春节都举行军民联欢，每年迎接新兵、欢送老兵，都是学校的重大政治任务，桂书英、宋银华、狄春生等老师带领师生精心编写诗歌、排练节目，到营房慰问

联欢、与战士们同台演出、为新战士和老战士们献词、献花，不但配合部队顺利完成政治思想工作等重要任务，也表达了全体师生对共建单位官兵发自内心的感激敬佩之情，更是部队和学校的常规思想教育活动。

驻普安店的北京卫戍区部队三团为学校增添学生课桌椅，为学校建起玻璃宣传橱窗、赠送图书、建设假山石花坛，为教师检查身体、为学生看病疗伤，安排学生到部队礼堂看电影等等。驻象鼻子沟国务院管理处经常派车安排孩子们春游和师生外出活动。中科院植物园支援学校办公用品和建材，赠送绿化树木。香山大队粉坊和果树队以及附近村民、家长也对学校格外关照。

20世纪80年代，根据国情和教育改革形势，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办公经费包干，教师的结构工资需部分自理。在海淀区教育局校办企业办公室主管下，学校克服重重困难，曾先后创办了三个校办企业：玉泉山涂料厂、华都电器设备厂、玉泉山化工建材厂。学校利用校办企业微薄的创收要解决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用于增添教学设备，修建校舍，甚至补充冬季教室取暖用煤，还用来组织学

校师生活动，建教工洗澡间等，更要用来解决补充教师结构工资按月发放和教工福利。

在这45年里红门小学师生自强不息、拼搏向上，有各级领导的指导、关怀和鼓励，有家长们的支持和信任，有共建单位和友邻单位的关心和鼎力相助，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可喜的成就。1983年学校被海淀区教育局评为“文明单位”，同年被评为海淀区优秀少先队大队。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校多次被评为四季青乡和海淀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获“1993年海淀区军民共建先进单位”锦旗。1989年在四季青中心学区十八所小学运动会上获入场式第一名，并代表学区在海淀区小学生运动会上获入场式第一名，香山中学邀请我校入场式队伍到那里示范表演。1984年赵永林老师培训的校篮球队王京军等队员参加海淀区小学生篮球比赛获第一名。

1975年陈蕴爽老师带领全校学生编写了二百余首歌颂祖国、歌颂党的儿歌，老师们帮助配画了插图，四季青公社特意将这些儿歌安排在公社礼堂举办展览，获得众人好评。1978年桂书英、马毅民老师所教毕业班的学生张宏伟、王朝



1990年六年级毕业生和全校教职工合影（作者供图）

阳考上101中学,其他学生全部升入六十七中,海淀区教育局在红门小学召开了全区农口小学教师教学交流会。同年桂书英老师为海淀区教师作语文教学公开课。李玉琴老师所教毕业班学生所表现出的组织纪律性,受到肖校长的电话表扬。1986年桂书英老师辅导的郭睿同学获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三等奖,1988年辅导的冯卫国、赵军、王桂环参加北京市小学生作文比赛获奖。1990年美术老师孙宏斌辅导的学生任远绘画作品获全国青少年美术作品比赛二等奖,作品赴日参展并刊登画册。1988年桂书英老师被评为北京市中小学首届“紫

金杯”优秀班主任,宋银华曾被评为海淀区优秀大队辅导员,金秀萍、曲秀菊、关继元、朱连英、付淑英、汤泽华、宋银华、肖迎敏、李玉琴等教师曾获海淀区或四季青乡先进个人,吴春华1994年被评为四季青乡“好校长”。

学校历届毕业生继续深造后,在各行各业为祖国做出贡献。他们中的庞玉英、宋银华、王玉清、李伟、肖飞、刘松梅、李威、宋小雨、宋阳等成为教育工作者;宋娟、宋小冬、侯暲等成为医务工作者;贾志刚、贾志强、张永琴、韩淑敏等担当基层领导干部工作;李彦青成为知名小提琴制作者,作品远销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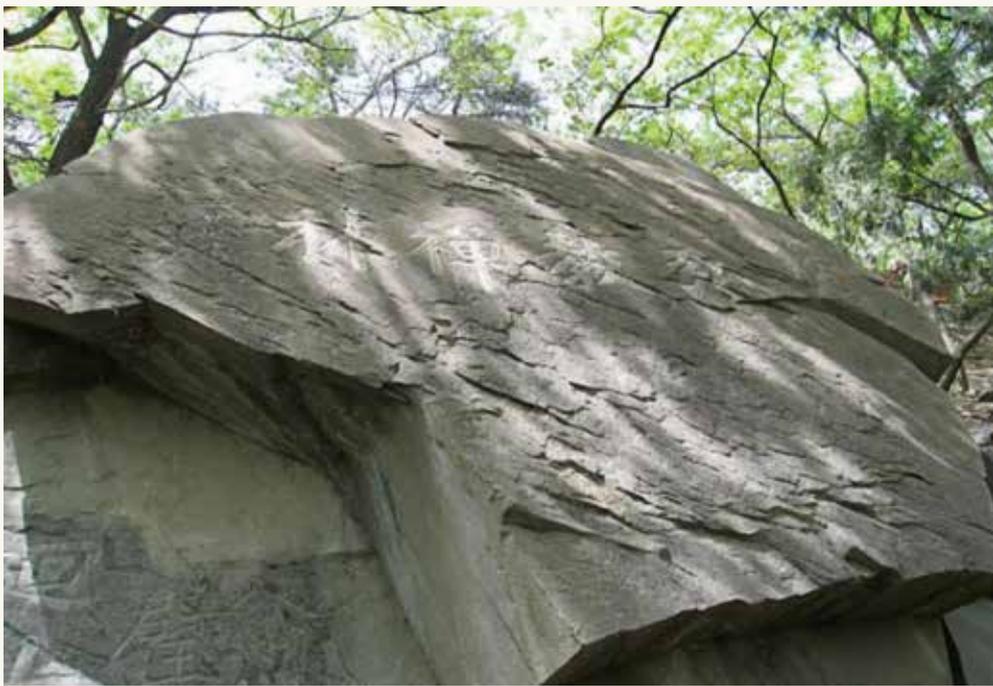
外;韩京云、蒋福顺、田红、张焕新等成为成功创业者。

忆往昔,感慨万千,红门小学这45年的历史虽然不够厚重,但在海淀区教育历史的长河中也不愧为一朵小小的浪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在这里坚守教育岗位,奉献青春年华和近半生心血,是我们毕生的荣幸。执行政府教育改革的决策,珍惜刻骨铭心的追忆,对未来充满期望,是我们的情怀。祝曾经的红门小学师生们永远幸福安康,祝海淀区的教育改革成就更加辉煌,愿红门小学旧址上的绿化带永葆蓬勃生机。

(作者系原红门小教师)

# 弘教禅林题刻与弋庵

张嘉鼎 铁木伦



香山法海寺内“弘教禅林”刻石（作者供图）

香山法海寺内有一块巨石，雕刻有“弘教禅林”斗方大字，署名弋庵，古时有十余个弋庵。考订此落款应是元末明初的弋庵和尚。即《续高僧传》中的一如和尚。他精通《法华经》，被释道衍（姚广孝）称为“两浙一

人”。明朝洪熙元年（1425）圆寂于京师海印寺，年七十四。此处石刻估计是明永乐洪熙年间，他在僧禄寺为官时所刻。我曾就此事请教过吴小平先生，他说：“有说一庵是一如的号，此人元末明初在僧禄寺待过，

并且编写刊印过大藏经，只能怀疑此人就是法海寺题刻的弋庵了。”

一如，字弋庵，晚年号退翁，浙江上虞人氏，俗姓孙。生于元至元十二年（1352），十三岁时（1364），于长庆寺出家，



法海寺刻石（作者供图）

后到杭州宝奎寺受学。明洪武十八年（1385）主持松江崇庆寺，后又主持苏州北禅寺。洪武二十七年（1394）溥洽法师延请一如为天禧寺都讲。次年，主持杭州天竺灵山寺。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迁居上天竺寺。

益以振宗启后为己任。而从学者益众。永乐初（1403）。退处大报恩寺。以法华如来奥旨所寓。非学者所易入。乃集众说为之注。太子少师姚公。为序之。且称如公两浙一人。上（永乐皇帝）尝览之。奖谕再三。加以后赉。永乐十二年（1414）被召入京，纂修大藏经，而师总其事。授僧禄司右觉义（从八品）。既升右阐教（从六品）。洪熙元年（1425）三月，圆寂于北京海印寺。春秋七十有四，坐六十一

夏。赞维，舌本不坏，塔而藏焉。

海印寺即明宣德二年（1427）改建的大慈恩寺。在顺天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寺名出自佛家“海印三昧”，大海水面所现诸相之意。

式庵不是法海寺住持，他所题“弘教禅林”和那首诗：“春山梵刹青天半，楼阁峥嵘北斗齐。曲径盘空环翠色，登临扫石记留题。”多半是永乐十二年（1414）他到北京升任右阐教（从六品）后来此游览时所写。法海寺“弘教禅林”题字前方曾有一块独立的石头矗立在路边，上面刻有一首自称“苍雪友书”的刻石，写到：“踏破苍苔云半亩，携琴来访式庵叟。漫理冰弦为我弹，流水高山心万古。”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修建金山宝藏寺碑记》载：“上有金山宝藏寺，创于明永乐九年”。据《皇帝飭赐金山宝藏寺记》记载：正统三年，道深和尚主持重修苍雪庵，皇帝赐名为“宝藏禅寺”。

由上可知，创于明永乐九年（1411）的苍雪庵在正统三年（1438）重修并更名为宝藏禅寺。而式庵圆寂于1425年，春秋74岁。那时金山宝藏寺还叫“苍雪庵”，既然“来访式庵叟”，肯定说明式庵按“七十为叟”俗理，在1421年70岁前后住在法海寺。“苍雪庵”的这位琴友来访式庵听其弹“高山流水”一曲，在时间上是非常合理的，刻诗也当写于1421年左右。法海寺诗刻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了，我们应多加保护。

# 明代宦官与大慧寺

张鹏飞

大慧寺是海淀区内的文化瑰宝，它是明代正德八年（1513）由司礼监太监张雄建造的，此后在嘉靖、万历两朝又经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麦福、黄锦、张诚等重修，并在晚明成为存放司礼监宦官影像的场所。我们可以通过大慧寺透视宦官与寺庙的关系。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中记载：“大慧寺，在畏吾村，正德八年太监张雄建，赐护持敕谕。十年，学士李东阳撰真武殿铭。”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五中记载：“明正德癸酉司礼监太监张雄建寺于宛平县香山乡畏吾村，赐额曰大慧，并护敕勒于碑。寺有大悲殿，重檐架之中，范铜为佛像，高五丈，土人遂呼为大佛寺。嘉靖中太监麦某提督东厂，于其左增盖佑圣观，于是合寺观计之殿宇凡



大慧寺旧照（作者供图）

一百八十三楹，拓地四百二十一亩。盖是时，世宗方信道士而厌缙流，内官惟恐寺刹之毁，故建道观于其旁，而寺后之山又有真武祠，藉此以存寺也。寺之始建，大学士茶陵李东阳为碑，工部尚书汤阴李鏊书之，新宁伯谭佑篆额。其增置佑圣观也，大学士余姚李本撰文，礼部尚书高

安吴山书之，成国公朱希忠篆额。其后万历壬辰重修，则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太仓王锡爵撰记。”

李东阳所撰大慧寺碑并未收入其文集中，也未见诸其它文献，因此对于大慧寺创建的情况目前还无法确知。张雄是正德年间颇有权势的宦官，深受明武宗

信任，曾管理东厂，并事武宗于豹房，与张锐、张忠共号称“三张”。明世宗即位后，张雄被逮送都察院治罪，后由于其他宦官的庇护，得到宽宥。大慧寺应在张雄失势后衰败。

李的《重修敕赐大慧寺并增盖真武佑圣观记》，则收入《期斋吕先生集》卷八。其文曰：

出都城门外半里许有寺曰大慧，正德间创于司礼太监汤阴张公，盖公尝为生墓于此，故得请于朝为寺，赐敕与额，一时雄丽瑰伟杰特之观，前碑载之详矣。今修之则司礼监掌监事兼提督东厂太监前三水麦公、今古洛黄公也。初二公奉上帝命如金山，道寺门入礼佛像，见其金碧剥落，庙屋瓦半溜，檐楹就朽，周垣圯尽，相与感叹久之：及今不图寺其墟矣，且吾辈日侍禁庭，大官厚禄，受主上洪恩，每切无以为报。尝闻大慧之教以善导人，其法谓人能舍其所有以致其崇饰严奉，则其应也如响，而其愿也无不获，盍舍吾所有以致其祝于主上，庶几所以报乎。于是取旧寺殿宇佛像一新之，既不以费惜。又谓我国家定鼎于北，惟真武默佑之功不细，而寺中故有一庙据石假山，隘小不称，乃就寺东隙地改创佑圣观，廊庑阶序，翼然成区。又创龙王庙一所，制亦如之。其他经楼、僧舍、斋房、漏室、东西两宅、园圃莹域各两区。甃甃石，为墙二道，凡寺所有，靡不修饬，视旧有加焉。计所增殿宇以间计一百八十有三，合故所存为间二百九十有七。又拓地以亩计一百四十有三，合故地为亩四百二十有一。先寺有地在昌平州，贍香火葺理之费，后占于土豪及没入于户部，而寺亦因以不振。至是有来告于黄公者，公核而得之，又尽复故地三千六百有四亩，仍归于寺。盖地之有亡，系寺兴废，有不可不复者。公又以为年运而往，则复者难保不没，而新者或有时而敝也，欲列之石以昭示将来，而以记

属予。惟张公初为此寺时，岂非自爱其藏，将托寺以为久耶。才四十余年而垣庙就圯，田已窜入黠室，微麦、黄二公，后几不复省识矣。是其所托又有待而后存也，废兴由人，詎不信欤。而或者以为二氏之教不能自重，惟人主为能重之，今我皇上神圣御极，超轶千古，而敛福锡庶，覆焘万言，无不欲人入于善也。彼所谓以善导人者，虽其事玄深，不可质究，倘其归，亦有合乎麦、黄二公崇饰而严奉之，其心一主于祝圣报国，以竭其为善之诚，固非有所为而为。为者且二公忠勤正直，受知明圣，勋劳行能方茂于天下。是寺将藉以为重而岂待予记而存也。若其修造之年月则不可不记也。

此记透露的第一条重要信息是大慧寺是张雄的坟寺，即所谓“生墓”“藏”。麦公是麦福、黄公是黄锦。麦福，字天锡，号升庵，广东三水人，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所撰《司礼监太监掌监事兼督东厂麦公墓志》中记载“丁酉（十六年，1537），总督东厂。戊戌（十七年，1538），兼管尚衣监印。己亥（十八年，1539），上南巡，奉命留守京师，赐符验关防。乙巳（二十四年，1545），迁司礼监。丙午（二十五年，1546），提督先蚕坛，掌理祭礼及诸礼仪。戊申（二十七年，1548），复总督东厂，镇静不扰，缙绅谓贤。己酉（二十八年，1549），掌司礼监印。国制，凡旨下诸司礼，名为秉笔，而掌印者尤重，诸监局莫敢望焉。然每遇东厂奏事，则皆趋避，故东厂尤名有事权。累朝以来，未有兼其任者，兼之自公始。自受命至于卒，凡四阅岁。”麦福是第一位以司礼监掌监事兼总督东厂的宦官，以一人掌管两大重要机构，足见明世宗对他的信任。黄锦，字尚纲，号麓山，河南洛阳人。《国朝征献录》卷一一七徐阶所撰《司礼监太监兼督东厂黄公锦

神道碑》中记载“公少敏慧谨慤，无躁动，无疾言，见者知为大器。正德初，选人禁庭，又选读书于内馆，继又选授兴府伴读。先皇帝在潜邸，公有保翊功。及入嗣大统，录公旧劳，累升御用监太监，再改尚膳、司设、内官诸监。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转司礼监佾书。癸丑（三十二年，1553），进掌监事，兼总督东厂密务。公感先皇帝眷遇之厚，益矢心图报，凡事持大体，而综理莫不周悉，纲纪条目，大小灿然。先皇帝御下严明，中贵人鲜克当意，独于公信任不衰，至呼为‘黄伴’而不名。”黄锦是明世宗兴王府的旧人，因此备受重用。《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一》中记载“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伤不敢大肆。”可见麦福、黄锦并未像正德年间的宦官那样嚣张跋扈。

麦福逝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黄锦继任司礼监掌监事兼督东厂太监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则他们重修大慧寺并新建佑圣观、真武庙当在三十一年及以前，并往后延续，后期由黄锦独任。佑圣观与真武庙都与真武信仰有关，他们建此二庙如纳兰性德所说当与嘉靖皇帝崇道有关。园圃、莹域各两区则说明麦福和黄锦可能有意在此选择莹地，或为同仁择莹地。

大慧寺在万历年间又重修。虞淳熙《虞德园先生集》卷七《重修大慧寺记》中写道：

佛语心楞伽之城则大慧大士独受指云。惟是燕之宛平，取义宛宛以平，无所谓楞伽之壁立万仞也者。而大慧之寺何以称焉？客有道曰：“此武宗皇帝彰贤于斯者也。”贤必德慧，德慧无际，必大而不可量等等大慧，故以寺先祠，以祠彰贤，谁欤贤者？昔司礼张公雄是已。公以诗书侍武宗乾清宫，敷奏称旨，日号百工，无淫无汰。于是上

曰司礼贤。卒赐葬宛平之香山乡，立彰贤祠，令僧子冲守之，僧非守祠者，复立寺，居子冲之徒，为大慧寺。当此之时，祠翼翼，寺亦凌云造天，与玄明宫等矣。后八十年而今司礼张公某又以诗书侍今上，上贤焉。有告祠圯寺颓者。张公曰：“是诚在我。”内庭诸公闻，莫不曰：“是诚在我。”贱货贤贤，思以彰之，咸兹罔有二心。则祠寺所以奕然复也。形朱髹漆，四映化人，绘壁丹墉，交呈变相，起仆石，削芜阶，崇已倾之台，象彼楞伽而表大慧，慧存则贤与存，慧体也，贤其用也……

从虞淳熙的记文中可知大慧寺旁还有张雄的彰贤祠，祠、寺、墓葬三者一体。这次重修在建寺后80年，则为1593年，这时掌管司礼监的太监是张诚，那么重修事宜也当是他主导的，并得到内庭宦官的响应。张诚，号敬斋，北直隶保定束鹿县人，早年侍奉明神宗于东宫。明神宗即位后，在与冯保的斗争中失败，被赶出宫。张居正去世后，张诚再度入宫，并对冯保进行揭发。万历十二年（1584）张诚掌管司礼监，万历十八年（1590）他又兼掌东厂，集内府行政监察大权于一身。《弇山堂别集》卷十八《又三张中贵》条称张宏、张诚、张鲸为三张，皆为当时权阉。刘若愚在《酌中志》中称张诚“为人耿直不阿，好看书，每据古事规谏，或暗地讥骂，无所忌，神庙颇惮之。”可见张诚有其谨伤的一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诚因其弟违禁与皇亲武清侯家联姻，又擅作威福，聚敛财富，为言官弹劾，被降为奉御，发往孝陵司香，后又发往南海子，并被抄家，最终穷困而死。

嘉靖、万历两代兼掌司礼监与东厂的首席宦官主持修缮大慧寺，显示出大慧寺与司礼监的密切关系。明末刘若愚在《酌中志》卷十六中记载“凡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故后各有牌位，



今大慧寺（宁葆新供图）

送外经厂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门外大佛寺供安。看厂监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绝也。”由此可知大慧寺是司礼监的公共香火寺，司礼监宦官的影像在此供安，由守寺僧人侍奉香火，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司礼监宦官要屡次重修大慧寺，只是大慧寺何时成为司礼监公共香火寺的时间尚且不明。《翁同龢日记》中记载：“光绪十一年乙酉八月初二日（1885年9月10日）一时许再行，望见大佛寺即大慧寺，与芝庵策马寻之。守者一老人，开锁不得，逡巡良久始得入殿，瞻叹久之，一磬，嘉靖辛酉司礼监铸。殿前活动松半枯矣，蓬蒿没人。”嘉靖辛酉（四十年，1561）司礼监所铸磬的存在，也能说明司礼监与大慧寺有一定

关系。

清人记载中，仍然重视大慧寺与宦官的茔地。刘大櫓作有《游大慧寺记》，收入《海峰文集》卷五。他在文中写到“余客居京师，无事，间从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环城之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而其内又必请于中朝之贵人，自公辅以上有名当世者为文，而刻石记之。出西直门，过高梁之桥，西北行三里许，其地为宛平香山之畏吾邨，有寺曰大慧。自远瞻之，高出松栝之表。其中堂有大佛，长五丈余，土人亦呼为大佛寺云。盖明正德中，司礼监太监张雄之所建也。

寺后积土成阜，累石为山，山阜之峻，下视平地殆数仞，其石皆自吴之震泽舟载而輿致焉。山石嵌空珑玲，登其石罅以望远，内见外，外不知有内。寺左建佑圣观，而于土阜高平之处建真武祠，大学士李东阳为文，立石祠门之外。盖当是时，世宗方尚道术，阉人惧其寺之一旦毁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祠以存寺。寺之西，坟壤累累，而石人石兽巍然夹侍于前，大抵雄族亲之冢也。”刘大櫓《过大佛寺阉人葬处》诗曰“阉人死去道犹尊，翁仲衣冠满墓门。真武祠前杏花落，塞鸿飞过畏吾邨”。刘大櫓诗、文都可证明大慧寺旁的宦官墓葬清代都还存在。

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卷七《九月二十日由畏吾村至大慧寺拜西涯先生墓》诗曰：“畏吾村迤东，巍哉大慧寺。寺右三墓场，二具铭与识。土峰屹南向，巖壘起平地。”此诗注重提及具铭的两处墓葬“一为太监张墓，一为刘氏墓”。斌良《抱冲斋诗集》卷十三《三月朔日游大慧寺》诗注中提及“祠旁明尚衣监太监墓犹存”。两人诗作亦可证明代宦官墓葬是大慧寺旁重要的景观，显示寺庙与宦官的密切关系。

# 圆明园、颐和园演剧场所 与演剧剧目考略

勾 超

## 一、圆明园戏台及剧目

### 1. 历朝戏台建议

清代帝王驻跸京城西郊的圆明园始于雍正皇帝，清宫演剧舞台的修建也始于雍正朝。现可知雍正朝在圆明园修建了三座演剧舞台——戏台，分别是同乐园大戏楼、万方安和戏台、西峰秀色戏台。

同乐园大戏楼为三层院落式戏台，是清代皇家戏台的代表之一。

万方安和戏台为室内戏台，位于园内北一路自西数第二间。

西峰秀色戏台为单层院落式戏台。

乾隆朝，清宫演剧达到鼎盛，编创连台本大戏，修建演剧舞台，演戏遂形成规模和惯例。根据现有档案记载，圆明园内于乾隆年间修建的演剧舞台有五处，依次为乾隆三年（1738）建成的长春仙馆戏台、乾隆四年（1739）建成的慎修思永戏台、乾隆七年（1742）建成的汇芳书院戏台、乾隆十二年（1747）建成的思永斋戏台和最晚于

乾隆五十一年（1786）建成的奉三无私戏台。

长春仙馆戏台为室内戏台。据档案载，乾隆三年二月，乾隆皇帝下旨为长春仙馆戏台承做匾额和楹联，样式均照紫禁城内重华宫戏台的匾额、对联文字和款式。

慎修思永戏台为室内戏台。乾隆四年的“活计档”记载：“慎修思永西洋戏台北，床两旁书格顶上，着画画人王幼学，画水、画古董片十片”。戏台位于慎修思永殿内东北角，左右两侧设上下场门，前设栏杆与看戏厅相隔，后接三间仙楼，作为后台使用。

汇芳书院戏台为室内戏台。据档案载，乾隆七年（1742）八月，戏台糊油纸时，著名画师郎世宁曾在此作油画。戏台的具体位置在汇芳书院的抒藻轩殿内。

思永斋戏台为室内戏台。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乾隆皇帝曾下旨为思永斋戏台制作“节协咸英”匾额和对联，式样参照故宫重华宫戏台上的匾额和对联，乾隆二十三年（1758）

又将此匾额和对联改做成为一块黑漆金字玉匾。

奉三无私戏台为室内戏台，据资料可知其最晚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建成。咸丰二年（1852）五月，奉三无私戏台经过重修。

嘉庆朝延续了乾隆时期的辉煌，新建戏台按修建时间依次为：嘉庆十七年（1812）添盖的恒春堂戏台、嘉庆十九年（1814）建成的淳化轩戏台、嘉庆年间建成的生冬室戏台。

恒春堂戏台又名壶中仙籟戏台。戏台为二层院落式，重檐歇山顶，坐南朝北。上下檐分别悬额“天上云璈”和“壶中仙籟”，戏台后接五间扮戏房供演员使用。

淳化轩戏台位于长春园含经堂，又名乐奏钧天戏台，为二层院落式戏台。该戏台为重檐歇山顶，后接扮戏房五间，外檐悬额“神心妙达”。戏台上下檐分别悬有“乐奏钧天”和“阆苑仙音”匾。

生冬室戏台为室内戏台，位于生冬室一景西南方向，建成时间不详。戏台也题额“阆苑仙音”，与淳化轩戏台的匾额相同。

道光、咸丰年间延续宫廷演剧习俗，又新建展诗应律戏台、慎德堂戏台、同道堂戏台等演剧舞台。

展诗应律戏台为单层院落式戏台，位于展诗应律殿对面，坐南朝北，于道光二年挪盖于此。因戏台上方悬额“庆乐升平”，故又名庆乐升平戏台。南接扮戏房五间，是皇太后观戏的主要场所。

慎德堂戏台为室内戏台，又名壶天仙籟戏台。

同道堂戏台修建于咸丰七年（1857），戏台为单层院落式，悬额“与古为新”。

## 2. 承演剧目

圆明园的众多演剧舞台，其中同乐园三层大戏楼、恒春堂、慎德堂、奉三无私等经常承演

节令承应戏：《文氏家庆》《早春朝贺》《对雪题诗》《东皇布令》《敛民锡福》《圣母巡行》《群仙赴会》《奉敕除妖》《仕女乞巧》《佛旨渡魔》《霓裳献寿》《九华品菊》《金仙奏乐》《升平除岁》等；在慎德堂、奉三无私、展诗应律、生冬室等演剧舞台承演万寿戏：《寿庆万年》《群仙祝寿》《百福骈臻》《天人普庆》《宝塔凌空》《福禄天长》《灯燃瑞塔》《添筹称庆》《龙凤呈祥》《恭祝千秋》等；在慎德堂、奉三无私、展诗应律、生冬室等演剧舞台承演喜庆戏：《红丝纳吉》《列宿遥临》《双星永庆》《慈云锡类》《吉曜充庭》《大士显灵》《群仙呈技》《山川钟秀》《五福五代》等；在同乐园、展诗应律、生冬室、万方安和、同道堂、慎德堂等演剧舞台承演观赏戏：《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等宫廷连台本大戏，《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杂剧以及《倒打杠子》《打面缸》《逢人拐骗》等诙谐玩笑戏。

### 嘉庆二十四年（1819）

五月初二日 同乐园承应头本《阐道除邪》，五出《金殿试术》奉三无私承应《规奴》（马庆寿、薛进喜）。

初四日 同乐园承应二本《阐道除邪》，十六出《彭泽斗法》。

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二本《阐道除邪》：十五出《雷击余氛》、十六出《三清祝国》。奉三无私承应《访素》（刘得山）。

### 道光三年（1823）

五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阐道除邪》。辰正一刻开戏，未初三刻戏毕。

金花聚妖	陈生自叹	月下摄韩	五夜吞舟
全节剖腹	起程失篆	二妖献印	谒师生蚌
拘魂辩明	蟒怪思春	渔郎获偶	渔户忧

儿 撮水阻舟 遭冤泣诉 金针刺蟒 大悲救难

初四日 展诗应律承应辰初开戏，午正二刻五分戏毕。开场《祛邪应节》，团场《寿山呈瑞》。

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二本《阐道除邪》。辰正十分开戏，未初二刻五分戏毕

渔色逢妖 狂狐作祟 灵判闲邪 拦街控诉  
白氏施威 金花奋勇 彭泽斗法 蝎虎吞儿  
投井幻形 献技投充 端阳闻信 妖犯锁拿  
哭尸露目 议盗同心 诸神预召 四怪全除

奉三无私酒宴承应酉初八分开戏，酉初三刻二分戏毕。《奉敕除妖》《祛邪应节》。

#### 道光四年（1824）

五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阐道除邪》头本。辰正一刻开戏，未初十分戏毕。

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阐道除邪》。二本辰正二刻七分开戏，未初二刻十分戏毕。

#### 道光九年（1829）

正月十三日 展诗应律承应《天官祝福》《痴诮点香》《击鼓骂曹》《苦过滑油》《借茶》《胭脂雪》《蜈蚣岭》《功宴争花》《一门五福》。

十四日 奉三无私午宴承应《景星协庆》。午正一刻开戏，午正一刻十分戏毕。

十五日 奉三无私午宴承应《万花向荣》，转宴《御苑献瑞》。

酒宴承应《柳营会饮》（一分）。酉初三刻开戏，酉正十分戏毕。

十六日 奉三无私承应晚班《天官祝福》《衣锦还乡》《懒妇烧锅》《花鼓》《十朋祭江》《演官》。

二十日 同乐园承应《喜朝五位》《打番》《庆成》《通天犀》《夺秋魁》《扫秦》《敬德钓鱼》

《送京》《盗瓶》《吃茶》《喜恰祥和》。

二月十五日 同乐园承应《千秋燕喜》《赠马》《逢人拐骗》《讲书》《水斗》《磨斧》二段《鸡宝山》《扬兵》《平章拷姪》《万载恒春》。

三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杜宝劝农》《醒妓》《扫秦》《敬德闯宴》《羞父》三段《鸡宝山》《琴挑》《罗成托梦》《罢宴》《勾芒展敬》。

四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天官祝福》《前金山》《卖子养亲》《单刀》四段《鸡宝山》。

四月十五日 同乐园承应《祝福呈祥》《苦过滑油》《煤黑上档》《照镜》《下河南》《三代》。

五月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金桃献瑞》《过平顶山》《六殿逢母》《祭姪》《打棍出箱》《三档》《混元盒》。

五月十七日 同乐园承应《芝眉介寿》《庆成》《击鼓鸣冤》《蜈蚣岭》《冥判》《罗卜济贫》《夜奔》《青石山》《相调》《八仙庆祝》。

七月十五日 同乐园承应《佛旨度魔》《见都》《万里封侯》《刘氏辱尼》《夜奔》《迓福迎祥》。

八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福寿双喜》《绣房》《敬德钓鱼》《学堂》《议剑》《沂水岭》《罗卜行路》《贺喜》《三元百福》。

#### 道光二十五年（1845）

五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戏头本《阐道除邪》十六出。

五月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戏二本《阐道除邪》十六出。

#### 道光二十六年（1846）

五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辰正三刻十二分开戏，未正二刻八分戏毕。头本《阐道除邪》（十六出），共长二十三刻四分。

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二本《阐道除邪》（十六

出)，共长二十五刻五分。

### 道光二十八年（1848）

五月初一日 同乐园承应戏辰正二刻六分开戏，未正三刻戏毕。头本《阐道除邪》（十六出）。

初五日 同乐园承应戏辰正二刻五分开戏，申初九分戏毕。二本《阐道除邪》（十六出）。

## 二、颐和园德和园戏楼及剧目

### 1. 德和园戏楼

除圆明园外，颐和园内也设有宫廷演剧舞台——德和园戏楼。德和园戏楼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戏台重檐三层，为福、禄、寿三台。

“寿台”为主要表演区，有活动地板，设有五个地井，通地下室。顶部有活动地板通向二层，为七个天井；二层“禄台”也有天井通向三层“福台”。天井、地井设轱辘、铁滑轮，供特殊演出时演员和切末上下。戏台对面为颐乐殿，是帝王、后妃看戏之处；东西两侧各一庑房，是王公贵族看戏之处。

《菊部丛谈》记载：“游颐和园者，无不知该园中的戏台，为彼时奢乐中竞尚笙歌之建筑物。其中戏台之一，绝伟大，楼上下分两层，皆可演剧，台下有巨井，可容多人抽水使上升，满台真水之奇观，不始于上海舞台中也。台上有层楼，鬼怪神仙之属，得从天而降。有陈太监者，善武旦，常与俞菊笙唱《青石山》《金山寺》诸曲。”由此可见颐和园演剧舞台的规模。

### 2. 承演剧目

德和园戏楼用于庆典和演出承应戏、宫廷大戏。光绪年间曾演出承应戏《天官赐福》《福寿双喜》《丹桂飘香》以及连台本戏《阐道除邪》《昭代箫韶》《铁旗阵》《雁门关》等。

### 光绪二十九年（1903）

五月初一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午初五分开戏，戌初一刻十分戏毕。

头本《阐道除邪》（前八出）本《落园》《迎亲》《洪洋洞》《双摇会》头本《阐道除邪》（后八出）本《莲花塘》。

初四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巳正十分开戏，酉正三刻戏毕。

二本《阐道除邪》（前八出）《过会》本《惊丑》《捉放》本《十面》二本《阐道除邪》（后八出）本《火云洞》。

初五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巳初三刻五分开戏，酉正二刻十分戏毕。

本《阐道除邪》（前九出）《琼林宴》本《丑配》本《论美》《天水关》《访贤》本《阐道除邪》（后七出）。

初六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巳初一刻五分开戏，戌初一刻戏毕。

本《阐道除邪》（前八出）《过会》《打樱桃》、本《阐道除邪》（后八出）《谢冠》本《陈塘关》。

十五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巳正二刻五分开戏，戌初一刻戏毕。

《五福五代》《泗洲城》《捉放》本《贾家楼》本《彩楼配》《阳平关》《翠屏山》《绒花记》（八出）本《水帘洞》。

十六日 卯正二刻进门。

颐乐殿承应 巳正开戏，戌正一刻十分戏毕。

《福寿双喜》本《回营打围》《淮安府》本《戏凤》《二进宫》《海潮珠》《夺秋魁》（四出）本《孝感天》《乌龙院》《陈塘关》《过会》。

# 发生在双清别墅里的故事

户力平

位于海淀区香山的双清别墅，被誉为党中央“进京赶考第一站”。1949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进驻香山。毛泽东就住在双清别墅。其实，这里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掌故。

## 双清别墅曾是清代“松坞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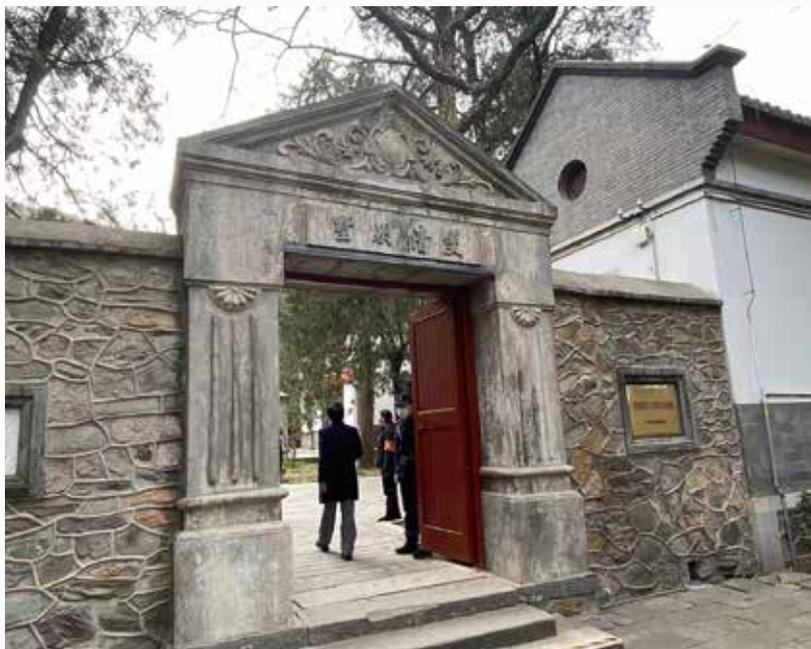
双清别墅位于香山静宜园东南部，相传为金章宗“梦感泉”旧址。清乾隆十年（1745）营建香山静宜园，在此修建一处景观，因池塘中栽种着莲花，近旁的石壁上攀爬着古藤，整座院落，笼罩在苍松翠柏之间，故乾隆皇帝将此院落命名为“松坞云庄”。其中的“栖云楼”列为“静宜园二十八景”之一。

“松坞云庄”处于香山南麓山腰位置，西面临近陡峭山峰，北三面有远山映带，环境极为清幽。整个院落由栖云楼、松坞云庄、凭襟致爽楼、山水清音戏台、天池、青霞堆亭、围廊、双清泉等景观组合而成。楼与主殿之间有步廊相接，布局极为严谨。附近又有两股山泉流过，分别流向山下的知乐濠和带水屏山，清雅宜人，为此乾隆帝御笔题写了“双清”二字刻于岩壁之上。于敏中

在《日下旧闻考》中对“松坞云庄”也有记载：“香山蟾蜍峰北稍东为松坞云庄，又东有楼为凭襟致爽，后为栖云楼。”

乾隆皇帝很喜欢这里的景致，驻蹕香山时，多寻游至此，并即兴赋诗。乾隆二十七年（1762）曾赋《松坞云庄》：“石磴步千级，岩斋得几楹。膝容聊憩止，目骋足逢迎。晴晦峰姿幻，青苍林态争。山泉犹未冻，阶下一泓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又写下：“坞藉松为护，庄称云作居。深间常带润，疏处亦含虚。游目恒看画，缮心合读书。却无读书暇，精舍隐嗤予。”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赋诗曰：“静宜景亦夥，先至必斯堂。松径为延坞，云峰不揜庄。檐端树张盖，阶下水溶塘。小憩凭何遽，芸窗展缥緜。”

乾隆皇帝更喜欢“松坞云庄”中的“栖云楼”，曾在此御制栖云楼诗三十八首。其中乾隆十一年（1746年）便赋诗三首。其《栖云楼》诗曰：“过去心难得，未来亦复然。以此例现在，毕竟谁火传。高楼号栖云，题句忆昔年。阶畔碎琼声，报我无留迁。”并在诗序中称道：“予初游香山，建此于永安寺西麓，当山之半。右倚层岩，



双清别墅（宁葆新摄）

左瞰远岫，亭榭略具。虽逼处西偏，未尽兹山之胜，而堂密荟蔚，致颇幽秀。”

乾隆六十年（1795），已84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再次来到栖云楼，并赋诗两首。其中一诗曰：“每到香山此首先，到同兴却此殊然。嫌他依例称有旧，笑我例依致不鲜。过雨林姿总如沐，迟春花事尚争妍。诗篇将满心筹远，简咏或如杜老禅。”

然而，百余年后，即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焚掠静宜园，“松坞云庄”也随之被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此处再次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主体建筑消失，仅存山石、台基和部分古树。

#### 民国时熊希龄始建双清别墅

1917年，顺直（今河北省）发生特大水灾，大批难民涌入北京。曾于1913年至1914年任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被北平各界推举出面主持赈灾工作。在北京特设慈幼局，收容灾童。次年水患平息，儿童多由家长领回，但仍有200余人无家可归，于是熊希龄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议，在香山静宜园旧址修建校舍，成立慈幼院。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学，熊希龄任院长。

熊希龄将自己的住所选定于乾隆时期的“松坞云庄”旧址，并动工兴建房屋，修整院落。因院内石壁上刻有乾隆题写

的“双清”二字，故将住所称为“双清别墅”。

据《香山园林史话》载：双清别墅坐北朝南，全园仅设一个院落，分两层台地，四周设有虎皮石砌筑的园墙，南、西两侧围墙兼作护坡，直接与岩壁连为一体。

大门位于别墅东侧，从笔直的磴道拾级而上，可来到门前的平台。大门采用石砌，造型简洁，顶部做成山花样式，额枋上阳刻“双清别墅”四字，为熊希龄亲笔题写。

别墅格局宽敞，北侧为正厅三间，左右带耳房，均以灰砖砌筑，外刷白粉，其造型在传统硬山坡顶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正厅的北侧凸出一个平台，在此可观赏远近山峰。别墅中央位置辟有一个水池，其轮廓北为曲尺形，南为弧形，左右对称，池中经常蓄养游鱼。池北有平台伸入水面，台上建有一座六角亭，柱子和吊挂均刷红色油漆，其造型在传统攒尖亭的基础上适当简化，取消翘角飞檐。正厅之西的北墙上建有一座石雕屏风，顶部为圆弧形，上雕龙头；中央辟为佛龛，外框为拱形，内部雕有小型坐佛。石屏两侧的石联为香山寺遗物，上面镌刻着乾隆帝御笔所题的楹联：“翠竹满

庭瞻法相，白云一坞识宗风”。石屏下有一个弧形轮廓的小水池，内设喷泉。喷泉之南存有一个石雕须弥座台基。别墅西侧设有藤架，缠绕藤蔓。南侧存有一座尺度很大的石台基，周围叠青石环绕，此即清代松坞云庄中的栖云楼遗址。台基之北和东西两侧均有叠石踏步可登，在此可俯瞰水池和六角亭，并与正厅隔岸相对。别墅西侧又有一层台地，置有别馆，为熊希龄的书屋兼休息室。由此沿山径可登西南方向的欢喜园，即熊希龄的寝室。西北处另设一座旁门，与北侧山路相通。

别墅依山而建，环境幽雅，景致优美，熊希龄甚是青睐，所以其晚年号“双清居士”，并赋诗曰：“暮云飞尽乱山明，月入双清分外清。”从1918年至1937年，熊希龄凡来慈幼院办公，均在双清别墅居住，前后达20年。

熊希龄在此居住时，曾有多位名人到此探访。1922年初，胡适到双清别墅与熊希龄谈史说故。1929年，冯玉祥将军到慈幼院看望孩子时，在此与熊希龄长谈。同年，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访华期间，也到此拜访熊希龄。1931年3月，时年27岁的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曾在



毛主席工作、居住的地方（宁葆新摄）

此疗养，她的朋友们，络绎不绝前去看望，其中有徐志摩、张奚若、罗隆基、沈从文、金岳霖、凌叔华、韩湘眉等。末代皇帝溥仪有一年来香山游玩，熊希龄曾在此特设宴款待。著名女作家冰心曾应熊希龄之邀，在此小住。

#### 1928年蒋介石探访双清别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京逝世后，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内。1928年7月3日，蒋介石来到北平，当天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到碧云寺拜谒孙中山。6日，参加在碧云寺举行的祭告典礼后，暂居八大处。“七月十日，游西山，观双清别墅。”他在日记中

写道：“双清风景，甲于西山，即南方亦所少有！观其池水之清，山林之古，上下相映，更觉美丽！夫林泉之可乐，盖有如此者也！”

蒋介石在熊希龄的陪同下，在别墅内游览了半个多小时，并特意观赏乾隆皇帝所题、镌刻于石壁上的“双清”二字。随后两人在八角凉亭下品茶、聊天，但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而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会秉三（熊希龄字秉三），议慈善与赈济之事”的记载。此前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对熊希龄所从事的慈善与赈济事业多有褒奖，所以在他到双清别墅探访熊希龄后不久，熊希龄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全国赈

济委员会委员。

蒋介石到双清别墅探访熊希龄，很大可能源于熊希龄对孙中山灵寝的保护：

1926年至1927年间，军阀混战。孙中山灵柩存放在碧云寺，国民党人对孙中山充满敬仰，而军阀则对其充满嫉恨。

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奉系军阀与直鲁联军连连败退。9月18日，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到北平开会，听信“国民党胜利是因为孙中山陵寝在碧云寺，得了风水”的谣言，为破坏国民党的风水以扭转败局，便怂恿上司张作霖捣毁孙中山灵寝。时任静宜园董事、香山慈幼院院长、治安维持会委员的熊希龄情急之下，面陈张宗昌：“各国政党、政见容有不同，而对党魁，则无不相互尊重，孙总理灵寝应当加以保护。且香山慈幼院近在一隅，孤贫儿童多为阵亡军人子弟，尤需令其安宁”，同时请求张宗昌“受有教育之军官团一连驻山保护”。在多方压力之下，张宗昌勉为应允，并派督战队队长康万胜率领军官团进驻碧云寺，保卫孙中山灵寝。熊希龄介绍守灵卫队长马湘与之接洽，共同保护孙中山灵柩。

此事于1928年载于报章。蒋介石得知后，深为熊希龄保护孙中山灵寝之义举而动容，所以借到碧云寺“祭告”之时，特意到双清别墅面谢熊希龄。

#### 香山工匠在双清别墅为毛主席制作木床

双清别墅毛泽东曾居住过的房间内，放着一张极为普通的木床。毛泽东从1949年3月25日入住双清别墅，到后来移居中南海，直到逝世，一直用着这张木床。而这张木床是当年香山的一位工匠特意毛泽东制作的。

1949年3月初的一天，时任香山乡长的邢宝

善和香山派出所所长的谷瑞山来到香山南辛村9号的佟永祥家。佟永祥从14岁开始，便在海淀镇小器作（制作并修理硬木家具）学习木匠手艺，在香山一带颇有名气。邢乡长告诉他，说乡里有个重要的工作想交给他来做。谷所长说，香山这一带所有的木匠，他们都了解了一下，就属你的手艺好、人缘好、可信。这活儿只能他一个人干，干活儿地点和所看见的、听到的不能告诉任何人。到了那儿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千万别说。回家也不能说与干活儿那儿的任何事情！

第二天，邢乡长和谷所长带着佟永祥来到香山静宜园内的双清别墅。接待他们的是一位操着浓重南方（湖南）口音的干部。谷所长向佟永祥介绍，说这位是毛科长，你的工作就由毛科长负责安排。

毛科长将佟永祥带到双清别墅西面的平房里，说暂时在这儿干活儿。然后又把他领到双清别墅北面的那排平房，让他将门窗修理好，将室内的家具检查一下，如有损坏，也一并修理。

当时双清别墅基本保留着熊希龄居住时的格局，家具也是熊希龄用过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部分损坏，而家具也有些破损。佟永祥先将门窗修理好，接着又将室内的所有家具一一修理。有一天毛科长告诉他，别的工作先放下，要赶做一个木结构床，要宽大结实，既要比平常的尺寸明显放大，又要实用、安全。

佟永祥有些纳闷，这屋里不是有现成的软床吗，怎么还要做个硬板木床呢？按照毛科长的要求，佟永祥先画了草图，接下来就下料、净面儿、划线、凿榫儿，每道工序都格外仔细，并由他一个人完成。

从3月23日开始，园子里搬进了不少领导，

而住在双清别墅的首长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当时佟永祥并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虽然听说过“毛主席”的名字，但从没有见过毛主席的照片。而这位大个子首长卧室里放着的正是他专门打制的那张大号木板床，而原来摆在那里的软床不见了。前来找这位大个子首长的人见了他都毕恭毕敬的，可见这位大个子首长很不一般。

佟永祥干活儿的地方在双清别墅外只有几十米远的平房内。他多次看见大个子首长在双清别墅水池旁的凉亭里看报纸、看书，有时也在这里与其他领导谈话。

4月底，佟永祥被调到中南海修缮队。几个月后，那位大个子首长也搬进了中南海，而佟永祥为他制作的那张大木板床也随着搬到中南海。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佟永祥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像时，极为惊讶，原来自己制作的那张大木床是给毛主席用的呀？！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毛泽东故居时，又将大木床从中南海运回了香山，放到了当年毛主席在双清别墅的卧室内。

### 双清别墅曾进行过重建

如今的双清别墅，并不是当年毛泽东住过的，而是重新修建的。

据《党史博览》（2006年第4期）所载《中南海里的工程师》记载：1949年8月，毛泽东搬进中南海。由于双清别墅本来就是旧院落，无人居住后损坏得比较快，尤其是漏得厉害。早些时候，管理部门隔一段时间就派人去香山对双清别墅进行维修，既费财力又费人力。到1956年，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说：干脆把双清别墅的房子拆掉吧，还省得老要维修。

拆除双清别墅是田恒贵带着人去的。田恒贵

是1951年春与在山东工学院学习的几名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工作的。多年后他回忆说：还记得当时双清别墅里的柿子树上还挂着柿子，水池子里还养着鱼。他们还捞了几条，用痰盂装着带回了中南海。

然而，房子刚拆完，随后就有人说：双清别墅是毛主席住过的，不能拆，要保留下来作为纪念。此议一出，领导又决定照原样恢复。但是房子已经拆了，建筑的样式、尺寸都没留。结果田恒贵凭自己的印象，画出了双清别墅原有建筑的图纸，根据这张图纸又重新建了一座双清别墅。好在是刚刚拆除，旧的材料还没有派别的用场，部分木料和砖瓦还可以利用。只是新建的双清别墅，比原来的规模小了一些。

另据《北京晚报》（2011年3月24日）所载《老照片“保住”双清别墅》介绍：香山作为曾经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总理非常关注。1973年3月，他在玉泉山工作期间，曾到香山公园散步。见到双清别墅的房间有的已经倒塌，就立即指示：这里的房屋要修复，并指名由当时任北京市工交城建组副组长的万里负责重建。为了恢复双清别墅原貌，有关方面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及图片，竟然没有一张反映双清别墅房屋轮廓的照片，有的只是反映局部的照片。因此，有关方面向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寻找相关资料。

不久，有关人员找到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赵鹤桐（1949年初调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向他寻找有关双清别墅的照片。赵鹤桐拿出珍藏多年以双清别墅为背景的老照片，来人喜出望外。1974年7月，双清别墅修复工程竣工。竣工前后，赵鹤桐还应邀到现场考察，为双清别墅复原提出宝贵意见，由此使修复后的双清别墅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貌。

# 海淀公安元年记事

## (六)

钱军熙

### 【接上期】

#### 八、改革健全户口管理制度

户口制度亦称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管理制度，与民生息息相关。西郊分局（郊五、郊六分局）在市局统一部署下，进行户口整顿和制度改革，建立新的户口制度，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人民公安的性质，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适应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解放前，户口管理实行二元化体制，户口由市警察局管理，市民政局户政科指导，管理比较混乱。接管后，批判的接受旧有制度，户口制度从内到外发生颠覆性变化。一年内，管理机构体制由二元

化改为一元化，民政局原设户口机构统一于公安局；建立特种户口管理制度；废除户口警管区制改为专任制；户口册由三部制改为一部制；废除旧的统计制度与表格，建立日报、旬报、月报、季报等新的统计制度；市民户口单变更为市民户口簿，实施《北京市市民声报户口规则》《北京市人民政府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而且，每次户政改革工作都于事先向群众广泛宣传，提高群众的认知程度和觉悟，促使警民关系更加密切。

#### 建立与管制特种户口

为巩固保卫人民政权，必须强力管制国民党党团特人员

及其他反动人员、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人员。为他们专门建立特种户口是一种适应社情民意的好办法，是反奸肃特的重要步骤。特种户口的主要部分就是反动势力的隐蔽力量，是公安机关必须管制和长期斗争的对象，是公安工作特别是肃特工作的重要环节。

自接管初期，郊五、郊六分局边调查边登记，进行建立特种户口工作。对已发现的国民党党特人员及其他危害社会秩序人员，按人建立特种户口实行严格管理。郊六分局在旧历年关时召开一次特种户口会，到会小偷土匪、刑事犯、暗娼等48人。在会上，公安军事代

表指出他们的前途和责任,责令他们不得做坏事,强调出了问题就找他们。正式接管后,按照市局要求,全面开展特种户口工作。郊五分局于3月即完成全区特种户口登记工作,共登记411人。至5月,郊六分局共登记特种户口1066人,其中流散军人655人、特务116人、国民党党员及三青团团员41人、盗窃抢劫犯60人、吸毒贩毒人员23人等。至西郊分局成立之际,共建立特种户口1532人,其中特务嫌疑者203人、国民党党团政人员145人、流散军人921人、盗窃66人、吸贩毒及赌徒80人、暗娼乐户卜卦会道门等117人。

对已列管的特种户口人员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管制特种户口的过程也是调查了解特种户口的过程,对于已经建立的特种户口严密掌握动态,表现坏的继续了解,充实材料;表现好的随时改正,不定期的恢复那些有立功表现者的公民权;对新发现的符合特种户口条件的及时登记填表审批,列入管制。

西郊分局发现在前一时期的特种户口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不解决,势必严重影响肃特工作。有的干部将特种户口工作简单地交给户籍警去做,户

籍警中大部分人是旧警,虽经教育改造,许多人身上仍残留着旧工作作风,有单纯任务思想,抱着敷衍态度,不实事求是,不调查研究,对特种户口的条件也了解得不够具体,只管发现填表。对批准后的特种户口,既不加以管理,也很少反映新问题、补充新材料。四平台村的特务李筱然,户籍警田志远却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一些党特人员为了隐蔽自己,让户籍警涂改职业或私自贴补,或在别处变换了身份再回来重新补报户口。这类事情如果检查一下旧有的户口簿,就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但个别分驻所负责干部不认真检查工作。分局审批时,只看材料不做调查,极易轻重倒置。分驻所在管理上也存在着不遵守秘密的问题,有的让公开汇报,有的让本人填表,有的将特户表册挂在墙上公开。治安科户籍股由于干部少,对特种户口很少研究,对分驻所指导不够,因而,分局一度规定建立特种户口须经三科科长批准。

自8月开始,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户口查对的成效,西郊分局决定细化特种户口管理,慎重提出规范建立与管制特种户口工作的具体要求。要求分驻所所长要掌握全部特种户

口,干部应亲自动手去领导警察工作,不要将这一工作全推到旧户籍警身上。强调建立与管制特种户口是肃特工作的重要环节,规定材料必须具体,不得夸大也不得缩小,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了解。搜集材料要实事求是,防止以公报私。所搜集的材料应有时间、地点、人物、事实及来源,对已搜集的材料必须及时分析研究整理,分类入档。符合特种户口条件的填表报分局审批。管制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公开严格的管理与秘密监视、或公开松与秘密严的监视方式相结合。特种户口不要只增不减,转变好了的,应当取消管制。要求特种户口工作与广泛地建立耳目相结合,同时注意培养积极分子,物色发展治安员。并要求管制特种户口与保卫秋收相结合,把护青队、组成员培养教育成今后管制特种户口的积极分子。分局户籍股也派员帮助重点地区分驻所做这项工作,并抽查分驻所工作。

各分驻所组织全体干部充分讨论想办法,集中意见再详细地布置给户籍警,强调肃特工作的重要性,说明什么是特种户口及其性质,教授如何建立及条件、管制的具体方法等,并要求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建立与管制

特种户口工作收效明显,质量明显提高。8月,各分驻所填报分局审批特种户口200余户,经审核批准72户;9月虽然只填报70户,但批准了68户。

9月,进入保卫政协会议和建国大典安全的决战阶段,西郊分局高度重视对特种户口的管制工作,把建立与管制特户提高到反奸肃特的主要地位,坚决反对麻痹思想。要求特种户口的材料必须具体,要经常不断地发现对象、掌握户口可疑分子,分清主次要,组织力量调查了解。分局召开党团特人员训诫大会,举办特务管训班,在群众中公开特务名单,号召被管制的特务揭发检举。这一系列举措收到良好效果。特务穆春明除坦白自己罪过外,检举揭发未登记的特务王增达、沈玉书。

西郊分局充分利用全市普遍更换新“市民户口簿”的时机,开展建立特种户口工作。11月27日,局长安建功发出“为发现坏人树立特户与户改工作相结合给各分(驻)所长的一封指示信”,信中说:“我们不要只忙于更换填写(市民户口簿)工作而放松了树立特户管制特户工作,相反的我们提出强调在这次户改工作中加强这一工作。各分(驻)所长接到此信后速召开

派出所长及较进步可靠的户籍警开会讨论,具体作一布置,发动群众自动的检举各种坏人,建立社会力量,秘密的去了解与控制坏人,以达到我们掌握户口应起的作用和目的。”

到年底,经严格按照特种户口条件及审批程序,西郊分局共建立特种户口205户,依照相关规定严格管制。

#### 废除户口警管区制实行专任制

解放前,旧警察局户口调查制度实行户口警管区制,在派出所实施户口段制,要求每个警士都要熟悉户口。这是国民党一贯采用的以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目的。旧警察局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控制严密。

接管后,经过一段工作实践,市局发现警管区制不仅在性质上是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一套方法,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达不到严密控制社会面的目的。因为派出所警察还有其他勤务,须承担巡逻、守望等多项工作,容易精力分散、互相推诿、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市局认为,人民公安机关调查管制的对象是少数特种户口,主要是政治性、特务性、治安性的,其次是社会性、

经济性的,须专人统一掌握,不宜分散,以达到专人负责结合广大群众控制少数人之目的。所以,市局决定废除户口警管区制,实行专任制。户籍内勤专管接受市民申报户口,办理异动统计、整理材料事项;户籍外勤专办特种户口调查及上级交办调查的事宜。要求人员尽可能固定。

郊五、郊六分局按照市局指示,四五月份,在派出所户口管理上废除警管区制,改为专任制。从留用旧警中选择政治上清白可靠、思想进步、工作认真、作风正派、有能力、熟悉本地情况的中青年担任户籍警。

#### 户口查对厘清人口底数

接管初期,旧郊五分局的户籍册几乎全部损毁。原有户籍登记残缺不全,特务、逃亡的地主、恶霸及其他坏人容易以改名换姓更改身份的方式隐藏潜伏。军管组挑选15名表现较好的旧警集中学习,再下去以各保保存的户籍册为依据,重新整理户口册,誊写呈交2份,交市局、分局各1份。正式接管时,旧郊六分局遵照军管会命令将带入城内的户籍簿带回,大多保存完好。因已两个月未办理户口变动手续,军管组组织旧警将这一时期的户口异动表册填造

补充。

这时,还来不及改革户口管理制度,也担心未弄清情况改乱了,不利于发现与管制特种户口人员,所以暂时维持旧的户口管理办法,仍由市民政局户政科负责户籍登记、市公安局治安处户籍科负责户口调查。各区公安分局和区政府民政部门各有1套户口管理制度和人员,老百姓需要到两方申报户口,经常往返数十里路程,感觉非常麻烦。而且各类户口表册须市民购买,贫穷者更感觉困难,西直门有一群众因买不起户口单哭了。

分局主管户口的部门是治安科户籍股。基层派出所没有配备干部,只有旧警。为防止特务及坏分子利用户口变动来隐藏潜伏,也不信任旧警,因而规定办理户口迁移须经工作组写介绍信,再到分局审核。结果,工作组忙、群众麻烦,有的七八天才能办好手续,引起群众不满。分局户籍人员也忙于办理手续,顾不上仔细审查。路条制度还未废除,一些商贩经常到分局开路条,甚感不便。

派出所户籍警都是旧警,不适应新形势新户口管理办法。针对这种现状,4月21日至25日,郊五分局举办户籍警训练班,15人参加培训。课程为:

户口手续须知、特种户口管理办法、户籍警的纪律、市局三处关于增设户口调查人员的通知、政治科目等5项,授课时长55小时。训练效果很好,参训户籍警懂得了工作方法,提高了工作信心。回去后,许多派出所按照工作要求将特种户口重新加以修正,普遍清对户口。经参训人员宣传,其他警察也纷纷要求到分局受训。

6月3日,市政府发布训令:市民政局户政科依归市公安局;各区、街的户政业务亦同时移交辖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6月8日,市局印发《北平市户口查对实施办法》,要求自6月20日至9月5日,在全市进行户口查对工作,目的是查清全市户口数目,发现、培养治安工作骨干,掌握各类特种户口。

郊五分局此项各种进展较快,提前开展工作,6月上旬即完成普查户口及另造新册的工作。6月中旬将各项统计核算完毕,按既定计划,应于下旬进行特种户口的初步了解工作。郊六分局正在进行户口查对准备工作,初步工作已大致完成。6月21日,西郊分局成立,因局内干部人事变动,同时,原3个区各区管理户口的情况也不相同,户口查对工作进展并不一致。分局

研究后认为,户口查对工作在合并前的三个分局虽然都曾经进行过,但由于对此项工作认识不足,力量组织不够,计划不周,检查不严,将这项工作完全交给旧警去执行,因此,没有做到市局所要求的那样彻底,户口中许多问题尚未发现出来。为此,在西郊地区还需要继续查对户口。分局决定将此次户口查对工作作为七月份的中心工作,延至7月20日完成。

西郊地区辽阔、警力有限,不可能普遍彻底清查。西郊分局决定选择户口迁入量大的西直门、海淀、蓝靛厂三个地区为重点,集中力量进行彻底清查;其他地区各分驻所可根据现有力量,选择较为复杂或认为必须彻底清查的地区进行户口查对。分局局长徐守身、副局长马少康、一科科长罗志诚、二科科长李旭明、三科科长孙克柔组成户口查对工作领导核心,抽调27人分成3个工作组,分别由3个科长带领赴三个重点地区,就地吸收劳大检查站、区工作组、街村干部及当地驻军参加,以公安局干部为骨干。鉴于参加单位比较多,工作组先进行动员、统一思想、了解工作方法要求、规定制度、要求所有参加人员应有始有终、不得中途退出或迟

到早退。户口查对实行先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再分散进行。预先选择复杂户口或可疑户口详细查对,一般户口不花费过多时间。查对前召开小型群众会进行宣传,打破顾虑,宣布奖惩办法;查对后亦召开小型群众会,逐户发榜,并对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矫正。户口查对工作中还附带着做一些社会调查,了解交通、卫生、消防、摊贩等情况。

西郊分局的户口查对工作自7月2日开始,至7月20日结束。厘清新合并成立的第十六区共有33870户、155316人,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等单位124户、13669人。新发现特嫌5件、枪嫌5件、国民党军军官19人、国民党党员23人、剿总服务队3人、清共先锋队10人、国民党军士兵44人、自卫队14人、盗窃抢劫嫌疑24人、娼妓10人、吸毒者22人。经过对这些人的材料整理、填表、审批,确定为特种户口的75人。其中保密局特务2人、党通局特务19人、国民党三青团骨干15人、其他反动党派1人、国民党党政军重要留守人员11人、有反动行为的教会人员3人、外地逃亡地主2人、盗窃2人、暗娼1人、私藏武器者2人。

通过全市户口查对,公安机

关核准从旧警察局接管的户籍簿册,基本查清全市人口底数,为全市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在此项工作中发现大量治安积极分子,部分分驻所、派出所开始尝试组织他们建立治安小组,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

#### 改革户口登记统计制度

户口登记制度方面,接管时延续旧警察局的三部制,即市局、分局及派出所都办理户口事宜,各有一部户口簿。实行结果造成市局、分局和派出所一样忙于事务,办理户口异动,没有时间研究指导派出所,失去领导作用。而且,程序繁琐,给市民增添许多麻烦。因而,市局三处酝酿户口登记制度改革。

4月,按照市局是指导机构、分局是推动机构、派出所是执行机构的理念,市局决定将三部制改为一部制,即只保留派出所户口簿,取消市局、分局的户口簿。同时,鉴于仍在实行户口管理机构二元化体制,市局与民政局商妥,过渡期间市民暂时可以不向街公所报户口。

6月,户口管理体制由二元化改为一元化,区民政局原设户口机构统一于公安分局。

进入7月,伴随户口查对工作,西郊分局将户口簿册由三部

制改为一部制。市民只向派出所申报1份户口存查,自己存1份户口单,群众感到很大便利。同时,户籍警工作也日渐熟悉,为八月份建立特种户口工作带来便利。分局户籍股从办理户口日常事务中解脱,转向专门负责设计指导,从统计数据中研究治安动态,掌握特种户口监督组织力量,面向基层派出所做典型调查,汲取经验以推动工作。

8月,为确保户口管理的准确性,市局在人口统计工作中,废除旧的统计制度与表格,建立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制度,实行派出所、分局、市局三级汇总的人口统计制度,以便掌握户口动态。西郊分局随之实行新制度,采用新统计报表。

#### 更换新户口簿

截至10月份,实行了多项户口管理制度与体制的内部改革,但是,对外整体新户口制度尚未公布实施。

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深化改革旧户口制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势在必行。11月6日,为精确了解本市户口,以作为市政建设的依据,并规定市民声报户口手续,市政府制订并颁布《北京市市民声报户口规则》《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

同时发布《关于更换市民户口簿实施办法》，告知全体市民更换全市市民户口簿为“北京市市民户口簿”。更换户口簿是北京市公安机关为了彻底粉碎旧户口制度，加强户口工作，强化社会面的控制，严密制度、克服混乱、堵塞漏洞、树立户口秩序的举措。市局决定于11月24日起，全市统一实施新户口制度，更换新户口簿。这是户口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原延续采用的旧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的各类表册繁多，涉及市民个人的有：警察（公安）局8种，有户口调查表、北平市迁移二联单、请领出殡登申请书、开张歇业申请书、雇工解工申请书、市民更换户主申请书、市民婚姻呈报书、市民分居并居申请书；民政局7种，有户籍登记申请书、户口簿登记簿、户籍登记附表、出生通知书、死亡通知书、迁徙证倒毙及死亡弃婴通知书。两局共有15种表册申请书，办理户口事宜的市民必须自己购买填写相关表册。这次户口改革，彻底废除旧民政局和警察局规定的各种手续、规则办法及表册申请书，将旧的15种户口簿册简化为3种，即“户口登记表”“市民户口簿”“户口迁移证”。其

中，“户口登记表”由派出所自备，登记后编入“户口登记簿”。凡关于户口申报事项，除初次立户自备市民户口簿登记外，之后改为市民持本户户口簿到派出所口头声报，由派出所问明事由给予登记，免去市民购买填写各项表册的麻烦并减轻经济负担。另有“机关团体公营工厂学校户口月报表”一式，由各单位自备，每月向派出所报告一次男女人数，纳入全市人口统计。

郊五分局结合本区实际，将市局布置的5个阶段任务中的准备、宣传两步工作合并为1个阶段。自11月14日至11月23日为更换户口簿的准备与宣传工作。分局召集区内全部户口纸代售店店主开会，告知他们户口簿印刷厂家（公益印刷厂）联系电话、批发及零售户口簿应遵守事项，并发给公安机关的委托证，要求各代售店于11月20日前做好准备。分驻所、派出所组织警察学习《北京市市民声报户口规则》《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等7个文件，学习填写新表册，研究熟悉业务，早做准备。分驻所拟定本所工作计划，召集辖区内各行政村、街、镇的主要干部和各派出所户籍人员及小学校教师代表，布置

户口整顿宣传工作和更换户口簿册工作，动员组织具体工作人员。全区进行户口整顿宣传，广而告之，除市里利用报刊电台公布外，分局利用墙报、宣传栏、标语、传单等广泛传播户口整顿消息，结合土改，利用大小群众会议及发动小学生，广泛地深入“点”“线”“面”宣传到户到每个人。

自11月24日，开始更换新户口簿册，同时废除旧手续旧表册，实施新户口制度。分局治安科具体领导分驻所、派出所进行更换户口簿工作。事先通知各住户到户口纸代售店购买户口簿1本，以派出所为单位分组分地区，户籍警与间长、公安员（治安员）组成小组，挨门挨户对正户口。当场把住户的户口单修正好，带回派出所用毛笔填写妥善，加盖派出所公章，发回市民收持。最后，将旧户口单收回整理，统一交分局户籍股保存。同时受理无户口市民声报登记。

11月24日至12月26日，各派出所按行政村、街、镇的街巷将新户口登记表整理装订成册，并附街巷地图及户主索引表。

12月26日之后，派出所联合村、街、镇干部，进行普遍检

查、重点抽查，查出的黑人黑户和违反《市民声报户口规则》的人，经上级批准，召开户主会给予批评。各分驻所作工作总结并报分局。

经一个多月紧张工作，核实完全区户口底数，发现各种工作线索 1631 件。

### 九、公安干部队伍建设

接管日至 1948 年 12 月底，市委、市局共派干部 22 人到郊五、郊六分局工作。1949 年 1 月，市局派来干部 4 人。至 2 月正式接管警察局时，两分局共有干部 27 人，其中郊五分局 13 人，郊六分局 14 人。3、4 月各调进 6 人；5 月调进 3 人；6 月调进 5 人，调出 2 人（其中包括郊六分局局长张锋）。至成立西郊分局，共有调派来的干部 45 人。虽然每月都有干部调进，但干部数量与现实需求相距甚远。

毛主席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接管初期由于干部太少，如郊五分局的 13 名干部，派到分驻所 8 人，留在局内 5 人。可是，旧郊五分局编制为 5 个分驻所 20 个派出所。两个分局除分驻所正副所长由接管干部担任外，派出所暂不设所长，由表现较好的留用旧警担任临时负责人，

分驻所直接指挥管理派出所警察。当时，许多派出所人走屋空，旧警大多跑了，派出所名存实亡。接管干部大小都担负着领导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身负繁重的工作任务，维持社会秩序、肃清特务、收容流散军人、收缴枪支弹药等，缺少具体办事的人手，又亟需重新组建派出所机构。分局军管组将干部分别派往各分驻所单独去筹建派出所，召回的旧警责令回原单位主要是派出所执行职务。每个分驻所干部都独当一面，分驻所、派出所的很多问题需要自己独立处理解决，必须努力学习以适应工作需求。这期间，大部分干部都很积极工作，锻炼了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能吃苦，没有发生原则错误，也无违法事情。开始时人地生疏，干部起早贪黑地深入群众，终于熟悉了情况，学会了业务。每到星期日，旧警可以休息或轮休，干部则不休息，许多干部带病上班，感动了旧人员，扩大了党的影响。各分驻所、派出所生活艰苦，每天两顿咸菜就饭；衣着供应不及时、数量不足，夏季服装在天气已冷时才发来，冬季棉大衣分配是干部 4 人合用 1 件；房屋老朽失修，多有渗漏坍塌；特费严重不足，书

报费也不足，只得以办公费垫支。头半年工作忙时许多干部未进过城看过戏，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香山都未去过。干部们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勇敢奋斗不畏困难的精神，而无腐化堕落现象，在群众和旧警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 实践中学会当领导

接管干部多为老解放区各地临时调来的，两局 27 人中曾做过公安保卫工作的只有 11 人。不熟悉业务、文化低、缺乏城市工作经验、缺乏党特常识是干部的普遍状况。而且，因工作紧急，大部分干部未经训练就分派到各分驻所工作。

一些干部认为城市人文化水平高，自己是土包子，文化低、吃不开，遂产生苦闷情绪，失去信心，不愿意做公安工作，想回农村去或调到工贸部门。有的干部原是从城里出来的，在农村久了，对城市也颇为生疏。各分驻所房子、用具、食粮均无，旧警与干部同室异心，旧警害怕干部，干部也不相信旧警。干部既要管理旧警又要收缴枪支、物资，登记党特分子，收容散兵，每天还要筹措管理伙食。

1 月初，大多数分驻所干部对于政权工作还缺乏经验和

知识，不会当领导，不善于推动组织使用力量，工作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在管理使用旧警方面虽然按照上级要求采取“赶毛驴”的办法，但不会赶或赶不好。一是完全命令式的，启发旧警的自觉性不够。“你干啥干啥”，不听取旧警的意见，又缺乏对情况的了解，具体工作执行起来困难，布置的多做的少；二是不会指挥支配旧警，特别是有些干部原做农村工作，出来参加工作时间又短、文化低、不会说又不会做，只会自己干，不会使用别人干，有了事情自己包办。一些旧警、保长看不起干部，如一个干部去派出所检查户口册，自己认字不多去问警察，还读错了；三是厌恶旧警，存在着不敢相信旧警的思想意识，不愿意接近，工作中不愿意组织或带着旧警一起干，常常把旧警放在一边，自己一个人忙；四是忙于事务，不会系统地安排工作，不能分清主次。许多干部成为“毛驴”的“毛驴”，一天到晚为警察的衣食住所困扰；五是不会根据实际的需要来改变原有警察局的一套办事的法规，警察仍按照旧习惯办事情，干部不知道命令他依据公安机关的需要来办。总的现象是干部忙而旧警闲，干部做而旧警看，忙闲严重不均，干部与旧警之间无形中

存在一条界线。干部对旧警总是认为他们不好改造，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在感情上、生活上也有格格不入的现象。

发现干部中存在此类情况后，分局领导认为，旧警在此多年，固然脱离群众的地方很多，但他们大多生于此地，在此工作时间长了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关系，如果改造过来，确实比我们这些外来人员还易于与当地人发生联系，而且，了解情况亦较我们为快。反之，我们如不继续很好的使用与团结他们，处处表示不信任，就会成为敌人拉拢的对象。分局领导及时教育引导干部，要管好一个分驻所，阶级警惕性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必须学会组织推动工作，大胆的使用与耐心的教育改造旧警人员也是开展工作的一大焦点。对旧警人员有必要采取惩办、开除、训斥的办法，但只用这种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采取团结改造、感情融洽与政治教育密切结合，并以适当的奖励，才是改造的正确方法。分局认为，评判干部工作的好坏，不仅看他本人干多少工作，还要看他是否学会做领导工作，带领本分驻所全体民警共同完成任务。

经领导教育，分驻所干部也认识到，光靠自己是完不成组织

交给的任务的，必须动脑筋带领旧警共同工作。对留用人员除经常地教育改造外，必须大胆使用他们，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各分驻所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经常检查旧警的工作。对旧警的使用由单纯的命令“赶驴”，转到有意识地教育改造，学会“拉驴”“喂驴”，团结他们共同工作。工作上给予旧警相当高的信任，除日常一般性业务外，对一般特务的监督也交给他们，还挑选表现好的参加检查站工作。旧警自录用后，情绪也逐渐稳定下来，能与干部一起工作。干部由最初的一人干，逐步转到团结与带领旧警一起干，并不断地想出办法、创造经验、获得很大成绩。在四、五月份评薪时，干部也参加评定，因为是供给制，所以不评定等级，主要是为了听取旧警对他们的批评意见。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锻炼后，干部初步熟悉了情况，摸索出经验，学会做领导工作，学会业务，逐步与群众建立了联系。学会组织力量并善于使用力量，信心提高了，工作上逐步地由被动转入主动，打下工作基础，西郊地区各类案件减少，发案大部分被破获。

(未完待续)

# 小学生活的片段记忆（下）

沈正华

## 【接上期】

### 兴趣小组

北大附小的课外活动小组很多,有些是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才能进入的,如:合唱队、田径队、乒乓球队等,有些则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这些活动都安排在下午放学后,偶尔也占用周末的时间,如:田径队及乒乓球队的训练及比赛等。别看是教学外的工作,老师们都特别认真,在没有一分钱额外报酬的情况下,他们比课上教学付出的精力更多。对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孩子,教授的内容必定超出常规教学,一对一的纠正和辅导更是不可缺少。2021年国家下令大规模取缔课外辅导班,尽管从上到下一直呼吁“素质教育”,但我知道,当年从来不喊口号的校园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我们的快乐童年即植根于此。



现在的北京大学附小（宁葆新提供）

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小组确切的名字已经记不清楚,“科技小组”还是什么?这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亲手制作矿石收音机,做出的收音机还能收听节目,且不止一个台。做矿石收音机所需零件不多:一个可变电容器,几个二极管和接线柱,一个耳机和几

米绕线圈用的漆包线,还有一块底板(因陋就简找块三合板就行)。老师讲解后,大家先学着绕线圈,准确把握铜线缠绕的总圈数及均匀度是关键,这不算太难,但也检验操作者的细心和耐心。往线路板上安装零件需按照线路图一步步操作,布局完毕要靠一个个焊点将零件固定。焊



新加入少先队的同学合影（作者供图）

枪、焊锡和松香学校都提供，大家可以共享。点焊有一定技术含量，手不能抖，焊锡的多少要把握好，太多太少都不行；焊接时最好一次将其焊牢，万一焊接质量有问题可将焊锡熔化重新再来；最重要的是按照图纸的说明做，电路一定不能接错。

做个矿石收音机成本不高，做成后大家也不会随身携带，但当年为何乐此不疲？一方面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同时也埋下探索未知的种子。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之后举一反三，攒出了三极管收音机，能收听到的频道更多。

#### 红领巾班

小学二年级，班里就开始建立少先队组织了。当时加入少先队要达到一定年龄，更重要的是

要看表现，德智体美劳五方面都在考察范围之内。遵守学校各项纪律被作为“德”的主要体现，所以班里几个比较淘气的男生总是入不了少先队。时间一晃来到六年级，争当红领巾班当时成为全班共同的奋斗目标，临毕业前这个目标总算实现了。

李兵和邓卓是班上比较淘气的男生，他们总会想些坏点子、搞恶作剧、吓唬女同学等。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淘气是聪明孩子剩余精力的一种释放渠道，也是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手段。当年小升初考语文、数学两门，在同学眼中不被看好的淘气包李兵和邓卓双双考入北大附中，可见关键时刻他们是拎得清的，潜能立刻能调动起来。恢复高考后，这两位凭籍自己的实力

都重新走进高校，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李兵还念了研究生。邓卓在英国工作多年，自由行跑遍了欧洲，对大英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如数家珍，义务讲解不输专业人士；李兵定居海南，和夫人自驾深度游，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李兵中学和我同班，一次在学校他抓到一只蜥蜴，和几个男生把蜥蜴开膛解剖，然后又给蜥蜴举行追悼会，挖坑后掩埋，这都是他的点子。

记得我是班里第一批入队的，倒不是因为表现多突出，而是年龄在班里偏大，比那些年龄小的先达标。其实只要没有特殊的“劣迹”，各方面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还过得去就能入队。入队宣誓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有仪式感的活动，辅导员汪老师带领全体新入队的同学在少先队旗下举起握拳的右手庄严宣誓；之后在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先队队歌》声中，由高年级的同学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然后双方互敬队礼。我们升班后，在低年级同学的入队仪式上也曾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那种神圣感及自豪感顷刻爆棚。

#### 三、多彩的生活——校外篇 打苍蝇

在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中，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惨遭

迫害。在中关园男女老少(主要是妇女儿童)白天黑夜震耳欲聋的各种噪音干扰下,无法降落喘息片刻的麻雀终于累得一头栽倒在地,成为人们的战利品。可没过多久,科学家为麻雀平反了,他们解剖死去的麻雀,发现胃里不光有粮食还有各种害虫,城市中树上的害虫是麻雀的主要食物。经过一番锣鼓喧天的大围剿,生物链被人为地破坏,一时间树上的害虫大面积泛滥,叶落枝枯、惨不忍睹,这才给麻雀平了发,将其从“四害”中移除,取而代之的是蟑螂。老鼠、苍蝇和蚊子对人类没有任何益处,还会引发各种传染病,它们的“四害”铁案无法翻。

在全面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小学生是主力军。为了更多地消灭苍蝇,我动了不少脑筋,四处寻找战场。我发现中关园合作社后院放置了不少酱缸、醋缸和咸菜缸,夏季的中午,成群的苍蝇围着这些大缸低空盘旋,不时会落在缸沿儿或缸盖儿上歇歇脚。午饭后,带上苍蝇拍我悄悄来到合作社后院,顾不得天上骄阳似火,空气中弥漫的酸臭气味,两眼紧盯着几口大缸,苍蝇只要一落脚,蝇拍立马落下,拍无虚发。为将打死的苍蝇作为除四害战果上缴,需要一

只只把它们装进火柴盒或玻璃瓶中。比起拍苍蝇,这活儿有点恶心,特别是肚子被拍烂的,往往会粘在缸沿儿或缸盖儿上,“收尸”难度更大。

除了合作社后院,不久之后我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家门口的砖头甬道。艳阳高照的时候,把外婆收拾带鱼丢掉的鱼头鱼尾和内脏放在一块废纸板上,苍蝇一会儿就嗡嗡地组团来访。严阵以待的我不停地挥舞蝇拍,鸣金收兵打扫战场时,“收尸”改为批处理,比随拍随捡效率更高。一个夏天过去了,学校评比爱国卫生小标兵,我榜上有名,还得了奖状,是用一张写大字报的粉红色纸打印的。为获得这份荣誉,我打坏了好几个蝇拍,也牺牲了不少业余时间,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本来是提倡讲卫生,可为了上缴战利品,将死苍蝇一只只往容器里装,尽管是用手捏住翅膀的,但操作明显与讲卫生背道而驰。现在想想,当年居然无一人质疑学校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

#### 一家人

放学后,老师会按照同学们回家行走的不同路线分成几队,每支队伍指定一个队长负责途中大家的安全,记得沟西、沟东、校内朗润园和承泽园各自成

队。或许是因为放学后的路队,我们5个同学(魏梅、黄净、王兰、罗曙、沈正华)组成了一个特殊5人小同盟,并且有了自己的口号“魏黄王罗沈,亲密一家人”,5人中2人住科学院23楼,2人住中关园沟西,1人住在三公寓。

在这个小家庭中,我得了个外号“娃子”,这个称谓一直从小学带到初中,它背后有个故事。罗曙的奶奶来自四川成都,不仅是大家闺秀,还是名人之妻,爷爷罗文谟(1902-1951)是四川著名的书画家和美术活动家。他才艺出众,作品功力深厚,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已蜚声书画界。他不仅同诸多大师有密切往来,还培养了众多有成就的弟子,对地方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解放初期不幸蒙冤。寡居的奶奶“文革”前曾来北京随长子一家生活过一段。奶奶识文断字、眉清目秀、穿戴得体,操一口地道的乡音。一次我去罗曙家,奶奶随口询问这个女娃儿叫什么名字。我听到娃儿的称呼挺亲切,知道是四川人对小孩子的通称。我们一家人虽然是五个女生,但在家庭中是有角色分工的,分别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我的角色就是那个孩子。此后不

久,奶奶口中的“娃子”成了我在这个特殊家庭中的称谓,继而迅速传遍全班。说来也怪,按年龄排序,黄净、魏梅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比我大一天,王兰的月份比我们稍大一点儿,五人中罗曙岁数最小(比我小了将近一岁,她当年先入保福寺小学,那里对入学年龄卡的不像北大附小严格,然后才转学过来),为啥我就成了家里的“娃子”,是因为个头矮小还是过于幼稚?时至今日也无人揭晓答案。小学毕业,我们五人分别去了四所中学,之后五人再没有团聚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同学聚会,听到有人喊我“娃子”,都感到无比亲切。这个绰号与儿时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承载着同学间的深情厚谊,称谓虽然没改,童真却再也回不去了!

### 学习小组

到了高年级,老师为同学们组织了学习小组,号召大家在课余时间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学习小组本着就近的原则组成,我和黄净是前后门的邻居,自然被编在一组,家住三公寓的刘志宁也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刘志宁很聪明,绘画方面极有天赋,黄净是班里的学霸,还是中队干部,是学习小组长的不二人选。小组

活动可安排在组员的家里,无论到谁家,家长都热情欢迎。我们一起做作业,完成后还习惯性地对一遍答案。

升中学时,我们学习小组的组员去了不同的学校。黄净去了十九中,这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可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啊!我如愿考上北大附中;刘志宁去了清华园中学。

初二时发生的一件事,震惊了附小的全班同学,刘志宁在三公寓的家中自缢身亡!这桩谜案至今无人破解。有传闻说头天晚上他和邻居小朋友去东操场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当晚情绪方面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从他脸上的刀痕和手中的刀子,人们猜测或许是出于好奇,他想亲自尝试濒死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刻还设计了自救的方式——用刀子割断绳索。可他哪里知道,人一旦发生窒息,大脑因缺氧已无法指挥手臂正常的操作。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给家人、给同学留下了永久的悲痛与遗憾。

### 课余生活

50年代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憧憬曾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我家的生活环境后半句已然达标,前半段对我们而言并无吸引力。中关园的平房

十分接地气,房前不大的院子里,各家各户都拥有一片“自留地”,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是难能可贵的,当下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住户栽树养花、种瓜点豆、喂鸡养兔……任由各家自行规划。那时到同学家串门比较普遍,虽然住房并不十分宽裕,但家长大多欢迎孩子们带小伙伴来玩。室内活动主要是看书、下棋,偶尔也有看“藏品”的。所谓藏品,从邮票、糖纸、火花到烟标都有人收集,“文革”后又增加了收藏纪念章。

那时集邮才真正体现了“集”字。在没有财务自主权的时代,家长买回的新邮票,都要经历寄信再回收的过程,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信必须是寄给家人或熟悉的朋友,而且对方也一定要信守承诺,那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有些煎熬的等待过程,这使我对每枚邮票的来历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收集渠道有限,于是有机会大家会互通有无,采取交换的方式补缺,年纪大些的会去找北大的留学生要信销票。文革前出过几套很漂亮的邮票,每套中都含高面值票。如: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1套8枚),纪116第二届全运会(1套11枚),特44菊花(1套

18枚),特61牡丹(1套15枚+1小型张)等。那时的邮资平信本市4分、国内8分;航空10分,挂号20分,超过20分面值的邮票很少能用到,获取更加困难,一些高值票到现在我都没有集齐。我也从集邮公司买过一些成套的外国邮票,都是盖过戳的,以苏联、匈牙利、朝鲜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为主。集邮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不仅知道了发行邮票的国家,也认识了邮票上的各界人物、各项运动、植物花卉、各种纪念日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我还曾一度迷上了收集糖纸。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一次妈妈去上海出差,买回一袋上海什锦奶糖,包装纸花色各异,让我一下增加了许多新的花色品种。收集的糖纸一律夹在一本较厚的书中,为的是压平整,也便于翻看。女生聚在一起常常互相展示自己的藏品,双方达成意愿也可互换。一度家长看我过于痴迷,提出要没收这些糖纸,无奈之下,我把它藏在了黄净家的小煤屋里,后来却不知所踪。

刘慧是班里唯一的独生子女,她的父亲刘麟瑞曾留学埃及,是国内阿拉伯语专业的著名

学者。除了在东语系教书,他在外交界也很活跃,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阿语翻译。小学毕业后,刘慧考进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文革”虽然中断了学业,但父亲助她继续学习,最终在外文出版社担任阿语翻译,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多部译著。退休后我接受沙特分馆的返聘,工作中接触到阿拉伯语,才深刻体会它为何与中文并称世界上最难的两种语言。阿拉伯语有28个辅音字母,每个字母有多个音调;词汇有阴阳性之分;字母书写时,印刷体和手写体差异挺大,同一个字母因在单词的首、中、尾位置不同,书写的形式也不同;此外,分写和连写的变化也挺复杂;语法中的时态和句子的语序等也有许多特殊规定。略知阿语的皮毛后,我更加敬佩一辈子献身此项事业的前辈。刘父去世后,刘慧花了几年时间编写《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sup>①</sup>,不仅细述父亲一生的教书育人和参与新中国外交活动的贡献,而且收录了其父同事及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父亲的学术论文和年谱。

因为是独生女,家中没有兄

弟姐妹一起戏耍的刘慧特别欢迎同学到自己家玩,我受邀去过几次。刘妈妈是家庭主妇,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次我去她家玩款拐,那是女生喜欢的一种游戏。四个动物的脚踝骨就可凑成一副拐,再用布缝个沙包就OK了。把沙包抛到空中的同时,手下要按游戏规则(扳动的先后顺序和拐的朝向)扳拐,最后和沙包一起将全部拐抓到手中。做拐最好的材料来自羊骨,大小合适、形制规整。那天我们正玩得起劲,刘慧被妈妈叫到一边,我听到了她们母女悄声对话。问:“玩的是什么骨头?”答:“羊拐”;又问“肯定吗?”答“错不了”。刘慧家是回民,刘伯母显然对此十分重视,生怕有违宗教信仰。

回民家庭特别讲卫生。记得刘慧家养了一只猫,个子很大毛很长。闲暇时烫着卷发的刘妈妈总爱把猫抱在身上,猫的毛梳理得干净整齐。我小时候经常淌鼻涕,玩得高兴顾不上擤,用衣袖随便抹一下,或是干脆就吸溜回去,因此一度还得了个不雅的绰号“鼻涕大将”。那天在刘慧家玩,又是故伎重演,刘妈妈在另一间屋子听见我吸溜鼻子,

<sup>①</sup>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说“这是谁啊？快去厕所把鼻涕擤掉！”自那之后我改了许多，手绢带在身边不再是应付“晨检”（每日例行的个人卫生检查）的摆设，关键时刻不忘掏出来用。

### 春游

小学时很少组织外出游览，在记忆中搜寻半天也找不出一两次。其中一次是到万安公墓给李大钊烈士扫墓，算是春游与接受革命教育相结合；另一次春游颐和园令我此生难忘，那是大邓老师担任班主任时。颐和园尽管去了很多次，和班里的同学一同游园却是头一遭。除了常规的游览，不知是谁的提议，老师居然恩准大家下午在昆明湖划小船。坐龙船从排云殿驶往龙王庙这没啥新鲜，听说能自己划船，同学们兴奋得直蹦高。老师先在同学中统计有多少人会划船，虽然和家长坐过几次小船，也练习过划桨，但自知技术不佳，我没敢举手。眼看举手的同学不少，按要求每条船至少配备两位划桨的同学很快就凑够了，在自愿结合、适当分配的情况下各自有了归属，大家分组登船。

老师公布了集合时间和地点，各个小组就分头出发了，刚离开码头时一度还展开了竞

赛。我们组的一位操桨手是苏和，另一位是谁已经记不得了。大家本想着到龙王庙附近就折返，谁知此刻湖面起风了，风越刮越大，估摸有四至五级。我们的船随即偏离了航向，一直往西堤那边漂去。最要命的是原来报名会划船的同学技术并不咋的，她新鲜劲儿一过，加之手上磨起了泡、胳膊也酸的不行，索性罢工了！只剩下苏和一人划，根本无法抵挡风力的作用。眼看着小船一路向西漂，快驶进岸边的芦苇丛了！这时大家都急了，有人脱下上衣试图当帆，想利用风力帮小船脱困，可压根不管用（一件衣服要能代替帆，帆船还卖给谁啊？）只听得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大风天气为保证游客的安全，请大家尽快交船上岸。闻听这道金牌令，危机感骤然笼罩每个人的心头。看到不远处有一对情侣的一艘船，大家决定集体呼救。在一片“救命”的呼叫声中，那艘小船向我们驶来，很快那位女士将船尾的绳子递到我们手中，而后他们合力向岸边划去，脱困有望了！眼看着拉上我们的船逆风而行，两位划得挺吃力，大家都过意不去，于是千恩万谢后放他们走了。我们船上的水手经过休整，元气略有恢复，两人开始继续划，无奈配

合总是失衡，免不了还是打转，但此刻谁也不敢抱怨，唯恐动摇军心。同舟共济的道理大家都懂，不会划船的人不断地给两位操桨手鼓劲儿，谢天谢地，船终于靠了岸。只见邓老师在岸边焦急地踱步，同学们都已平安抵达，我们是最后交船的。这次经历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不为过，估计今后邓老师再也不敢组织这样的活动了，这帮不靠谱的熊孩子真让人捏把汗啊！万一有人落水，后果不堪想象。

### 夏令营

五年级暑假期间（1963年），在我们即将升入毕业班之际，北大附小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夏令营，安营扎寨的地点选在了刚刚建成不久位于昌平区十三陵西山口的北大200号，参加人员似乎就是附小64级范围，从照片看营员约60人。200号是北大计算机专业的办学地点，教学楼、宿舍楼、实验楼、图书馆、体育场、食堂等设施一应俱全，清华大学也建立有类似的分校，与北大200号毗邻而居。据北大200号建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王希祐回忆：1959年12月，根据教育部和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制定上报了新的校园规划，根据事业发展的

需要，缺地 57 公顷，缺房 46 万平方米。市委讨论后认为海淀校区已无发展余地，建议另觅新址建分校。经教育部和市委上报周总理同意后，国家计委下达设计任务书，批准在昌平建设理科分校，建设规模 35 万平方米，总投资 5000 万元，三年建成。1961 年暑假，部分校舍和设施建成。由于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教育部指示暂停迁校。1963 年，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教育部同意分校启用，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力学系的部分专业迁往分校上课<sup>①</sup>。

夏令营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对于没有上过寄宿制学校的同学而言，能有一段时间离开父母、与同学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娱乐，该是何等令人兴奋啊！夏令营的活动安排得十分丰富，记得老师带我们参观了生产单晶硅的车间，看到拉单晶硅的机器在那里不停地旋转，也看到了展柜中北大自己生产的硅片。通过 200 号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硅片是半导体器件中最基础的材料，各种集成电路都是在硅片上存储的；那时北大自行研制的红旗牌计算机体积足有半间屋大小，我们也怀着崇敬的心情亲眼目睹；军事训练是到西边的虎头山找敌人留下的情报（压在石头下的纸条）；自由活动时可去草地逮蝈蝈、捉蚂蚱，还可去路边山坡上摘酸枣，无论哪项活动都充满了无穷的乐趣。

王建同学在看了我写的回忆后，补充了自己对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回忆，特引用如下：住在 200 号，虽说周边全是农村，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充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逮蝈蝈、捉蚂蚱、摘酸枣，有趣的活动可多了。逮蝈蝈要循着它的叫声去找，蝈



2019 年 4 月 14 日，六三班同学在北京大学沙特国王分馆聚会（作者供图）

蝈特别机灵，稍有一点动静就不叫唤了，哪怕你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靠近也不行。即使偶然逮住，一不小心它掉到地上就溜之大吉。蝈蝈分公母，母的尾巴上有个大扎枪，不会叫，又称“驹驹子”。夏令营结束时还举办了联欢会，同学们上台表演节目，具体的节目内容已经完全记不得了。

#### 结语

时隔六十多年，很多记忆都已淡忘，有些记忆难免有误。当我把这些片段付诸文字时，心中仍充满幸福与甜蜜。庆幸我们曾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同学结下深厚的友谊。我由衷地感谢北大附小，感恩一路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也感谢亲如手足的同学们。

毕业后同学们升入不同的中学，“文革”后受到上山下乡洪流的裹挟，又各奔东西；十年动乱结束后已是人到中年，除了恶补知识的空白，还要挑起生活的重担；直到步入老年，才想起小学同窗的聚会，那时相互间的距离已不仅是京城内外，早已扩展到国内外了。

<sup>①</sup> 王希祐《燕园耕耘七十载，无愧为国献终身》《我和我的祖国北大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忆文集》30页。

# 回忆 60 年前的海淀银行

张秀慈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朝如青丝，暮成雪。岁月情深，总会留下很多难忘的记忆。最近见到几个过去在银行时一起工作的老朋友，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年轻时共同经历过的青春岁月。

## 一、神秘的银行，陌生的岗位

银行和别的商业部门不同，它经营的商品主要是货币。60年前，我们刚参加工作时，银行的管理体制主要实行的是苏联银行的管理体制。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人民银行曾是国家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部门，代表国家管理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实行统收统支。是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总会计、总出纳。

在海淀区，人们常说的海淀银行正式名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区办事处。业务和人事关系归北京市分行管理，党的关系隶属海淀区委。当时，凡是在海淀区地域范围内各行各业、各部门的经济往来，都要在海淀办事处的银行网点开户，所以大家都习惯地把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海淀区办事处简称海淀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海淀区办事处的地址在海淀镇

南大街 34 号，下设 5 个分理处和一个营业所。分别是翠微路分理处、永定路分理处、清河分理处、东升分理处、海淀镇分理处，西北旺营业所主要负责农村业务。海淀办事处机关所设业务科室有会计科、出纳科、储蓄科、事后监督科，信贷和现金管理科、农金科、农财科、人事保卫科、办公室，另有工会、共青团等。全区银行网点共有干部和职工 420 多人。

60 年代中叶，我们这些年龄不足 20 岁的年轻人刚一进银行，就听很多老同志介绍：那时北京地区的各银行领导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在解放区边区银行工作过的进城干部。

1948 年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后，共产党接管了国民党时期的银行官僚资本，在共产党边区银行各分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北京市分行，第一任行长是贾星武。他曾是一位能使双枪的老八路，解放军进北平时是接管北平伪银行的军管会主任。人民银行成立后，任北京市人民银行行长，后来曾任海淀区副区长，主管经济工作，时间不长，又回到

北京市的领导岗位。

我刚参加工作时印象最深的是，银行里有“三铁”即铁柜、铁门窗、铁算盘。当时银行一进门就会看到很多装现金、放账用的大铁保险柜，都有一人多高。几乎全都是解放前的旧银行从美国和英国进口的老物件，所有银行营业网点的门窗全是铁打的。铁算盘指的是银行的各种数据都不能出任何差错。走进海淀银行大营业厅，就会看到在那长长的柜台里面，坐着百十号人，一人一个办公桌、一套账本、一把算盘，银行记账专用的绿色台灯，大白天也总是开着。大厅里没有人说话，听到的只是一片噼噼啪啪的算盘响声和刷刷的点票声。这里就是海淀区各行各业经济往来的数据中心。全区的经济数据每天都要通过银行各个网点的业务集中到这里，进行日清日结。当天的业务必须做到钱、账两清，不能出任何差错。

银行工作专业性很强。我们刚进银行，每人就发有一个算盘、一把国民党时期银行的旧伪钞，用来练习点票。在银行里点票要求稳、准、快，一分钟内要点完100张票子才算达标。那时银行记账，没有计算机各种数据计算主要靠打算盘。以100张票据为基础，掐表计时，达标上岗。银行业务每天不管工作多忙，干到多晚，也要帐平表对，大家才能下班回家。

为了提高银行的业务水平，办事处机关经常举办全行业务技术大比武，人事部门根据每个人的业务水平，安排不同的工作岗位。在银行里人们常说：“点票的不如画圈的，画圈的不如冒烟的，冒烟的不如遛弯的”。后来才知道，这里主要指的是银行内部出纳、会计、业务外勤和管理部门的岗位分工。

银行人员里高手云集，每个柜组几乎都有身怀绝技的专业人才，负责业务复核把关，专门

处理解决一般工作人员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会计科就有一位奇人，别看个子不高，说话轻声慢语，上班还经常打瞌睡，但却有一手绝活——记账从来没错过。不仅如此，每天晚上结账后，要是总账出现差错、报表不平、所有人都不能回家时，就需要有绝活的高手上了。否则会计科里几十人要把一天的业务凭证重新核实一遍、找出问题、把数据改过来，干到半夜十二点也干不完。面对如此大的工作量，大家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每到这时候，便是高手大显神通的时刻，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拿起结账时的资金平衡表，认真地看一会儿，再翻翻全天的业务凭证，不一会儿，准能找出两张记错的凭证。只见他不声不响，悄悄地走到记错账的那个会计身旁，若无其事地说：你大小数记错了，改过来就行了……于是大家皆大欢喜、高高兴兴拎包下班回家。

## 二、小小储蓄所，社会大舞台

我刚到海淀银行时，在办事处机关信贷现金管理科工作。后来为了让我多熟悉一些银行业务，领导调我到最基层的翠微路分理处的储蓄所工作。翠微路分理处地处海淀区的最南边，服务对象主要是各部队机关大院。安排一个比我还小的朱姓女同志和我一起在一个储蓄所工作。她管现金、我记帐，我们先后在全军总后勤部机关、后勤学院、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的机关大院的储蓄所工作过。

每天早晨上班，我和小朱骑自行车从分理处出发，先“取库”，就是先从分理处的大金库里取出储蓄所的账页和库存现金，然后我俩一个人自行车后架上边驮着储蓄所的账，另一个人自行车把上挂着上锁的库存现金包；一前一后出门上马路，大约骑自行车15分钟左右到达目的地。根据银行规定，为了资金的安全、防止路上有人

抢劫，我们俩必须保持一定距离，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在路上不能讲话，要装作不认识。小朱在前面拿着库存现金包，我的自行车后面不仅驮着储蓄所的全部账目，还要负责掩护前面拿现金的同志，遇到突发情况，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确保国家财产的安全。

那时部队大院里的储蓄所，办公地点和铁门铁窗等安全设施，都是由部队提供的。别看机关大院大，干部战士家属人很多，业务量却不大，一个大院储户也就千八百户，全部总账、底账、存折和存单，只用一个小木箱，就全装下了，每月月初和月底发工资前后，最多也就是100多笔业务。常来办理业务的储户，年轻的干部、战士很少，大多是中年以上和年龄偏大些的储户，经常来的储户大多是半熟脸，时间一长也都有印象了。当时部队的工资待遇较低，战士一个月津贴只有6元，一天的伙食费只有0.45元；年轻的干部每月工资53元，干部灶一天的伙食标准是0.73元；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工资要高一些，但是也有很多年都没调了。那时市场商品极度匮乏，商场里很多副食品还要凭票供应。大院里生活的干部和家属大多都不宽裕，每到周末，为了改善生活，部队的副食品基地就把自己生产的東西低价送到机关大院来卖。我至今还记得，海军每次送来自己捕捞的海鱼、大虾和螃蟹只要0.15元一斤，我们每次只要花一到两元钱，就足够一大家子人美餐一顿。每个星期六下午，大家就像过节似的，家属们早早地就来到大操场，等待着满载货物的大卡车到来……

那个年代由于工资低，大多数人的存款都不多，就是有一点结余，也都是绝对保密的，很多人甚至连老婆也不告诉，都是亲自到储蓄所办理，只有职务高的老干部，才由夫人掌管。每天来银

行办理支取的储户，都是小心翼翼的，现金和存折包裹的严严实实，生怕路上不小心丢了。

其实在储户中，大多数人存款余额也就是300至500之间，500元以上的就属于有钱人了。大多数的储户，都存的是随时可以存取的活期存款，存款在100元以上，时间是半年定期存款的都不多。那时在我管的小储蓄所总账登记簿上，存款余额中，竟然有60-70%的储户都是500元以下的存款，500元至1000元也就占20%左右，1000元以上的不到10%。家里有1000元以上存款的一个大院也没几家。我工作过的那几个储蓄所，见过的最多存款是一张8000元的存单，但就只有一户。记得在总后储蓄所有个叫胡敏的储户，她的名字在定期存款的存单登记簿上常见，也大多是300至500元一张，加起来也到不了8000元。

不久9·13事件发生了，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凡是中央文件点名的人的存款都要清查、写报告冻结。

传达的中央文件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曾在储蓄所的储户登记簿上见过。储蓄所的账页上还详细的记有他们每次来储蓄所办每一笔业务的时间、地点和金额。原来那个叫胡敏的储户，就是大名鼎鼎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夫人。

在空军大院储蓄所的登记簿上，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死党——大小联合舰队的骨干，几乎都有账户。在查账时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在9·13事件前的一个多月，就把存款陆续取走了，钱也不多，最多的也只有1000多元。后来领导指示我们，要把这些情况查清上报。

### 三、送款路上，午夜惊魂

海淀银行在全区各地遍布着几十个网点（包括各个储蓄所），这些网点每天的业务往来都要

收支大量现金，根据银行现金管理制度，每天收到的大量现金，都要集中到海淀区银行办事处地下金库进行统一保管。因此，每天来往送款的任务就成为银行工作中一项责任重大又很繁重的任务。

记得我们刚到银行工作时，海淀银行保卫科还专门配备有穿制服、配带手枪的经济警察。每次送款，经济警察都负责现金武装押运。那时全区银行送款，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当年边区银行在战场上缴获的美国旧吉普车。由于年代久远和繁重的送款任务，这辆旧吉普车早已不堪重负，在送款的路上经常“趴窝”，不久就彻底报废。带枪的经济警察、专职武装押运员编制也被撤销。全区几十个网点送款怎么办？那时海淀区银行办事处还没有审批权，要等北京市分行批。要买新车既没指标又没钱。在那青黄不接的时候，银行送款没办法，较近的网点，现金量少时就只能靠那辆平时倒垃圾用的平板三轮车；如果现金量大、路又远，就只能用那辆送信用的二手两轮旧摩托车，把需要送的现金装在麻袋里，再把装满几大麻袋的现金用麻绳绑在摩托车上，运到目的地。

大约是70年代初一个冬天的晚上，那天我值班，海淀办事处的营业大厅早就下班了，管地下金库的管库员却焦急的到大门口看了好几次，也不见送款摩托车的踪影。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才见到保卫科长气喘吁吁的拖着两大麻袋现金回到海淀办事处。见到管库员，他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今天现金太多，下班又晚，翠微路那边修路，一路上天很黑，路又高低不平，半路上有两次摩托车打不着火，可把我给急坏了。边说边把摩托车开到地库门口，往下卸麻袋，卸下一麻袋现金后，再一看另一个麻袋，忽然大惊失色，只见

那个装满现金的大麻袋底下磨了一个大窟窿，里面装的现金也少了半截。此刻在一旁的人全都惊呆了，保卫科长顿时脸色刷白，一屁股差点儿坐到地上，一言不发。只见他定了会儿神，急忙转身就往办公室跑，到保险柜去拿手枪。然后带着手枪，开起摩托车就消失在夜色中。不知过了多久，大约已是午夜，保卫科长终于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向地库走去。奇迹终于发生了，丢失的巨款，居然失而复得。那些少的钱，又找回来了。那天晚上清点完找回的现金、兑完账居然一分不差。保卫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讲出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保卫科长带着手电筒和手枪，开着摩托车大灯，抱着一线希望，小心翼翼地按原路往回找。走到八一学校南边的院墙外，这里有一个土坡，坡下有一条小水沟，远远的就看到站着一群人。走近一看，这些人不约而同的围成一圈，所有的人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土坎下的小水沟，仔细看，在水沟旁边还有一堆模模糊糊的东西。借着远处微弱的灯光才看清，好像是一堆打着捆的现金，少说也有十多万元。保卫科长急忙拿手电筒一照，喜出望外，果然是现金，连忙掏出工作证大声说：“我是海淀银行保卫科的，这是银行的现金，上面盖有海淀银行的代码，和出纳员的人名章。”站在旁边的人们不约而同的都松了一口气，七嘴八舌的说，我们准备再等一会儿，要是再没有失主来找就准备报案，大家一起把现金送到派出所去。保卫科长讲明情况后，大家又一起帮助在四周寻找了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散落在附近没有被发现的现金，果不其然，又在不远处找到两包硬币。

我听完保卫科长的叙述，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场景：漆黑的深夜，在八一学校高高的南墙

外，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不约而同地默默地站成一圈，自动守护着一堆巨款。一股暖暖的敬意从心底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那时大家都很穷，谁家都缺钱，大多数人的月工资也就是三四十元。在荒郊野外，面对这一大堆无主的现金，围观的人群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拿。

由于银行有严格的保密规定，此事不能对外宣传。但是这件事在银行内部还是被很多人知道了。久而久之，在银行系统内部几乎无人不晓，还传出几个不同版本，成为银行人口中的一段佳话。

如今 50 多年过去，我和银行的一些老朋友聚会时，还时常提起这件事。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情操已深深的铭刻在我们心中，今生都不会忘记。

#### 四、年终决算，后八家“历险”

年终决算，是一年中银行工作最忙的时候。特别是 12 月 31 日这一天，银行各个营业大厅早晨还和往常一样照常开门，晚上关门以后才开始加班进行年终决算。要把所有在海淀银行开户的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账户余额、全部总收入、总支出、年终余额算出来。不管干到几点，年终账面余额都要结平、做出资金平衡表，并且把各项数据按照银行科目进行汇总。当天晚上，按银行系统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人民银行总行，同时把旧账页撤下来进行封存归档，把所有单位的账户换上新账页，为元旦过后新开始的一年建好新账。

每年的 12 月 31 日晚上，各分理处的营业大厅都灯火通明，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此起彼伏，人员来来往往。银行的各级领导都下到一线观战，职工食堂准备有夜宵，像过节一样。这天晚上，

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争取在午夜 12 点以前把账全部结完、账平表对，这一年的工作才算正式胜利结束。

过完元旦不久就要准备过春节了。全区所有独立核算的全民、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生产队也要开始年终决算，春节前农村该给农民分红了，企业也要发年终奖，银行要准备好大量现金投放市场。每年一进腊月，银行营业大厅门前天天是车水马龙，还没到开门时间门口就早早排起了长队、挤满了等待取款的车辆。

当时市场商品供应不足，很多商品短缺，为了防止大量现金冲击市场，银行在大量现金投放市场的同时，要积极组织货币回笼，银行领导要从各部门抽出人员、组织力量、下基层信用社到各个生产队动员农民储蓄。

只要哪个生产队分红，银行工作人员就要提前来到当天分红的生产队，先帮助单位会计把从银行取回来的现金按决算的账，每家一个口袋按户分好。当天下午就可以把钱分到社员手里了。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这项工作。海淀区山前的四季青、玉渊潭、东升、海淀等公社的很多比较富的生产大队我几乎都去过。

每年分红的那天，一边是社员领现金另一边是我们银行工作人员就地办储蓄，再把投放市场的现金收回银行。这样可以加快资金周转。

有一年，我到清河公社“后八家大队”，上午我帮会计分完现金，下午社员们就陆续来到大队部领现金了。先来的社员都满面笑容，大多是分钱比较多的人家，一般是家里有三个劳动力以上的户，分到手的现金都有厚厚的一个纸口袋，大约有三四千元。一个生产队没有多少户，大部分的社员家干一年也就分到一千元左右。平均一个月不到一百元。

后八家这个生产队户数比较多，整整一个下午大队部里都挤满前来领现金的社员。到天黑了也还有十几户没来人。我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结了一下账，就不准备再等了。那天的收获还真不小，足有七八千元，我就跟会计和大队领导打了个招呼，回信用社取款去了。

我带着白天收的现金，顺着高低不平的乡间小路出了后八家村，这时才发现，农村的夜晚跟城市真不一样，没有路灯到处一片漆黑。我定了一下神，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四周，几乎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朝着回信用社的方向摸黑前行。前方是空旷的野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上并没有路，只有路过的人为了抄近道在土地上踩出来的一条小土路。脚下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我咬紧牙关，吃力地蹬着我那辆破旧的 28 自行车，恨不得跨过漆黑的夜空飞回信用社。心里越着急，自行车越蹬不快。腊月的冬夜天气很冷，我身上一阵阵瑟瑟发抖，拼命往前骑。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远处有灯光了，借着远处昏暗的灯光，我使劲地睁大眼睛观察着前进的方向，再往前行过了这片收割完的庄稼地，小路的右边是一片拉上了铁丝网的空地，里面是用推土机刚推出来的一大堆建筑垃圾，小路的左边是一条长满荒草的排水沟，沟旁是一块栽着松柏树的坟地，顿时让我毛骨悚然，一阵阵后背发凉。

空旷的原野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那辆破自行车在石子路上发出的叮嘞啞当的响声。我的心咚咚地跳，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我不停地安慰自己，这是光明前的黑暗，再往前行不远，就能看到有路灯的马路了。我鼓起勇气，拼命地蹬着自行车，真想赶快骑到马路边。

这时我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小路上有黑影在晃动，再往前行又看见在我要经过的路上横了

一辆自行车，旁边蹲着一个在抽烟的人。我迅速地看了一下前方的地形，路的左边是排水沟、右边是工地铁丝网，把我要往前走的路挡得严严实实。见无路可走，我心里骤然一惊，长期的职业习惯告诉我，这回可真碰上“事儿”了！怎么办？事到临头，我也顾不得害怕了，横下一条心，拼了！瞬间我想到，狭路相逢勇者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要争取主动，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国家财产，这是银行工作人员起码的职业道德。说时迟那时快，连忙拉紧斜挎在肩上沉沉的现金包，使出全身的力量，猛蹬几下破自行车，咬牙朝那人猛撞过去。只见那人往旁边一闪，一下掉进排水沟里，我不敢回头，大脑一片空白，只顾拼命蹬自行车……终于骑到马路边，才敢回头看一眼，没见那人追来，我长长松了一口气，终于躲过了这一“劫”。看到前面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我才感到自己安全了。这时想起刚才的险情，我浑身颤抖，不停地哆嗦，再也没劲骑车了……我慢慢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了信用社、交完款、如释重负，迷迷糊糊回到家……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还像一场噩梦一样，好在有惊无险。

## 五、扑朔迷离的贪污案

由于银行业务中的各项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特别是资金管理，实行的是账、款分离，收支两条线，各职能部门每日都要账平表对，账款两清，否则就都不能下班。在 1970 年以前，海淀银行曾经很多年也没有发生过经济案件。

但是，听老同志说，尽管制度再严也还是出过案子。那还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一个女出纳员，不仅人长得很漂亮，在业务上也技高一筹，在银行柜台办业务手下很利索，在柜台收款时点票又快又准，竟然能像魔术师表演一样在神不知

鬼不觉的时候把一张张残币单挑出来放到任意一个地方。你就是坐在她的对面瞪大眼睛盯着看也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银行很多人都看过她的表演，领导和同事们都很羡慕她，是大家公认的业务能手。

时间长了，日复一日，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不知过了多久，听说保卫科接到不止一个商业企业反映，到银行交款时会计和出纳两个人一起点过的钱总是少一张。这件事引起保卫部门的注意。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发现了那个出纳员的秘密，在收款时被抓了现行。据查实和本人交待，在柜台收款中，一共贪污企业交款 300 多元，根据当时的法规，开除公职交司法部门处理，判刑三年。

70 年代初，根据上级指示，银行及经济领域，开展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有一天晚上，全行各分理处所有工作人员在下班以后都集中到海淀银行办事处开大会，进行全员动员，督促有经济问题的人员主动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争取宽大处理。办事处事后监督科，有一个老会计，家就住在海淀太平庄银行宿舍。那天晚上，开完动员会，由于做贼心虚，回到家里就精神恍惚。晚上十点多他家属来电话找银行领导，要求赶快派人来，说他要摸电门自杀。正巧晚上我值班，我急忙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天晚上，我跟随领导来到太平庄银行宿舍，见到他本人。只见他没有了往日的风采，目光呆滞、六神无主、精神萎靡不振，嘴里不停地念叨：我有问题……我要交代……我问题严重。我们先稳定住他的情绪，交待了党的政策，让他把自己的问题先写下来、等待处理。

第二天，银行领导就抽出专人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根据本人交代的问题及其线索进行内查外调。消息很快传遍全行，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

解，认为他既不在银行一线柜台上上班，也不直接管钱、管账，哪有贪污的机会呢？经过几个月调查取证，终于发现这个人的作案手段，是建国以来银行系统犯罪行为中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他如果自己不主动交代，还真难被发现。

原来他是发现了银行在账务监督管理上的漏洞，利用工作之便钻了政策空子进行的贪污。专案组在调查取证中发现，他在作案时还把得到不义之财的意外惊喜当成贪污作案成功的案例。他竟然把得到的每一笔赃款、转账作案的日期、金额都在日历上做了特殊记号，并且把日历撕下留存，以备待查。真不愧是高级会计师中的作案高手。

很多认识他的老同志都知道，在解放前他就是国民党时期银行会计科的负责人，非常精通银行业务，早就是银行账务处理的高手。那时的银行，只要熟悉业务，稍微动动脑筋就有很多生财门道，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吃穿不愁。何况像他这样的会计部门的高级职员。解放前能进国民党时期的银行工作，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关系再硬，也还要有最少两家企业作经济担保。

我记得刚参加工作时，这个老会计就快退休了，那时他在储蓄事后监督科，我在隔壁计划信贷科，每日上下班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感到他和一般的银行工作人员不同，从气质和派头上看，就是解放前有钱人，穿戴很讲究，一年四季穿着面料高档、做工精致的服装，从上到下一尘不染，平日他总是少言寡语，脸上从没有任何表情，从没见过他和谁说过话，总让人感到，奢华的服装中隐藏着神秘的灵魂，饱经世故的头脑里不知道装着多少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两个老婆，平日上班，在海淀银行宿舍大老婆家住，周六和节假

日就回城里宽街小老婆家里。大老婆生了5个孩子，小老婆很多银行同事都见过，在某高校工作，不仅长得身材苗条、个子很高，年轻漂亮，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挺大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这起贪污案经过专案组的内查外调和他本人交待，基本与事实相符。从60年代起，到案发时，他一共利用银行转账政策漏洞贪污40000多元人民币，那时银行工作人员每月最高工资也不足100元，社会上够得上万元户的也不多，这个老会计贪污的40000元赃款，主要用于带着他的

小老婆和儿子吃遍京城各大饭店和饭庄。在调查取证时，每到一处，饭店的名厨和服务员都认识他们，都说他们一家是这里的常客，纷纷出具证明提供证据。

海淀银行查出的这起贪污案，根据当时的政策法规，在全国银行系统和海淀区都属于大案要案，经过法律程序调查，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由于是主动交代，态度老实，得到从宽处理，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这个大贪污犯，最终在服刑期间死在监狱里。

---

## “不只”和“不止”有什么不同？

 本刊编辑部

### 【不只】bùzhǐ

是连词，用于递进关系的复句中，相当“不但”“不仅”，表示除所说的外，还有进一步的情况，表述的是语意上的递进。在其后的分句里，要有与之呼应的“而且”“并且”等词语。

例如：

(1) 他们现在不只不愁吃穿，而且还比较富裕。

(2) 这些措施不只发展了经济，并且保护了环境。

### 【不止】bùzhǐ

是动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停止”。例如：

(1) 他听了大笑不止。

(2) 演奏一结束，观众叫好不止。

“不止”的另一个意思是超出某个数量或范围，因此后接的宾语一般是表示数量或范围的词语。这种用法比较常见，也容易误写为“不只”。

例如：

(1) 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2) 这位老人实际上不止九十岁。

(马坤整理)

# 国家级非遗

## ——六郎庄五虎棍

郎玉明

六郎庄毗邻颐和园、圆明园两大皇家园林，是满、汉文化交融聚集之地。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村庄，孕育出一种优秀的民间艺术形式——被誉为“天下第一棍”的六郎庄五虎棍。



牌匾（作者供图）

### 一、六郎庄五虎棍的历史渊源

六郎庄五虎棍起源于清康熙年间，曾用名：允祐万善老会；万寿无疆永寿万善忠孝童子棍会。演练内容取材于民间传说和《飞龙传》的故事情节，描写了赵匡胤称帝前青年时期的传奇经历。有关赵匡胤的故事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文人笔记和民间传说的题材。宋、金、元、明历代小说、戏曲中有很多与其相关的人物作品，因《易经》中有“九五、飞龙在天”句，后人就用飞龙代指

皇帝，此处指赵匡胤。由于缺乏资料，《飞龙传》的成书年代及原作者不能确考，现今我们看到的《飞龙全传》是后来乾隆时期的吴璇（号衡章、别号东隅逸士）根据旧本《飞龙传》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全书共60回，书中主要人物、重大史迹大体都有史实根据，虽经改编者删改、润饰，但一定程度上仍保存着民间讲史评话的粗豪气息，故事情节颇为生动，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市井豪侠、扶弱诛强、行侠仗义的鲜活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五虎棍以此改排、完善，使内容及人物塑造、场面编排等更加丰富。据北京香会界泰斗隋少甫与民俗专家王作楫合著的《京都香会话春秋》记载康熙帝七子允祐因六郎庄五虎棍技艺精湛，曾将棍会收于麾下，并出任该会会首。棍会亦一度名为“允祐万善老会”。允祐原名胤祐，胤禛继位后为避圣讳，改胤为允，会中所谓“千岁二爷”之称谓，源于允祐于雍正元年晋封和硕淳亲王，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意。五虎

棍老督管葛义和曾亲与笔者言：“听老人说千岁二爷每次来咱六郎庄都坐着轿子，他是残疾，是‘大马猴’的脚。”这与历史上对允祐的真实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淳亲王允祐雍正八年薨逝，历史记载其身有残疾且在世的最后八年间，身体状况一直不佳，处于养病状态，因疾解旗职……



淳亲王允祐（1680—1730）（作者供图）

其实允祐在幼时就注定了与六郎庄的缘分。康熙二十六年（1687）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每年都有至少一半时间居住于此，开启了清代“御园理政”的历史。诸皇子皆随驾入住御园，皇太子胤礽住在畅春园内，后移西花园，其他皇子都集中住在西花园，而当时西花园正建在六郎庄村域。可以说允祐幼时是看着六郎庄京西稻长大的。皇子成年后都分府得到自己的府第，允祐成年后的府第在御河西岸与六郎庄也是咫尺之遥，言其到六郎庄或与六郎庄五虎棍产生渊源也

是情理中事。关于六郎庄家喻户晓的“十八村霸王会”御赐銮驾一事，有此能力或者说六郎庄五虎棍会通过关系请到皇太后銮驾者，非允祐莫属；允祐成为会首是喜棍会技艺高超为前提，棍会自成立而达到技艺精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言其成立于康熙年间或更早，是符合逻辑关系的说法。

## 二、清代宫廷演剧中的六郎庄五虎棍

学界对于清宫戏曲机构的研究一直以南府、景山、升平署为主，如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周明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等文章，然而历史上却出现过六郎庄学艺处。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二月二十八日“全保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奏本”：（十月十四日当日）准学艺处治仪正苏博等来文，六郎庄学艺处食四两钱粮之教习七、食三两之教习四十一……”六郎庄学艺处有治仪正苏博负责，与南府及景山形成康熙朝三大学艺处，其时南府教习12人，景山教习为64人，而六郎庄学艺处教习为48人，人数虽不如景山多，但却是南府学艺处的4倍，规模可谓不小。六郎庄学艺处毗邻畅春园，是康熙帝驻蹕皇家园林畅春园时承应戏差所用，也是六郎庄五虎棍传承发展并声名鹊起的原因之一。

康熙朝后畅春园的核心地位丧失，因之而兴的六郎庄学艺处职能活动自然也随之沉寂。如果说康熙朝是六郎庄五虎棍的初期辉煌，那么他的鼎盛时期就是乾隆和光绪朝，尤其光绪时期更是五虎棍的高光时刻。

现据历史资料查得光绪朝六郎庄五虎棍有十一位棍会成员在升平署担任御教习。计：刘广福、玉德、安文元、蒋来福、苏彭寿、何常禄、潘吉星、薛详、薛六、安俊芝、苏六羊、一时传为佳话。

### 《内务府应承各项香会花名册》记载

<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初五

前引	何恒福 刘广福 邱德山 闫德顺
会首	刘福寿 苏彭年 杨长魁 董文微
文场	周广玉 周广喜 刘文喜 刘浦庆 高顺立 杨玉海 潘吉亮 玉成瑞 李永长
武场	蒋长春 蒋春荣 王福善 何常禄 潘吉星 刘续起 苏彭连 李文瑞 董连增 安文元 刘万顺 袁长顺 薛长海 于福珠 王小仓 葛福全 谭吉庆 王德山 苏彭寿 周永寿

<二>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前引	刘福寿 苏彭伶 闫德山 杨常奎
文场	薛东海 薛东芳 苏彭年 苏彭连 安维儿 王元庆 苏彭寿 王德山 潘吉星 于水亭 葛福全 董连增 蒋来福 葛荣秀 李文元 王全海 王昌 谭福 陈得立 姜来福 刘万顺 金广英
武场	董连顺 黄定 周广玉 周广喜 薛东顺 张增祥 刘喜顺 高永利 刘常 刘万春 李亭贵 李永顺 苏彭其 苏永珍 何恒福 王双喜

<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

前引	何恒福 刘广福 邱德山 闫德顺
会首	刘广寿 董文微 苏彭年 周永寿 杨长魁 田兴义
文场	周广玉 周广喜 刘广喜 杨浦庆 高顺立 王成瑞 杨玉海 尹长海 潘吉亮 李永长
武场	蒋长芳 蒋春荣 王福善 何长路 潘吉星 刘续起 苏彭连 李文瑞 董连增 安文元 刘万顺 袁长顺 薛长海 于福珠 王小仓 葛福全 谭吉庆 王德山 苏彭寿 姜来小

### 光绪时期恩赏日记档差事记录

时期	事项记录	出处档案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八月十七日，赏五虎棍教习吉星、薛详、安俊芝、苏六羊五名每名银二十两……五虎棍教习玉德、广福每名传二两钱粮米二分（份）	第44册23696页恩赏日记档
光绪三十年（1904）	五月初五日，赏童子棍广福、玉德、安文元、潘吉星、苏彭寿、蒋来福六名每名银二十两。	第46册24667页恩赏日记档
	九月十七日，赏童子棍广福、玉德、安文元、潘吉星、苏彭寿、葛福全、尹福、何文禄九名每名银十两。	第46册24734页恩赏日记档
	十月十五日，赏童子棍骨广福、玉德、安文元、潘吉星、苏彭寿、蒋来福、何常禄七名每名银八两。	第46册24780页恩赏日记档
光绪三十年（1904）	十月初一日，童子棍：文元、吉星、来福、彭寿、常禄每名赏食二两钱粮米。	第24841页旨意档

### 三、六郎庄五虎棍走会记传承情况

解放前历朝六郎庄五虎棍会主要去看丹药王庙及涿州走会，别处均不参不拜，至解放以后始走妙峰山庙会。



老会首苏广林（1899—1979）（作者供图）

六郎庄五虎棍会自千岁爷任会首及御赐銮驾以后，享有了高于一般皇会的特殊待遇，走会途经之处一切香会停止活动，敬送六郎庄会众先行，以示尊敬；由于频繁承差曾有旨意亭（供奉皇帝或太后传戏的谕令或是具体针对某事、某人所下的旨意及皇帝派下相关差事的谕旨）。六郎庄五虎棍会走会时每每都会抬着旨意亭，打着銮驾仪仗一行几十人，车、马披红挂彩，其场面颇为壮观。

武场 10 个角色主要以各种棍术为主，辅以盾牌、捎子棍、棒等器具，文场与武场演练、节奏

相配合，围绕红脸赵匡胤、黑脸郑子明与董家五虎进行的单打、双打、群打等各种阵形。六郎庄五虎棍通过公众的不断摸索，创出许多独特的操阵和打法。通过整理恢复，现存套路 108 套。



所用棍棒（作者供图）

武场表现的是一种阳刚之美，整体艺术体现在气质神态、造型的多样化，技艺的娴熟和难度等诸多方面，表演起来动作刚健潇洒、英勇神武，通过激烈的武术搏击和文场震撼的节奏配合，留给观者一种扣人心弦的审美满足。



2022 年 4 月 19 日妙峰山六郎庄五虎棍碑竣工合影  
（作者供图）

六郎庄五虎棍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2021 年 6 月 10 日，六郎庄五虎棍被批准

公布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棍会漫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有多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参与。五虎棍植根于民间，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历朝享誉于京城香会界。它集健身、娱乐、艺术

于一身，迄今 300 年。现今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承载着历史赋予它的责任。它植根于历史文化背景中，承载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它生命的律动永远会在人们心里产生出醉人的音符。

附：

### 六郎庄五虎棍武场、文场传承谱（部分）

#### 清代光绪年间（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前引会首：周永寿，刘福寿，苏彭年，杨长魁，董文征，何恒福，刘广福，邱德山，闫德顺，苏彭伶，杨德山，田兴义。

清·升平署御教习：刘广福，玉德，安文元，蒋来福，苏彭寿，何常禄，潘吉星，薛详，薛六，安俊芝，苏六羊。

武场：蒋长春，王元庆，蒋春荣，王德山，王福善，于水亭，刘续起，董荣秀，李文瑞，李文元，董连增，王全海，刘万顺，王昌，袁长顺，谭福，薛长海，陈得立，于福珠，金广英，王小仓，董连顺，谭吉庆，黄定，王德山，薛东顺，高永利，薛长芳，刘常，王成瑞，刘万春，尹长海，李亭贵，李永顺，安维元，蒋长荣，苏彭其，苏永珍，葛福全，何恒福，薛东海，薛东芳，周广玉，周广喜，张增祥，刘喜顺，尹福，铁头王，老苏头，潘吉星，薛老板，瞎套儿，葛福全，苏彭连，苏六，刘大爷，董立斋，董开泰。

文场：周广玉，周广喜，刘文喜，刘浦庆，高顺立，杨玉海，潘吉亮，王成瑞，尹长海，李永长，杨浦庆。

#### 民国初年

前引会首：苏彭连，三老板。

武场：潘文清，王志奎，苏广林，葛永林，闫文林，曹学庆，安德清，王锡全，高凌云，谭吉山，葛文友，谭吉平。

文场：单皮——张成春；战鼓——葛文亮；镲锅——王昆，杨恩良；大铜——葛文海，刘永良，曹大爷。

#### 民国二十年

文场：单皮——杨增荣；战鼓——谭景祥；大铜——高玉生，高凌恩，高金谭。

#### 民国三十年

前引会首：董开泰。

武场：王（老道），高荣深，高凌才，尹恩敏，金永祥，葛立学，谭景林，尹克勤，苏维德，郭文柱，闫文元，杜春全。

#### 民国三十四年

文场：单皮——杨希荣，葛仁山；镢锅——王凤岐；大铜——葛明山，张树成，苏宝泉，李永平，葛振山，王增起。

#### 民国三十六年

前引会首：王志广，郭二。

武场：苏维友，曹学友，佟荣林，王世宽，尹崇明，冯广元，尹恩伯，刘金亮，曹学忠，张凤鸣，高荣元。

#### 1949年

前引会首：王志奎

武场：高凌友，苏维刚，谭景奎，曹学贵，葛义和，葛金山，谭景云，葛启亮，谭景亮，高玉才，葛启祥。

#### 1951年

前引会首：苏广林，高凌云。

武场：郝世恒，高德江，王茂生，王凤池，李宗信，王云忠，曹克喜，杨福生，尹树均，陈其铭。

#### 1954年

文场：单皮——葛连福；镢锅——段福贵，王凤洲，尹存恕。

#### 1956年

前引会首：苏广林。

武场：张崇礼，张崇水，于京立，王世来，尹克如，王振德，王常宝，韩燕春，刘凤增，韩燕文，葛连才，王忠生，池永福。

文场：单皮——郎成利；战鼓——张德才；镢锅——葛连禄；大铜——尹存枝，张来财，何成茂，郎成瑞，闫永增，刘春华，苏士荣，陈树华。

#### 1957年

文场：单皮——张德泉。

#### 1958年

前引会首：苏广林。

武场：高德泉，高玉成，尹克琪，苏玉春，王鑫水，高森树，葛启凤，杜维跃，郎成春，尹庆祥，苏玉顺，王玉明。

1969年

前引会首：苏维德，郭文柱

文场：镲锅——张德友；大铜——张全才，高森树。

1980年

前引会首：王云忠，曹学忠，苏维德，杨希荣，陈其铭，葛金山。

武场：葛长喜，李福亮，王海鹏，石春光，张志均，付宏亮，尹淑祥，刘刚，高文海，杨万松，石春明，池建颐。

20世纪80年代

文场：战鼓——郎成利，王世来；大铜——张德宝，张德林，尹玉奎，谭兴禄。

1990年以后

文场：战鼓——谭景利；大铜——王世福，刘俊杰，尹胜利，王世海。

2000年

前引会首：王云忠，葛金山，葛义和，池永福，韩燕文。

武场：徐达，高跃，韩雪莲，王旭，王玉山，张志君，谭玉玲，崔鹏，闫璐，何占群，闫旭，赫锋。

2010年以后

文场：单皮——段昌盛，王鑫；战鼓——王凯；镲锅——佟士伟；大铜——王鑫，郭盛，潘冲，武超，田岩磊，张志新，何莹，段繁荣，闫长宝。

2011年

武场教练：池永福，葛长喜。

武场：韩燕平，李浩，徐博文，张奥华，纪泽晞，邹智轩，卢奕麟，马驿祥，赖荣浩，刘鑫，马厚乐，李佳旺，李永阔，樊国文，王子豪，房子晔。

# 海淀区史志办赴北京市方志馆 参观三大方志主题展

## 本刊编辑部

2023年2月21日，“方志北京”“年鉴北京”“志说‘一城三带’”主题开展展，海淀区史志办在主任李强带领下前往参加开幕式并参观展览。

该展览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市方志馆承办，历时两年打造而成。北京市方志馆为此全新开放三个参观区域，展厅面积约1300平方米。主题展利用馆藏各类志书文献资料多达5亿字，涵盖808张图片资料、1348册图书、11个场景、5处多媒体、45件实物，共设置故事点百余个。“方志北京”展重点展示百种旧志，万册新志，力求使观众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感知北京、热爱北京。“年鉴北京”展立足北京

市各级各类年鉴340余种，回望北京市年鉴事业发展进程，汲取历史智慧。“志说‘一城三带’”展分四个单元展示北京的老城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领略北京的历史变迁、深厚底蕴，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把北京建设成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引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文脉标志。

海淀区史志办区志编研室主任田颖在接受北京卫视采访时表示，展览以“志说”为切入点，聚焦志的价值、人的贡献，以小见大，讲好北京故事。感观上既保留方志文献典雅，体现立意高远，又注重情景再现和观众体验，增强观赏性与互动性。

李强主任表示，展览围绕北京厚重历史文化和“一城三带”



田颖接受北京卫视采访（作者供图）

规划重点，兼顾特色，勾连古今，一步一景，方志中的经典图文和展陈形式有机融合，让观众沉浸在几千年的方志文化长河中，唤起北京记忆。海淀区应充分领会方志馆在史志书刊资料保存、资政育人、史志研究、展览展示、收集利用地方文献、传承地方文脉等方面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并积极学习积累北京市方志馆建设和办展经验。

（马坤）

# 海淀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 换届选举大会召开

本刊编辑部

2023年4月4日，海淀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召开换届选举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

大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规定，精心准备、悉心筹划，事前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落实广大党员和群众在民主推荐、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的权利，在广泛征求意见、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制定了换届选举大会议程和支部换届选举办法，并确定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为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上，党支部书记李强代表上一届支部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届期以来支部所做的主要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全体党员对党支部三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支委会决定李强为书记、刘江英为



海淀区史志办机关党支部合影（作者供图）

副书记、徐支燕为组织委员、马坤为宣传委员、曹沛函为纪检委员。

随后，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李强代表新一届支部委员会作表态发言，表示将团结一心，不辜负全体党员的期望，努力工作，以崭新的姿态和精神风貌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推动支部工作再上新台阶。

（马坤）

# 区史志办开展地名文化考察调研

本刊编辑部

为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更好的记述地名文化，4月13日，海淀区史志办主任李强带队，实地考察《出警入蹕图》中现海淀至昌平南口的相关遗址地名，深入调研海淀与昌平的历史文化关联，途经巩华城、大运河源头白浮泉遗址、水关长城等地。区史志办全体人员参加调研。

**巩华城**——位于昌平区沙河镇，前身为明初所建行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永乐十九年（1421年）建沙河行宫，作为皇帝巡狩和谒陵停留之处。正统元年（1436年）毁于洪水。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始建城并重修行宫，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成，御赐名“巩华城”。清代巩华城、行宫逐渐冷落荒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巩华城遭八国联军抢掠焚烧。1939年夏洪水冲毁大部分城墙。现存4个城门洞、瓮城及部分城墙遗址。1993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巩华城是明代在北京与天寿山皇陵之间修筑

的一座独具皇陵祭祀功能的城池，即专为大行皇帝停灵和当朝皇帝到天寿山皇陵祭祀而修筑的一座“寿皇城”，是天寿山皇陵区域附属的一座古城。其功能与北京景山寿皇殿相同。



巩华城遗址前合影（林琳 摄）

明代修筑的古城具备有广、大、高、多四个显著特点，其中多指数量多、种类多，巩华城即体现了“多”的特点。明代古城除修筑有都城、府城、州城、县城和具有军事防卫性质的卫城、所城、城堡外，还专门修筑有祭祀帝陵的具有行宫性质的“寿皇城”巩华城。

大运河源头白浮泉遗址——元代科学家郭守

敬为解决大都的漕运问题，满足国际化大都城的需求，开通白浮泉和白浮瓮山河，引水入通惠河，使元大都城与通州京杭运河对接，延长大运河的北线，解决“最后一公里”的粮食物资运输问题。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早年撰文《白浮泉遗址整修记》时也称：白浮泉是“大运河的最上源”，且“历史上之北京城息息相关者，首推白浮泉”。

遗址整体呈现为“一泉三庙一楼”的格局。“一泉”指白浮泉遗址。白浮泉是大运河重要的源头，1990年成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三庙”指都龙王庙、龙泉禅寺、白衣庵（现已不存），其中都龙王庙是北京唯一一座以“都”字冠名敕建的龙王庙，为元代兴建，明洪武年间重修，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祈雨之所。它坐北朝南，由“照壁—山门—钟鼓楼—正殿—配殿”组成，院内还有修庙记事碑刻五通，正殿内两侧的墙上绘有壁画，绘制时间大致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一楼”指古戏楼，已不复存在。



考察白浮泉遗址石碑（林琳摄）

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建成是集文物、生态保护与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公共文化设施，既重现了明清时期“燕平八景”之一的“龙泉漱玉”景

观，更是研究北京水利事业发展史及古代民俗风情的重要实物资料。

**水关长城遗址和詹天佑旧居**——水关长城位于八达岭长城东段，因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京张铁路而截断。由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距今有400余年历史，为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为防御外寇入侵，以水拒敌，形成关口，是古代战场上罕见的古代建筑，水关长城也因此而得名。水关长城地处关沟中部，东起“川字一号”，西至京张铁路，以奇、险、陡、坚著称。

詹天佑旧居，位于水关长城脚下石佛寺村北坡，是在修建京张铁路中南口至岔道城段，总工程师詹天佑在施工现场的临时指挥部。在修筑该段铁路时，詹天佑曾在姬姓人家居住了三年，房屋现保存完好，于2003年改为詹天佑旧居陈列馆，供后人瞻仰怀念。

《出警入蹕图》是描绘明代皇帝骑马出京从德胜门出发谒陵，坐船返回皇宫的盛况画卷，沿途经过现海淀、昌平等军事驻地，如从巩华城往南一线的头拨、二拨、三拨、四拨、树村、北望（现在的东北旺、西北旺）等11处汛地。朝代更迭、岁月变迁，现仅保留二拨子、四拨子相关地名。

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李强主任表示：史志工作者要率先垂范，“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历史文脉传承的载体。海淀区史志办全体工作者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立足海淀、辐射北京，分析地名的历史与现状，思考文化保护和传承利用，做到讲好海淀故事、传承历史文明、传播中华文化、彰显文化自信，要当好传承者、争做领头雁。

（曹佩函）

#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江涌一行到 海淀区史志办考察交流

本刊编辑部



考察交流座谈会（马坤 摄）

2023年3月23日下午,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院长江涌一行到海淀区史志办开展考察交流。海淀区史志办主任、二级巡视员李强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双方围绕精品年鉴工程、地方志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史志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交流。

江涌院长介绍了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基本情况。他指出,新时代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要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修史修志”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扛牢“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紧贴时代和社会需求,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深度挖掘本土史志资源宝库,突出地方志作品的真实性、准确

性、可读性、趣味性，推出一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老少咸宜的精品佳志，推动地方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借助新媒体传播媒介和方式，积极推进方志文化传播，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李强主任指出：史志工作者要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学笃行中聚焦服务新时代主题主线，围绕服务中心大局，立足区域优势开展工作。海淀区具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特色资源，皇家园林林立、高校云集、科研院所集聚、GDP破亿元。在推进北京建设和谐宜居之都首善之区的进程中，海淀区史志办紧跟市委、区委工作规划，聚焦主责主业，发挥区域特色，深挖海淀多种文化形态，助力创建“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示范区”，通过开设展览、出版图书、推出原创情景剧等形式，将史志工作推向新高度。

海淀区史志办副主任赵习杰介绍了海淀区工作经验：海淀区史志办在史志编修工作中重视突出海淀区是经济强区、科教强区、历史文化厚重和文化形态丰富等区域特色。2004年出版了海淀区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北京市海淀区志》，被评为全国精品志书；《北京海淀年鉴》成为唯一连续4次蝉联中国精品年鉴、5次蝉联全国特等年鉴的区县级综合年鉴；出版《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海淀区历史1922—2012》等海淀地方史志书籍。重视资料的开发利用，依托修志资料，连续多年出版《海淀史地丛书》50本；主办发行内部季刊《海淀史志》91期，记录海淀山水水、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积极搭建“海淀区志鉴综合管理平台”，开展读志用志、读鉴用鉴活动，提高志鉴的育人效能和利用率。



参观双清别墅（田颖摄）

会后，海淀区史志办相关领导同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考察组一行赴香山参观双清别墅、来青轩等红色革命旧址，缅怀历史、传承精神。双方边参观边交流，并就建立长期交流关系达成共识，一致表示要实现工作的携手进步。

湖南省志院的“传经送宝”之行，让海淀史志工作者学习了先进经验，启发了工作新思路，振奋了史志工作的信心，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不断吸收长沙经验，继续发扬海淀模式，助力“现代化强区、高品质海淀”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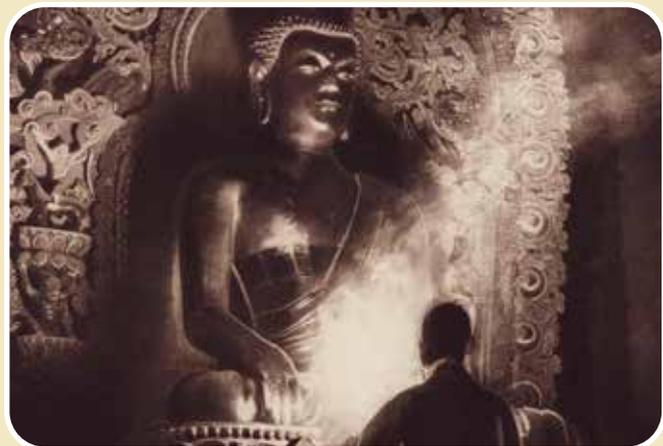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副院长彭楚筠、副院长兼办公室（人力资源部）主任张征远，长沙市地方志编纂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贺国成、郴州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孙佑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室主任张良敦，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海淀区史志办有关同志参加考察交流活动。

（曹佩函）

# 海淀故影



万寿寺天王殿



万寿寺大殿佛像



万寿寺万佛阁



万寿寺万佛阁二层眺望



万寿寺后路假山碑亭



万寿寺东路双月门

封面：颐和园桃花沟石板桥



牡丹（宁葆新摄）

# 海淀史志

编辑：《海淀史志》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1 号

地址：100195

电话：010-88487042